

炎黄春秋

12

1998

总第81期



1998年11月9日，江泽民会见《中华文化通志》部分编者和作者时，江泽民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通志》编委会主任萧克握手

于光远：强调科学思想 充分发扬民主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体会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苏联出兵东北的中方代价

——宋子文 蒋经国赴苏谈判内幕

胡耀邦在陕西工作一百天挨批一百天

彭德怀最后还在战斗

率先支持改革开放的爱国者霍英东

第一个擢升世界银行高位的中国人

炎黄春秋

专 稿

2 强调科学思想 充分发扬民主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
精神的两点体会……………

于光远

求 实 篇

9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薛攀皋

春 秋 笔

16 苏联出兵东北的中方代价

——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内幕……………

马仲廉

强 星 篇

25 彭德怀最后还在战斗……………

何 定

28 胡耀邦在陕西工作一百天挨批一百天……………

张黎群

赤 子 心

34 率先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爱国者霍英东……………

李敏生

39 第一个擢升世界银行高位的中国人

——访世界银行代行长、常务副行长
张晟曼……………

杜明明

亲 历 记

44 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

吕 鸿

49 为深圳第一声喝彩的来之不易……………

林 里

54 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

高 梁

人 海 浪

61 《古史辨》学派主帅顾颉刚的为人……………

以 舟

古 今 谈

65 学习张闻天的“担肩胛”精神……………

陈 沂

66 从李大钊改杨继盛对联说起

——读李庄《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他》

一文有感……………

叶笃庄

68 海外华人百年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

赵志峰

文 苑 园

72 张大千何以去国……………

包立民

总 目 录

77 1998 年目录……………

编辑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镛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照排: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
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强调科学思想 充分发扬民主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本文作者

● 于光远

为了纪念三中全会 20 周年,我写了一篇《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追记》。在写完其中第 27 节“散会”之后,觉得有必要写下自己参加会议后的体会,于是就有该文的第 28 节到 33 节。我认为这个会议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六十二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中开得最好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在我补写的这后六节中,我概括地指出这个会议是“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倡导改革的会议”、“积极建设的会议”、“宽厚团结的会议”、“善于引导的会议”。现在我把其中有关强调科学思想和充分发扬民主的两节合在一起,改写成一篇文章向《炎黄春秋》的读者介绍。明年是“五·四运动”80 周年。对于 80 年前的这个运动,现在学术界有各种议论。我仍持自己的老观点,高度评价它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启蒙意义,高度评价运动中提出的“德赛二先生”,高度评价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它所起的作用,高度评价它推进新文化的意义。我之所以从《追记》中只改写这两节,一方面是考虑《炎黄春秋》的篇幅,同时也有在纪念“五·四”前夕特别强调科学和民主的意思。

(一)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党中央举行的重要会议中,在会前特别作了充分的科学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并不很多。1945 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从 1927 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过多次严重违反科学的思想占居统治地位的现象。尤其是 1931 年初到 1934 年整整

四年中,这种反科学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1935年贵州遵义会议后扭转了发展方向,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六大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1942年和在1943—1944年举行多次历史问题的讨论,随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七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这才使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使党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与党的七大的情况在强调科学这一点上从原则上是很相似的。稍远的情况姑且不说,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严重违反科学的政治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结果使中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使中国走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决心粉碎了“四人帮”,才使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中既出现好的现象、好的趋势,也存在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趋势。

好的现象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间,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被平反、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专政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走上负责工作岗位(大批老干部复出,是一个经过好几年颇为复杂的过程。这样的事情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已解放了一大批,“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有所进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要把这个具体和复杂的过程描绘得很准确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写出系统著作。而直到现在没有这样的科学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界,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的反科学的言论进行批驳。这些谬论包括按劳分配会导致新资产

阶级产生、批判唯生产力论、实行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认为发展经济会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总起来一句,就是要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界进行的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势。

另外一个方面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对“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敢有任何议论,甚至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与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能见面交谈、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的、可以说已经处于昏愤状况下的毛泽东的所谓“决策”、所谓“指示”奉为神明,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一种“两个凡是”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方针。在这种方针之下“文革”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错误主张、就会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广为宣传,给那些想继续搞“文革”中那一套的人保有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确是很危险的,如果谁对这点还有点不那么相信的话,不妨读一下1977年8月12日讲的、1977年8月18日通过的华国锋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在这个报告中还继续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个政治报告中也就把1966年开始、在这个十一大上宣布结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党的十一大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大会,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

大会,是把邓小平选为党的副主席的大会,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如果不把“两个凡是”反对掉,就会一方面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妨碍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前途充满着危险。我们一定要强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对待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的问题上坚持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提出来了,胡耀邦发起和推动实现了这件事。理论界的同志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学术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作的《理论务虚会引言》中说的话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他说:“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两年来理论工作最后归结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上来,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决战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读者们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这么多“科学”这个词,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或者是拨乱反正这样的语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话的意思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我说的科学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关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科学的社会学说,对中国来说无非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说,它是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而且是要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就我国的情况看,1978年那个时候,与党的七大来比,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违背的。在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和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学,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有作为社会主义

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

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就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也包括违背军事科学的错误。军事科学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而在建设时期所需要掌握的科学知识就更多了。建设时期我们需要的科学的领域很广泛,即便是社会科学,也不能都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之内,何况还有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众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呢。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下面我想讲一点1978年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事实。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政治局很快开会同意邓小平这个请求。就在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谈话中说,他不赞成在十一大报告中再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这样的话,主张从现在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这个话。他表示,于光远主持写的那本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的文稿他已看过一遍,认为可以出版(这个意见在7月27日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一遍,并说他还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肯定国务院研究室发表出来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但认为写得还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后来冯兰瑞同志执笔改了)。1978年

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针对这个情况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又说起理论问题,他说,“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讲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着就有叶剑英向中央常委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情了。叶帅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没有看到标明这个时间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下旬。我的根据是叶剑英提出这个建议是听了国务院务虚会之后受到那个会议的成功启发而提出的,而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是1978年9月9月作的。另外叶剑英的建议又是在《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请示后提出的,这也是9月间的事情。胡耀邦在1979年1月写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写道:“去年(指1978年)思想理论战线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中央常委,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这个《引言》应该说是叶帅提出这一建议时间的可靠的文献。

叶帅还向中央提过一个建议,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可见他如何重视这个理论问题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着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而且在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又可以看出,这样的会会很快地召开。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但是这时开这个会议完全可以去

实现邓小平“摆开”的想法。也就是说叶帅提出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了。思想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更是超出理论务虚会的范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并且与反对和抵制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进行尖锐的争论。这方面的争论为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又超过了理论务虚会的作用,又证明了理论对实际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与胡耀邦和我的谈话中在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时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意思后来在闭幕会议讲话中也讲了(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二)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普遍亲身感觉到的,而且是十分满意的。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在11月15日的大会上和12月15日闭幕会上都讲了会议有充分发扬民主的特点。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对会议也作了这样的估计。

会议的出席者的确敢想敢讲,勇于闯进“禁区”,讲人们过去不敢讲的话。会议的领导者也不干预任何人的发言,不给任何发言设禁区、定调子、搞框框,同时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会议出席者都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自己会审时度势,发言恰当,但决不接受别人的干预。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5日开第二次大会前的11月21日的下午和晚上),汪东兴发言说:“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

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强烈的不满。不仅各组发言没有受汪发言的影响，并且在12月27日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大家意见这种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大家把汪东兴那几句话顶了回去。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犯错误的人，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指名道姓的批评。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允许你反批评。至于作不作反批评，那是你自己的事。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会议准备作出的决定的起草。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作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作出的两个有关农业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扬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力。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就充分使用了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在的西北组除纪登奎同志外有34人，个个积极发言。发言在4次到6次的最多，发言在10次以上的有2人，发

言在7次到9次的有9人，发言在3次到6次的有15人，发言在3次之下的有8人。

讲民主就要讲平等。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同样发表意见，他们并不代表政治局，而是以与别的出席者同样的身份发言。在会议者的心目中并不把他们看作是高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不但没有编入六个分组，而且都没有出席过一次分组会。我相信如果出席，也决不会在会上发什么“指示”，或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会平等地参加讨论。常委也发表意见，那是在常委会上。有一些意见他们是在常委会议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发表的。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些观点也大都传达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常委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话对出席者是没有约束力的，出席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的对会议有指导性质的意见。这样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程序性的。我们西北组要李登瀛、王惠德和杨西光修改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要胡耀邦、王任重和于光远改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文件，就是常委会上布置的，我们都积极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有些人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讨论是翻来复去地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是“高举”，而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家心里明白，在会上提这样的问题是太不聪明的。

写一个全国性全面的文件的时候，在其中必然要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作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

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就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会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实行民主是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他讲的这些话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看了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就很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以“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是在11月间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鼓励了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可以写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是有了开会的物质保

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准备开20天,那就是从11月10日开始,11月底结束,以后又说打算12月7日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后来根据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延长,延长到了36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很少几次全体会议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中看到的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对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经过它了解别的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别的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因此,我对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别的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例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简报是会议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默默无闻,然而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

当然,会议开头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讲话很长,简报中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

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 11 月 15 日西北组发言时我做的笔记，其中讲了邓小平的一个意见：“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他自己讲的：“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原来胡耀邦对简报工作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还反映过，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六天以后简报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工作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 12 月 27 日江一真的发言和杨西光与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看了简报对自己的发言的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也把这个意见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我觉得不要以为简报是一件小事，对于充分发扬民主关系很大。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 71 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某次汇报会上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也不会根据简报，而是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掌握各种证据。这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种反映来对待。在开会期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事实。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工作成为充分发扬民

主的工具这一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可能有人认为简报这样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不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人们是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了解其他分组情况，针对其他组的情况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让其他组的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因此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可都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搞得不好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符合事实的。

(责任编辑 方 实)

本刊启事

凡延误订阅的读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 4.80 元。补购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本刊现仅有 1997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4 元，简装每套 49 元)及少量 1996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2 元，简装每套 49 元。)以上均免收邮寄费。

另，很多新订户要求购买前几年的刊物，但创刊至 1995 年以前的存刊除少数几期外，已全部售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编辑部组织力量，从 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迷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 的挂号邮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社地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 话：(010)64072452

联 系 人：谷世章

历史教训 决策镜鉴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 薛攀皋

历史事件有时会重演。18世纪40年代,普鲁士执政者曾因错误地下令扑灭麻雀,自酿苦果。19世纪60年代,法国重蹈覆辙。谁会料到,在世界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为历史和科学证明是错误的消灭麻雀的事件,竟在新中国重复发生。

现在50岁以上的人,对我国50年代的轰轰烈烈的全民灭雀运动记忆犹新。那场空前规模的灭雀大战是毛泽东发动的。部分生物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消灭麻雀。他们执著地为麻雀翻案,走过了近五年的漫漫长路,直到毛泽东把麻雀从“四害”名单中除名时止。

听信农民经验,毛泽东决心 消灭麻雀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预计到全国农业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并将转而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大发展。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着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955年冬,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来自农村,和农民有着深

厚感情的毛泽东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做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这一年的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但是,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1955年12月2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给中共上海局、各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的《农业十七条》中,在1956年1月间,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的《农业四十条》中,都将麻雀列入“四害”之中。

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月25

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是这样表述的:“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随着《纲要草案》的通过,麻雀成为“法定”的被消灭对象,与“过街老鼠”同处于“人人喊打”的命运。

事实上,消灭麻雀运动在1955年冬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

尊重科学,部分生物学家 呼吁为麻雀缓刑

在全国上下众口一声要消灭麻雀的时候,也有少数生物学家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他们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科学根据不足。

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尽管不少人由于灭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还是有几位同志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坦陈麻雀不是害鸟,反对消灭麻雀。

首先发言的是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的害虫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防治雀害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煊、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座谈会上也有主张捕杀麻雀的一派,且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中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

会议过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

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煊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与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鸟类与兽类不同,就害兽老鼠来说,它有百害而无一益。在鸟类中要找出一种和老鼠有同等资格的害鸟,实在是不可能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也从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角度,主张“可以把麻雀作为控制的对象,不要作为扑灭的对象”。他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特别就青岛中国动物学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专家因为

“扑灭麻雀”已订为国家政策，而不愿发言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可以修正”。

在争论声中，《纲要修正草案》 为麻雀网开一面

在赞成并拥护消灭麻雀者之中，最典型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刊于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所加的按语，明确指出编发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发言，以及《文汇报》刊出的几篇文章。

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

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周建人最后强调：“今日已明白地有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然是能够改造的，人们也有改造自然的勇气和信心。人类是能支配自然的，决不是顺民。”

周建人陈述自己赞成消灭麻雀的见解，无可厚非，但他给反对消灭麻雀者扣上“自然界的顺民”，“均衡论者”的帽子，未必是实行百家争鸣应有的方式和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到，部分生物学家为麻雀翻案，不仅要冒犯上的风险，还难免受到某些同行的指责。他们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

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



送麻雀大车

消灭才是对的。当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也持与米赫罗夫同样的看法。

可能是接受了中外生物学家的一部分意见,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经过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这同1956年的《纲要草案》比较,不仅基本消灭四害的期限,由“五年、七年或十二年之内”改为“十二年内”,最重要的修正补充是提出了可以不消灭城市和林区的麻雀。

“大跃进”殃及麻雀,城乡大打灭雀战

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中有关麻雀问题的修正墨迹未干,很快就被大跃进、浮夸风所否定。

进入1958年,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随着大大地提前。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提出“消灭四害,不但可以在十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

提前实现”。

2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称: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争取在十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3月17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与卫生部联合召开除四害、消灭疾病竞赛会议,口号是:“争取提前成为四无国”。

在中央号召之后,决定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辖市就有:北京市(定为两年)、河南省(定为三年)、上海市(定为三至五年)、江苏省(定为四年)、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定为五年),安徽省(定为五至八年)。

随着全国上下头脑发热,除四害的牛皮也越吹越大。12月30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上,谈到1959年的除四害任务时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争取在全国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实现‘四无’,迎接建国10周年”。

麻雀也许在“四害”中被认为是最好对付的,因而,从1958年3月起,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纲要修正草案》曾经做出的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首先从四川省开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



朱 洗



郑作新



冯德培

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

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401160只。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29日捕杀麻雀505303只。

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19.6亿只。对小小的麻雀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屠杀。

全国各地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新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人民日报》更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作《咒麻雀》诗一首，刊于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诗曰：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郭沫若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能紧跟形势，他无法站在科学一边，却去咒骂无辜的、小小的

麻雀，歌颂错误的灭雀大战，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国际友人唱反调，韩素音等谴责中国捕杀麻雀

国外舆论与国际友人对我国灭雀大战的评论，与国内的评

价大相径庭。

最典型的是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为新中国不知唱过多少赞歌，替中国人民不知说过多少好话的老朋友，在捕杀麻雀问题上同我们唱了反调。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韩素音接到父亲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人》杂志。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聚歼麻雀的情景，她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她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看到许多鸟自由飞翔时，情不自禁地发誓：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

后来，她在《韩素音自传》中又提及此事，说《纽约人》杂志接到她关于麻雀的文章后，编辑罗杰·安吉尔曾建议她把结尾部分删掉，说它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然而被她拒绝了。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顾问、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以同样的心情评价北京市的灭雀战。他目睹下榻的西郊友谊宾馆，所有的人被动员起来参加灭雀战斗。他写道：“整个运动首先是由党内某些头面人物发动的，他们认为麻雀糟蹋了太多粮食”，他们不懂得“麻雀虽然吃粮食，但它们也消灭了许多害虫，而这些害虫要比鸟糟蹋更多的庄稼”，并说“我们俄国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对麻雀的屠杀”。

不计得失安危，生物学家继续为麻雀翻案

在《纲要修正草案》中规定“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之后几个月，全国许多城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围剿麻雀运动，生物学家对有关部门的言而无信很不理解。



张香桐

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毛泽东终于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由于许多生物学家强烈反对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算写一个报告向上反映。经请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决定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报告。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批道：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做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

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部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于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尽快制订计划并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协调小组于3月4日正式成立。

就在“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工作的時候，毛泽东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成绩之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之后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

人们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重视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在动员全民扑灭麻雀之后，由于缺少了抑制条件，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

但是，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发动消灭麻雀的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即《纲要修正草案》时，又提到了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尽管如此，特别是八届八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以及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一些生物学家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翻案。

上海的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尖锐批评上海市不执行《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

朱洗说：国外，德、法等国是保护麻雀的，日本是春天保护秋天打，苏联也保护麻雀，除了麻雀成群危害作物外，一般不打麻雀。中国历史上没有有组织地打过麻雀。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如白头翁、喜鹊和麻雀，但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麻雀可以打，但要在适当时间和适当地区打，如在秋季打一批，不是打光，不能全城动员打。

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冯德培认为，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百害无一利的。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公平。

脑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香桐说：麻雀在果园和森林地带益多害少。即使对农作物来说，益害比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只麻雀吃的粮食有限，而它吃了害虫可以减少庄稼的许多损失。如果算一笔账，还是保护麻雀为好。

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甚至说：为麻雀翻个案，比

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报告虽然没有直面当年定麻雀为害鸟并予以消灭的决策是错误的，但总算有一段巧妙的文字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为麻雀恢复名誉。麻雀终于解脱了整个家族将在中国灭顶的厄运。

毛泽东最终还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虽然这个过程显得长了一些。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纠正自己的失误，总是令人高兴并受人敬重的。

一些生物学家从 1955 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 1960 年春，才成功地翻了麻雀冤案。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问题并未完结，麻雀一案 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生物学家，在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没有因为否定毛泽东和中央消灭麻雀的决策而受到冲击，但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 1962 年因癌症谢世的朱洗，因为首先提出要以史为鉴，吸取外国灭雀的教训，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被认为胆敢把人民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号召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普鲁士腓列特大帝下令扑灭麻雀类比，公开反对毛泽东，而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 1978 年 11 月 26 日，人们才为他重新安葬，并按原来的墓志勒碑纪念这位为我国实验胚胎学、细胞学的理论研究卓有建树，对经济鱼类人工繁殖和蓖麻蚕驯化研究也作出重要贡献的生物学家。

郑作新作为鸟类学家是反对灭雀者中唯一亲自研究过麻雀的生物学家。从灭雀运动还处于酝酿阶段时起，他就明确提出：对麻雀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依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和

环境区别对待。在反右派斗争运动席卷全国时，他又在学报和《人民日报》，发表麻雀全年食性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是他及其同事们对从产果区和农作区采集到的近千只麻雀，进行逐个解剖和研究的结果。报告充分印证了他的论断。然而，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文革”中也成为弥天大罪。他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为此，他挨过没完没了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始得平反昭雪。他的事迹被编入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试用教材的“为麻雀平反”的课文中，教育儿童向这位正直的科学家及其无私的科学精神学习。

麻雀的冤案，随之而来的一些生物学家的冤案，至此都一一平反了。捕杀麻雀高潮的 1958 年已过去了整整 40 年。然而，回顾历史，仍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反思。例如，在决策民生化和科学化过程中，如何正视少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如何正确处理经验与科学的关系，真正尊重科学，以科学论据做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如何正确看待已有的历史事件，真正引以为训，不重蹈前人覆辙；一旦决策失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反馈系统，及时纠正错误；如何为广开言论，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在重人治的时候难以做到，即使在强调法治的时候，也并非能够轻易地做到。

[附记：笔者作为当年参加麻雀益害问题研究的一名科学组织工作人员，写过一篇题为《为麻雀平反的一些情况》，刊载于 1993 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去年，首都某大报记者未经该刊同意，又不注明出处，先后借以写成《麻雀的故事》和《毛泽东与麻雀的故事》在报刊发表。《炎黄春秋》杂志得知，约我充实内容，重写这一题材。感谢海内外的几位热心朋友，又为我提供资料，使我得以对 50 年代的我国灭雀运动，从酝酿、决策、实施到最后撤销的过程，按时间顺序整理成此文。]

（责任编辑 洛松）

苏联出兵东北的中方代价

——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内幕

● 马仲廉

《雅尔塔协定》与中苏谈判

1945年6月27日，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及其随员，搭乘一架租用的美国飞机，由重庆起飞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务是，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政府举行谈判。中、苏两国政府之间曾于1937年8月签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在此时，为何又要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呢？这要从《雅尔塔协定》谈起。

1945年2月上旬，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三国领袖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全文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 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

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斯大林 罗斯福 丘吉尔

1945年2月11日于雅尔塔

雅尔塔会议和签署的《雅尔塔协定》，涉及到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领土和主权。对于这样内容的重要会议，却将当时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排斥在外。由于这是一个秘密协定，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口头协议，等苏联将25个师的兵力调到远东之后，罗斯福才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同时开始中苏谈判。理由是，担心蒋介石政府过早地泄密，影响苏联对日作战的准备。因此，协定的全文迟至6月15日才提交中国政府。中苏谈判于协定签署了四个半月之后的6月30日才开始。

中苏谈判前中美之间的情报交流

对于苏美之间的交易，苏联以对日作战换取远东的利益，如欲获得中国旅顺港的要求，中国政府早有所闻，因此密切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际，行政院长宋子文即电令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要他搞清会议结果后即回国有磋商。雅尔塔会议刚结束，顾即于2月20日拜访英国外相艾登询问。艾登则吞吞吐吐，不愿透露实情。这时，蒋介石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的报告中得到了一点消息，了解到了苏联对中国

东北和旅顺、大连的特权要求。而蒋得到的雅尔塔会议较准确的情报,是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于3月12日发来的电报。魏在电报中说:

“当我会见罗斯福总统时,我询问他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时关于远东问题有何主张。总统回答说:‘斯大林提了三条:(1)承认外蒙古现状;(2)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应建立一个托管机构;(3)苏联须在大连以南获得一个暖水港,例如旅顺或者附近港口。’罗斯福认为,既然中国保有对外蒙古的主权,那么承认外蒙古现状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同样,中东铁路的主权仍属中国,但为提高其效率,可由中国、美国、苏联三方派出铁路专家组成托管机构。至于第三条主张,苏联的目的是除大连之外,再获得一个军港……总统设想,在保持中国主权的条件下,或许可以把旅顺租借给苏联若干年。关于苏联参加远东作战问题,总统向我保证,在适当时机定会参加,但务必保守机密,以防敌人增强其防御。总统还同斯大林商讨了中共问题,他认为斯大林对于远东的态度一般说来是较好的。”

继魏道明之后,顾维钧和宋子文也将在美获得的有关雅尔塔会议的情报电告蒋介石。5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私人性质向蒋介石透露了协定的全部内容,并嘱咐蒋保密。蒋于23日电告正在美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宋子文、顾维钧和王宠惠研究对策,为宋子文即将赴苏谈判作准备。6月3日,蒋接见了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蒋说,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并说,如苏联能帮助中国作到这一点,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与苏联以便利,如需要军港,则军港亦可为苏联共同使用。蒋在谈话中暗示了他已经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秘密条款。

6月9日和13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杜鲁门两次会见宋子文。由于杜鲁门未参加雅尔塔会议,无法解释雅尔塔协定原文的含义,会谈未取得结果。6月13日下午,宋子文与刚由莫斯科回国的美总统顾问霍普金斯会见。霍普金斯说:“我问斯大林对美国流传的一种说法持何意见,这种说法认为,一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

旦苏联部队进入满洲,他(指斯大林)就要让中共间接控制这个地区。斯大林回答说:‘目前的中国,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可能统治全国,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所以斯大林意欲支持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再者,苏联无意侵犯中国新疆及其它地区的主权,并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组织地方政府,以与苏军合作。至于中共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与苏联无关。’”

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约见蒋介石,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苏方关于进行中苏谈判的五个先决条件,就是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提出的那些条件。6月15日,赫尔利奉杜鲁门指示将雅尔塔协定备忘录递交蒋介石。于是,中国政府即开始了同苏联谈判的准备工作。

中国代表团抵莫斯科并与 苏方举行第一次谈判

宋子文于6月16日离开美国,翌日返抵重庆,与政府官员商讨与苏联谈判对策。关于在谈判中应采取的方针,蒋介石对宋子文曾有明确的指示,在谈判旅顺港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是,1. 旅顺港可由中、英、美、苏四大强国共同使用;2. 中国必须保持对旅顺港的主权和行政权的完整统一;3. 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都不得单独占领或租用旅顺港。蒋介石在6月12日接见苏大使时,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中国希望与苏联友好合作,欢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表示将来全中

国的物资都可供中苏两国使用；反复强调旅顺军港不能用“租借”名义，因为这类名义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耻辱，但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军港；中苏两国有关的事情应由中苏双方直接商谈，美国同意与否没有关系；中国及蒋本人对外蒙古问题的方针是赋予外蒙高度自治，即其外交、军事均可独立，而宗主权则应属于中国，但此系将来的事情。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以上这些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对中苏谈判的基本方针。

6月30日，宋子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他们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下飞机的。没有料到的是，苏联方面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据宋子文说，其欢迎之隆重与欢迎丘吉尔首相相等。在代表团抵达莫斯科3小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即会见宋子文等，并举行了第一次谈判。谈判时间从下午6时30分至45分，历时仅15分钟。

首次谈判属礼节性的问候和一般性的声明，当然尚涉及不到实质性的具体问题。寒暄之后，宋子文将蒋介石的函件奉交斯大林。斯大林询问了中国军事方面的一些情况。宋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宋对斯大林说：“中苏关系于我特别重要。”宋希望此次来苏“竭诚率直商谈”“完全坦白交换意见。”斯大林表示称赞中国的立场，并说，现时苏联与已往沙俄不同，是要“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请中国方面对此“无须有任何怀疑。”

从首次谈判的6月30日开始至8月14日，双方共举行了10次谈判。

中苏两国代表团第二次谈判，外蒙古独立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

中苏两国代表团的第二次谈判，是在7月2日下午8时至10时30分举行的。在此次谈判中，讨论的问题都已摊开，具体的有外蒙独立，大连的地位，旅顺港的租用，铁路与海口的使用，朝鲜的托管及有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关于大连，斯大林主张中苏两国共有，组织一个中苏委员会，以中方人员为主席，苏方人员为执行官，监督其管理。关于旅顺，苏联方面愿意用更恰当的措词来代替“租借”的字眼，只要苏联能与中国共同使用该港口的设备。关于中东和南满铁路，苏联方面建议归中苏共有，由苏联经营40年到50年。斯大林允诺，在和平时期，不使用该铁路运输苏联军队。苏联方面对朝鲜托管也表示同意。双方建议，在就一般原则达成协议之后，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

讨论的焦点是外蒙古的独立问题。斯大林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

斯大林说：“有些国家可能以外蒙为基地，图谋推翻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如果苏联没有外蒙这样一个缓冲地带，那么苏联本身的远东领土也将不保。即使日本投降了，过五年或十年，它还会东山再起。外蒙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



宋子文一行赴莫斯科谈判。前排右起：傅秉常、宋子文、莫洛托夫、加里宁，二排右起第一人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

不愿加入苏联，因此应当独立。况且有些外蒙人正在煽动内蒙组织一个大蒙古共和国。如果发生那种情况，就会危及华北。所以从中国的利益着想，让外蒙独立也将更有好处。”

宋子文说，中国政府绝不能放弃它的领土，否则就要垮台。国民政府自孙中山时候起，就向中国人民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包括外蒙古在内。斯大林说，外蒙独立问题可以秘密签署，待日本投降后再予公布。他强调，如果外蒙古继续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就不能允许苏联在那里驻军。苏联的国防线就会受到危害。

宋子文坚持外蒙古不能独立的立场。这时斯大林粗鲁地将一张纸扔到宋的面前，并说：“你看过这个东西吗？”宋一看是《雅尔塔协定》，便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至此，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已无法讨论下去了，于是宋子文“以事逾训令范围”为由，表示请示中国政府的指示后再进行讨论。

在此次谈判中还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

斯大林问：“中国允许自由分子参加政府吗？”

宋子文答：“3月间，我们曾打算同中共取得妥协，那时我们计划组织一个战时内阁，接受中共成员参加。我听美国大使赫尔利说，阁下认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些土改派人物。”

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宋子文：“作为行政院长，我曾打算到延安去商谈中国统一问题，但中共不欢迎我去。我们希望能在中国只有一支军队，一个中央政府。不希望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一个政党还拥有自己的军队。”

斯大林：“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不应把中共排除在外，其他自由分子也可参加。中国只能有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一个政府，但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不过说说我的观点而已。”



行政院长宋子文(中)偕外长王世杰(右)到莫斯科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

宋子文：“正如您所說的，我们也希望国民党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不希望组织联合政府，如果搞成联合政府，那么只要有一个政党撤出，政府就要垮台。”

斯大林：“国民党的要求是合理的。”

宋子文继续要求，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实现军队的统一。斯大林反问宋：“要我派军队帮助你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吗！”说罢哈哈大笑，使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蒋经国同斯大林举行 私人会谈，未获结果

外蒙古独立问题成为中苏谈判的焦点，这是中国政府及其谈判代表团未曾料到的。当时，中国政府认为外蒙古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因为苏联的要求只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在《雅尔塔协定》中也写明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根据中国的理解和罗斯福的确认，这种“维持现状”就是保持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因此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可是，现在则成为中苏谈判中的主要问题。对此，宋子文不得不请示蒋介石。

第二次谈判会后，宋子文电报请示蒋介石，为了打开谈判的僵局，他提出几种方案请蒋定夺。（一）在条约规定的期限内，可否允许苏联在外蒙驻扎军队？（二）可否给予外蒙自治权并允许苏联驻军？（三）在保持中国宗主权的条件下，

可否允许外蒙独立处理其军事和内政事务?这封电报发到重庆时,蒋介石到西安去了,因而没有立即答复。在等待蒋的复电的时间内,宋子文邀请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向他通报中苏谈判情况,并要求美国国务院以《雅尔塔协定》签字国的身份对协定原文提法作正确的解释,以便作为与苏联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可是,这时美国的政策是避免与苏联发生任何摩擦,而且新任国务卿杰姆斯·F·贝尔纳斯对远东事务不够熟悉。因此,国务院答复哈里曼说,所提问题纯属中苏之间的事务,美国方面无可奉告。

在得到美国政府的答复和焦急等待重庆的复电指示期间,宋子文要求代表团成员蒋经国拜访斯大林,举行私人会谈。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而且他有一段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的传奇经历。他曾于1925年到苏联留学,1927年由中山大学毕业。在中大学习期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1928年到列宁格勒(现彼得格勒)中央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毕业之后,他先后当过学徒、村苏维埃副主席、矿工、搬运工、技师、工厂厂长。1935年和苏联姑娘芬娜(蒋方良)结婚。1936年苏联肃反清党时,他被解除一切职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37年3月,经过外交途径他获准回国。在归国前夕,斯大林召见了。正因为蒋经国有如此身份和经历,他才作为中苏谈判的代表,并能够与斯大林举行私人会谈。

会谈开始以后,斯大林问蒋经国:“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况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听后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

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反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说至此,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对此,蒋经国告诉斯大林,日本战败后再也不会有力量侵占外蒙古作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中国和你签订友好条约,不会打你们,想打也没有力量。斯大林反驳蒋经国说,日本战败了,但日本这个民族还要起来的

“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来不可!”他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反问:“是不是美国?”

斯大林答:“当然!”

斯大林还对蒋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说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由上述谈话可以看出,苏联要求外蒙古独立,还有其另外的目的,就是着眼于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蒋经国与斯大林的私人会谈,当然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

中苏两国代表团举行第三次谈判处于破裂的边沿

蒋介石接到宋子文关于第二次谈判情况的报告后,于7月5日返回重庆,即召集高级官员讨论整个局势,并于当日夜向宋子文发出指示电,要点是:(一)外蒙独立问题,需待我国统一

并恢复领土主权完整之后再予决定。(二)如苏联能保证我国对满洲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谋反,不煽动新疆叛乱,则(三)我国政府愿意提议在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以实现其独立,但此事须待抗战胜利之后方可实施。(四)大连成为自由港,旅顺可作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铁路干线可由中苏共同经营,但支配权仍属中国。

电报还明确指出“此乃我方之最低要求。如无具体保证,则我方将不作任何牺牲。在此情况下,可暂时中断谈判,代表团首先返国,待详细报告后,再往苏联。”

7月6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再次提出5日电中的各项原则后指出,“以上各项乃为我国最低之期望,亦为我国最大之牺牲,若苏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愿与之切实协商,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

以上指示电,在中苏两国代表团预定举行第三次谈判的7月7日前,宋子文尚未收到。第三次谈判的时间又不能推迟。因此,宋子文计划在谈判时提出一项反建议,即允许外蒙古实行自治,但不放弃中国的宗主权。

中苏两国代表团第三次谈判于7月7日上午11时至11时45分举行。宋子文在发言中指出《雅尔塔协定》文本只写明“保持外蒙现状”,并没有说要使外蒙独立。而斯大林则说,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

双方经过一番争论以后,宋子文提出,中国愿意给予外蒙以高度的自治权,允许它处理自己的军事和外交事务,甚至可以和苏联签订一项条约,允许苏军驻扎在外蒙境内以保卫西伯利亚。但斯大林反对这个提案。最后,斯大林向会议提交了四份中苏谈判的文件(草案),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议、关于旅顺和大连的协议、外蒙古独立宣言。

对此,宋子文坚持未经中国同意,不得讨论外蒙古独立宣言。但斯大林回答说:“不讨论外蒙古独立宣言,也就用不着讨论中苏同盟条约。当时争论得异常激烈,从下面的对话可见一斑:

宋子文:“关于外蒙古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现实的建议。”

斯大林:“你们的建议是不现实的。”

宋子文:“从我国政府的观点来说,那样做是现实的。”

斯大林:“但我们不同意。”

宋子文:“我接到的指示就是这样。”

斯大林:“那我们的谈判就到此为止吧。”

宋子文:“阁下未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深感遗憾……。”

斯大林:“阁下未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也深感遗憾。到此为止吧。”

至此,中苏谈判已接近于破裂。

中苏两国代表团举行第四次谈判获得重大进展

中苏两国代表团在第三次谈判形成僵局之际,宋子文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指示电。但此时宋子文发现除外蒙古独立问题外,苏联提出的有关旅顺、大连和中东、南满铁路问题,也与《雅尔塔协定》存在着巨大差距。主要的有,关于旅顺、大连,苏方又增加了“及其附近陆地和海域”等要求;苏联要求行使旅顺的行政权;大连港口苏联坚持只有中苏两国可将该港用作海军基地;大连市由中苏共管,而大连港则由苏联单独管理;旅顺,大连及周围地区由中国管理,但地方官员之任命须先征得苏联同意;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财产所有权归中国,但中国须同意设立中苏联合公司,共同管理该路一切企业,期限定为40年,大部分董事会员和管理人员须任用苏联公民。以上这些要求,在《雅尔塔协定》原文中是没有的。这样,又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宋子文在与哈里曼交谈情况时,哈里曼强烈建议中国把旅顺割让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而坚持对大连的行政权;中东和南满铁路建议中国只要求财产所有权。哈里曼担心万一中苏谈判破裂,苏联借对日作战的机会侵入满洲和内蒙,甚至侵入中国本土。不缔结一项条约,可能对中国更为不利。

蒋经国在与苏联官员非正式接触中了解到

在内蒙古独立问题上,斯大林绝不会后退。如果中国方面想取得一点成功,那就是换取苏联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

宋子文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要求斯大林举行第四次谈判。

中苏两国代表团第四次谈判于7月9日举行,时间由下午9时至10时40分。

谈判开始以后,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精神,郑重地向斯大林说明:“遵循已故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为保证良好的中苏关系,俾使两国能获得建设性的合作,中国政府愿意作出最大之牺牲。中国今日之必须,乃获得领土主权完整与国家真正统一,亟望苏联能对中国给予同情、合作与协助,并向中国保证:一、满洲:斯大林元帅曾保证,苏联承认满州为中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感谢。为互利起见,中国准备同意将旅顺口作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将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以上两项之有效期为20年,但该两港行政权仍属中国。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干线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苏联方面承认中国之所有权。与上述两条铁路无关之一切支线和企业,则不在共同经营之列。

二、新疆:中国中央政府将采取政治手段解决新疆最近之叛乱,亟望苏联不向叛乱分子供给军事装备。原属新疆之阿尔泰山地区,仍须作为新疆之一部分。三、中共:中国中央政府认为,在中共保有其单独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组织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中国之统一。亟望苏联政府只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四、外蒙古:在苏联同意以上三项建议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准备于击败日本后,通过外蒙古公民投票,以决定外蒙之独立。外蒙边界应以中国原有地图为据。”

斯大林针对宋子文所述各点作了答复。他说,他愿意尊重中国在满洲的领土主权完整;所谓向新疆叛乱集团提供军火一事,他将在进一步谈判前进行调查;他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在必要时对新疆叛乱分子实行武力镇压的权力;他再次向中国代表团保证,他从未向中国共产党提供过武器装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

助,道义的或物质的,都仅仅提供给中央政府。他希望中国将只有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并指出,为吞并中共武力而使用国军是必要的。

这样,中苏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一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余各点尚待进一步讨论。

中苏两国代表团举行第五、六次谈判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中苏两国代表团在第四次谈判以后,苏联方面要求加速谈判进程,解决余下的问题。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出席7月17日在德国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苏方切望在波茨坦会议之前结束谈判。于是第五、六次谈判先后在7月11日和12日举行。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

第五次谈判的时间是7月11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此次会谈解决了以下问题:

斯大林应允在全部议程谈妥之后,提交关于满洲、新疆和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书面保证;应允在战胜日本三个月之后,从满洲撤退全部苏军,此项协议由双方互换照会确认。关于中国对铁路的所有权决不提出任何疑问,在和平时期不使用该铁路运送苏联军队,但保留运送武器装备的权力。

中国方面应允,将向满洲派出军事代表团与苏军合作,建立满洲地方政府。此项协议由双方互换照会确认。中国中央政府负责保护铁路安全。

仍待讨论的问题有:苏联方面坚持派人参与旅顺和大连的管理,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反对。中国方面建议,两国共管下的中东铁路,应由中国公民担任董事长,苏联公民担任经理;两国共管下的南满铁路,应由中国公民担任经理,苏联公民担任副经理,苏联方面对此表示反对。苏联方面建议,帝俄时期在旅顺的势力范围应予恢复,从而大连周围地区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应包括在旅顺海军基地范围内,中国方面表示对此反对。

第六次谈判的时间是7月12日上午12时至12时40分。

此次会谈解决的问题是,双方对外蒙古独

立宣言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达成了协议。苏方要求中国任命大连地方行政官员应取得苏联当局同意。此点在中方表示反对后,苏方再未提出此事。

仍待讨论解决的问题有,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经营管理;大连行政官员的任命;旅顺海军基地所应包括的地区范围。

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定于7月14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出席波茨坦会议,双方完全结束谈判并签署条约,时间已来不及。宋子文遂建议,借此机会,他偕苏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等人暂回重庆,向中国政府报告谈判结果。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波茨坦会议回到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再来莫斯科继续谈判。对此建议,莫洛托夫表示犹疑,而斯大林却表示赞同。

至此,中苏两国代表团的谈判告一段落,留下的问题待第二阶段谈判中解决。

中苏谈判休会期间,中国方面的外交活动

宋子文等于7月15日飞抵重庆。宋此次回国有两点考虑,一是他想乘此时机谋求美国政府的支持,求得在下阶段同苏联谈判中取得对中国有利的成果;二是请求辞掉兼外交部长的职务,以免在即将与苏联达成的有损于祖国利益特别是有损领土完整的条约上签字。

宋子文等回到重庆以后,晋谒蒋介石,报告中苏谈判情况。随后,中国政府将中苏谈判情况通报杜鲁门,请他劝告斯大林对中国不要提出过分要求。可是,杜鲁门显然对此问题并不重视,而且表示美国不愿意参与中苏谈判。他电复蒋介石:“美国政府建议履行《雅尔塔协定》,“但我不请求您作出超过这一协定范围的任何让步。”并建议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同苏联政府达成完全的谅解。”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曾一再建议会议应邀请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与会,但未得结果。显然,宋子文和中国政府意欲请求美国政府干预中苏谈判的意图未能实现。

宋子文回国考虑的第二个目的达到了。7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外交部长。

波茨坦会议讨论了德国和欧洲问题,并决定了向日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7月26日,以苏联、美国、英国名义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日,会议闭幕。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于8月5日返回莫斯科。

就在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向莫斯科飞行的途中,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顷刻之间广岛市成为一片废墟。紧接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形势的急剧变化,对中苏第二阶段谈判的进程,显然发生了重要影响。

中苏两国代表团第二阶段谈判,达成协议

中苏两国代表团第二阶段谈判,先后于8月8日、10日、13日、14日举行了四次会议。

关于外蒙古的边界问题,苏方建议在条约中不必提及。但中方坚持必须以中国出版的外蒙地图为基础,并将此图附于条约之后。斯大林又提出并坚持按“现行边界”。宋子文指出“现行边界”模糊不清,可以在外蒙独立之后,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勘定。斯大林则威协说,如果中国不同意“现行边界”,“内蒙的兄弟将会加入外蒙,组成一个大的蒙古共和国。”在此情况下,宋子文被迫让步,答应外蒙古公民投票赞成独立后,承认其“现行边界”。

关于大连港口问题,在8日的谈判中,对港口的管理,斯大林坚持苏方分享管理大连港及城市的权利,并由苏方人员负责港口业务。宋子文表示不能同意。在10日的谈判中,斯大林重新要求把大连列入军事区,而在港口管理方面则同意由中国方面担任大连市及港口的行政当局,仅港务局长是苏联人即可,港口设备应当双方所有。宋子文对此没有再提不同意见,只指出港口的一些码头和仓库设施可在名义上租给苏联。

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区域范围。苏方建议应包括金州(辽东半岛)在内。宋子文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苏联如恢复沙俄时期的租用线(延伸到辽东半岛北部),大连港与其相连的铁路不应包括在内。对此,斯大林表示同意。旅顺的行政管理,中国方面建议组织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

所有军事问题都提交该委员会解决,但内政事务只能由中国当局单独处理。苏方不同意这项建议。最后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监督旅顺口,苏方负责军事当局,中方负责市政。

关于满洲铁路的经营问题。中方曾建议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董事会都以中方人员为董事长,以苏方人员为中东铁路经理,中方人员为副经理;以中方人员为南满铁路经理,苏方人员为副经理。而苏方主张两条铁路的经理都应是苏联公民。在第二阶段谈判中,斯大林表示可设10名董事,双方成员相等,董事会主席可由中国人担任。但两条铁路只设一名经理,必须由苏方人员担任,副经理可为中国人。对此,中方作出让步,即同意斯大林关于经理设置方案,条件是除双方董事数量相等外,在遇有分歧的情况下,主席有决定性的投票权。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

关于在满洲的军事合作问题,也达成了协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政府不待条约的签订,即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了,而中苏两国代表团尚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争论出兵的条件呢。宋子文显然想在一些问题上继续坚持,但斯大林却不耐烦了。他对宋子文说,还是尽快达成协议好,否则“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

在第九次谈判之后,蒋介石曾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在外蒙古的边界线,旅顺海军基地内中苏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大连港务长由中国方面担任几点取得明确协议。但中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没有一项条约对苏军的行动加以限制,那末苏军进入满洲后,很可能借机侵入华北,那样就会发生更多的麻烦。因此,代表团请求蒋批准谈判继续下去。得到批准后,中苏两国代表团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在条约上签字的为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签字后,莫洛托夫建议条约立即生效。王世杰予以拒绝。因为按照中国立法程序,条约应首先呈送最高国防会议审议,再交立法

院复审,最后由中国政府批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八项条款组成,另有四份互换照会,一份备忘录和四个协定。其内容要点如下。

三点申明:

一、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外蒙古: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关于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干线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关于大连: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副主任由中方人员担任。

关于旅顺口: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其区域之正确界限应以所附之说明及地图之规定。

在备忘录中,斯大林允诺在战胜日本三个月后从满洲撤出全部苏军。

从中苏谈判经过和最后签署的条约与协定,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超过了《雅尔塔协定》的范围。名为“友好同盟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当然,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对世界和平和中国的独立解放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除此而外,笔者不作过多的评论了,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责任编辑 吴 璋)

彭德怀最后还在战斗

●何 定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哨兵的日记上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兀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扳着手指头数”，“流泪4次”。“九大”开会期间，哨兵日记每天都有他叹息、流泪的记载。

“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经常失眠。9月11日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有时如火山爆发，发脾气、吼叫：“要命啊！”“好苦啊！”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开杀戒，一代元戎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

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①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②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9月17日专案组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三次报告：“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又加了一句：“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央。

1970年5月4日，在专案组对“案犯”（不只是彭德怀）的审讯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江青在接见罗瑞卿专案组时出新点子说：“犯人不老实不要老搞审讯这种傻事了。不要老审，要叫他写自传，写证明人，写材料，从中研究，找矛盾，找岔子。不要在那里搞口供，把我们弄在云雾里。这样，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充分发动群众，搞调查，找物证，旁证。”

根据江青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3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专案组李××说：“不写不行，从8岁写。”赵××说：“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从极度精神折磨造成的失态中挣扎出来，再从头写“交代”——第三次简历。

他把这种写“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他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上的罢官，70年岁月像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囹圄，而生活在回忆之中。他有时在12平方米的囚室内挥拳飞脚，转身跳跃，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有时他沉思叹息，潸然泪下，也许他是在缅怀那些在他的简历中深情记述的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有时他兴高采烈，哼起湖南小调，那是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战胜强敌之后，常常情不自禁要哼起的。他时而点头自语，时而又横眉冷对。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愚蠢的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像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十万言关于他波澜壮阔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生动、忠实的叙述和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评”的愤怒驳斥，被当作他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案”的档案里。9年之后，当“四人帮”垮了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人们发现了这些材料，才惊叹于它的珍贵价值。人们从这些材

料中看到，纵然身为囚徒，彭大将军仍然是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将响彻千古。

由于“案犯”的“不老实”，监视早已变成虐待。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是看守)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要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三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哨兵记录说他“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继而，监护点又规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抗议痛骂，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摇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1971年8月某日，哨兵日记写道：“犯想睡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看着外边。”

1971年9月13日零时30分，彭德怀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猛叹一声，翻身朝里。哨兵在外敲门，不准彭德怀脸朝里睡觉，彭德怀回了一句：“我不得死！”伸伸腰，索性挠腿睁眼，盯着电灯出神。蓦然又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低沉嘶哑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

正是在此刻，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钻进漆黑的天空，外逃叛国。

在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消息，立即进行雷达跟踪。毛泽东注视着荧光屏上的小亮点，对周恩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的事，由他去吧！”三叉戟越过中蒙边界，在温都尔汗爆炸。

林彪携妻带子叛国出逃、葬身温都尔汗的事件，很快在内部传达，彭德怀则完全不知情。但他从报纸上发现了问题。9月28日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来中国，周恩来祝酒词中没有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建国22周年没有举行游行活动；“十·一”这一天林彪没有出面；报纸上林彪提出的“四好”“五好”也不见了。彭德怀很敏感，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林彪出事了！？”

彭德怀不知道林彪怎么回事，林彪事件却

牵连了他。“九·一三”事件后不几天,卫戍区司令员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阴谋带走彭德怀、罗瑞卿。什坊院要检查防卫,严密监视彭、罗二人。”

什坊院如临大敌,气氛紧张,彭德怀莫名其妙地又被加了一重罪名,专案组又来要他交代和林彪的关系。

林彪叛逃丧命。林彪的同谋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罪恶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暂时掌握了局势,极力纠正“文革”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提出要查清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什坊院监护点检查后,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认为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且分散。经过挑选,决定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长期的与世隔离,使他对发生的事情困惑不解。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彭德怀难以置信。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万民祝愿“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怎么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成了异域之鬼?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有时,他竟想到林彪可能也关在这里。一次,他看到厕所门上有一个“林”字,上面打了一个“×”,第二天又没有了。彭德怀敲敲门对哨兵说:“我估计林彪可能在这里,我见见他。”一次他对哨兵说:“小伙子,能不能找一份林彪投敌叛国的文件给我看看?”哨兵说:“这个我找不来。我们听传达了,林彪跑到蒙古去了。”彭德怀说:“这不可能吧?”他拿起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说:“你看写得真好,怎么跑到蒙古去了呢?”

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的态度也和蔼多了。他本来就爱战士,现在可以和哨兵——年青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他不明白哨

兵的态度为什么有了变化,因为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1年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桩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11月17日,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带班员又来通知彭德怀,专案组找他谈话。彭德怀胸中燃起怒火,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吧?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

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咆哮声震撼了整个楼房: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

“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审不下去了,只得放他回去。哨兵记载:“他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开外的人了。

走到4号房门前,他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是黄克诚。他们竟住到紧邻来了。咫尺如山,无法见面,他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递友情。哨兵日记记载:一天,彭德怀问哨兵说:“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种声音中知道,那就是他——彭老总。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把满腔悲愤之气传向隔室的黄克诚。

1971年12月30日夜晩,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接新年。当时针指向12时正,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从1967年6月21日至1971年末,据不完全统计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50多次,直至他的健康完全崩溃。

(本文作者是彭德怀传记组副组长、编审)

(责任编辑 杜先)

胡耀邦在陕西

工作一百天 挨批一百天

●张黎群

赴陕西临危受命 立壮志苦干五年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度过49岁生日后20天，他轻装简从，带秘书戴云，于一片静寂之夜，到达古都西安，走马上任陕西省委代第一书记，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他任职200天，实际做工作100天，靠边站、挨批斗100天。

当时，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落后于其它地区，粮食总产量，1956年曾经达到108亿斤，1964年只有86亿斤。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挤掉和割掉了。耀邦亲自调查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农村集市贸易实际上被取缔了；工业生产也不景气，可以说是百业萧条。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总的指导思想本来就“左”，西北又比其它地区“左”的程度更胜一筹。例如，1964年，长安县受处分的区委书记、区长占58%，公社书记、主任占45%，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选拔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要查三代和五夫（舅父、姑夫、姨夫、姐夫、妹夫），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连上山砍柴和进城镇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陇县受到批判斗争的215人中有40%挨了打。有些高等院校在学习“九评”中批判学生中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的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批判学生中的“小地主”、“小富农”，以致有些中学生离家逃亡。理论界、文艺界、学术界，也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和“反党文艺”、“反党党

史”。干部、党员和群众几乎人人自危，惴惴不安。

胡耀邦属“知天命”之年奔赴陕西，在这之前，他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近两年，他对实际情况是有深刻了解的，他这次走马上任来陕西是胸有成竹的，是立志改变山河而来的，他先定下专心干五年的盘子。他那以改变陕西落后面貌为己任的赤子之心，是由来已久的了。他是吃延安小米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陕西父老总是一往情深，时思报恩。1958年初我滴放边陲，离京前夕，他饱含深情地说：“我主张你下放米脂去干几年，务必认真研究改变老区落后状态的方针、政策和有效措施。”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去看他，交谈中他又一再强调要改变老区穷困落后面貌。我说：“如果再派我去陕北当县委书记，我要达到让群众每天吃三餐干饭。”（当年县委机关日食一稀一干）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连连说道：“应该，应该。”两年之后，我在四川农村搞“四清”运动，得知他去陕西主政，心中升起这位共产主义政治家知难而进的动人形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有胆有识出政策 无私无畏反“左”倾

胡耀邦到达西安，首先集中研究农业为什么上不去？他说：“无农不稳，民以食为天，想陕西太平，要粮食领先。”他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展现出来的是陕西公购粮任务太重，无论和南方各省比还是和自身库存量比，都显得重了，他说：“陕西人老实，都不说话”。他提笔起草电报曰：“总理、先念：请求先减公购粮四亿斤，暂时退下来，让农民缓过气来，过几年再加上，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献。”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复电同意。

关于生产建设，耀邦同志着重强调发展生产力。1965年2月上旬到中旬，他在陕西安康地区各县反复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坏的最主要的标志。”2月14日，他从安康向各地、县委发出的《电话通讯》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2月17日，耀邦在汉中地区城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又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3月，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出的一个通知中用了耀邦的两句话，即：“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耀邦注意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加强领导，增加投入。他在多次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大、宽、活，就是耀邦治理陕西的三字箴言。

什么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耀邦指出：在干部问题上“（一）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二）不要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待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将功补过’；（三）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什么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他提倡“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他还主张：不但要注意增

加生产，而且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问题。”

什么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耀邦提出：“（一）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改进商业部门的工作；（二）把集市贸易搞活，不能把投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防止又乱没收；（三）很好地组织短途运输，人力、畜力短途运输不是什么剥削，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必须有报酬，要下决心把山区交通运输搞起来；（四）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慢慢变成地方工业。

在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方面，耀邦1965年2月18日在同汉中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目前经营管理上有三大问题：一个是作业组，一个是定额，一个是分配办法。要发动群众讨论讨论。我们要学会科学计算，要学会现代化的科学的经营管理。”在口粮分配方面，耀邦同志提倡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

耀邦到处提倡植树造林。他编了一段生动通俗、便于记忆的造林方针：“植树造林，育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根据耀邦建议，省委和省政府从省、地、县三级抽调了二万多名脱产干部到基层，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

增加农业投入。耀邦亲自给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争取到3万多吨化肥；并创建陕西省第一批化肥厂。

关于社教运动，耀邦认为社教运动应是一次教育人、改造人的运动，而不是整人的运动。1965年1月22



一九八九年春作者拜访胡耀邦

日，耀邦在陕西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还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界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就把工作中的不同观点和作法排除在外了。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针对当时陕西社教运动中“左”的倾向，耀邦到陕西半个月之后，就建议省委作出决定：捕人暂时停一下，但仍须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和清理积案；“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时停一下，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时停一下。在“廿三条”公布之后，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问题，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摸，不查小额贸易。1965年2月14日，耀邦在从陕西安康县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意见，他说：“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廿三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应该向到会同志明确宣布：（一）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二）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三）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待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四）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在这些问题上，耀邦同志用生动的语言，讲了许多精辟的观点。例如：1月1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大会，20日在西安市中等学校教师大会上，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对于，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但对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1月29日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耀邦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讲台上一只有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对于当时名为“集中训练”实为“隔离审查”和变相

监禁的人，耀邦说，拿“廿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虐待，不要当犯人看待。“有老婆、孩子的人，你不让他回家过年，人民不同情，老太婆不同情，娃娃不同情。”

在思想文化工作上，耀邦特别注意“解放思想”，着重强调保护知识分子。

1965年1月28日，耀邦在同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曹廷甫谈话时说：“只要合乎社会主义方向，合乎党的政策，合乎党对青年的要求，就应该解放思想，放手大胆地工作。”2月上旬到中旬，耀邦在对安康地区七个县领导干部的谈话中一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要教育干部立大志，鼓干劲，往前奔，往前赶。”

1月22日耀邦在陕西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重要的、对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耀邦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三个：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要立足于现在，面向将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见停下来，不要争了。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耀邦在安康地区视察时，又反复强调“抓关键，向前看”，并把这句话写进向全省发出的《电话通讯》里面。

谈到林彪，耀邦除了讲过林彪会打仗，有赫赫战功以外，对林彪的某些错误观点他也曾提出不同看法。他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都突出政治，比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淹死。”他在1月22日的讲话中讲到，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要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本来下面还有一段话，他的助手在整理纪录稿时，建议他删掉了。那段话的大意是：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我主张学原著。因为毛主席的话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情况和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结论，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耀邦本人勤学好问，博闻强记，才华横溢，思如涌泉。他不仅熟读毛主席著作，通读过已经翻译和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每一篇著作，而且读中国的历史著作和诸子百家，读中外文学名著，读一些自然科学的普及读物，就连佛经、道典和医、卜、星、相之类的书，他也要翻一翻，他的家里就像一个小图书馆。他的记忆力很强，听下级汇报，他常常要求汇报者合起本本讲。有时谈到某些数字，汇报者记不清楚，他代汇报者回答，汇报者惊讶地问：“胡书记，你怎么知道这些数字？”他说：“我

是听你讲的嘛。”他能够背诵许多诗词。陕西省委机关位于大雁塔之侧，有一天，他让身边工作人员背诵元八咏大雁塔的诗，这位同志背了一半接不下去，他接着背诵下去，并且说：“你是西安人，又住在大雁塔旁边，怎么连咏大雁塔的名作都记不完全呢？”在汉中，同当地干部谈话，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韩溪边，由于韩溪水涨，韩信过不去，萧何才追上他。耀邦问：“古人咏韩溪有两句好诗，你们谁记得？”在座的汉中干部都答不上来。耀邦说：“那两句诗是：若非一夜韩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他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我是从你们汉中志上看到的。”耀邦擅长心算，我们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心算的速度。耀邦在视察水利工程时，还能对设计、施工的技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陕西省委有的同志说，耀邦有“三个不断”：“读书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这个概括是准确的。

正因为他自己有渊博的知识，是杰出的人才，所以，他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在1965年春节前的十几天中，先后同新闻界、文艺界、大学师生、中学教师、党外民主人士见面，并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2月下旬，他去武功杨陵镇，向西北农学院和陕西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农业专家请教，请专家们为陕西农业的发展出主意。他一进大学，同学们就把他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谈天说地，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走出重围。

耀邦在对文艺界的讲话中，提出在文艺界如何搞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他主张进行正面教育，并且以繁荣创作为目标。他说：“同志们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东西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个标志。”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现代戏《蟠桃园》。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再批了。”主管部门确定的下一个批判对象是文艺评论家胡采。耀邦说：“你们把胡采也解放一下嘛。他的观点，是学术、艺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对于批判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诗人柯仲平的所谓“反党史诗”《刘志丹》（未完成未发表的草稿），由于耀邦无力抵制强大的压力，他告诉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同志：“先拖一下，实在拖不下去了，开一个会，找文艺界少数同志批一次，然后给上级写一个报告，说明我们已经批过了。”

一代人民政治家 公正无私好公仆

胡耀邦是一位好公仆。他胸怀天下，民主，淳朴，平

等待人。他每天吃6两粮，睡6个小时觉。除了读书、议论、吸烟、吃辣椒、吃腊肉，几乎没有别的嗜好。他每天6点起床，常常走出屋子同省委大院的花工一起聊天、散步。中午不睡午觉，晚上加夜班，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有时在完成当天任务以后，还要同身边的几个助手聊天。聊的内容，从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街谈巷议，直到青年时交女朋友的经历。他风趣地说：“我们在集体办公以后还要集体谈私呢。”1965年2月，他去陕南和关中西部视察，只带了三个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员）和一辆老式北京吉普，没有前呼后拥。

耀邦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有优点和缺点的凡人，经常公开讲自己的缺点。1965年1月22日，他在陕西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的片面性很多，今天的话里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他说：“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的标志。我现在来代理第一书记，‘湖南蛮子’是有名的，讲话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批，我看也不一定。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哩。”耀邦不仅能这样说，也能这样干。1965年4月西北局转来陕西留坝县委办公室干部王瑜琨向中央反映耀邦缺点的信，批评耀邦“忽左忽右”。耀邦刚看到这封信不大高兴，他说：“我正在挨批，他又来火上浇油。”他身边一个工作人员说：偏僻山区的一个县委干部怎么知道你在挨批？你的《电话通讯》刚发下去又被迫停止执行，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不是‘忽左忽右’吗？”耀邦说：“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个人敢讲真话。”

耀邦性急，容易激动，有时批评人过分尖锐，叫人受不了。但是，知道他脾气的人，可以反驳他，顶撞他。他不仅不“秋后算帐”，还会当面认错。他的秘书小李写了一段关于社教的稿子，耀邦不满意，发脾气说：“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总是怕右，我的家很穷，我就不怕。”当天晚上，两个秘书一起对耀邦提意见说：“小李这一段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批评，但这和人家的家庭出身有什么关系？我们两个的出身也不好，你为什么要用呢？”耀邦一时想不起来，他说：“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两个秘书说：“你就是说了！我们都听见了。”耀邦说：“要是说了，这个话不对。”接着，他就找小李去道歉。警卫员也可以批评他。2月中旬，耀邦在汉中凤县视察时，中途停车去打山鸡，打完山鸡，一上车就催驾驶员：“开车，开车。”他的警卫员小解批评他：“你这个人真自私！沙处长还没上

车呢。”耀邦回头一看，老沙正在上车，就说：“对，自私！自私！”当晚，耀邦请凤县县委的大师傅把他打下的11只山鸡煮了，同随行人员和县委的同志饱餐一顿。

耀邦有种刚毅、乐观、敢说敢干的革命英雄气概。他常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他自己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边，身先士卒，率领大家实干、苦干，创造性地干。他有一种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刚毅坚韧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不论千难万险，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别人不敢干的他敢干。他的讲话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迅雷疾风，席卷千军；如民间议论，妙趣横生；如亲友谈心，亲切动人。他常常吟诵白居易的《李都尉古剑》诗：“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这几句诗，正是耀邦个性的生动写照。

耀邦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常常宣传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消极的话不能讲得太多！我同意守一同志的意见，消极话不能讲得多了，你的头低一寸，他的头就要低一尺。”他不喜欢情调低沉的歌曲，他说：“凄凄惨惨，软绵绵的，有什么好？”

耀邦办事雷厉风行，明快果断，注意速度，讲求效率，说了就干，干了就要真正解决问题。1965年2月16日，在汉中地区城固县、区、社负责干部会议上，他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对话：

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油争地。

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过多的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油种植面积的目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己解决。

区社干部提出：山区交通不便，要求修架子车路。

耀邦回答：同意修路。修路的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二角钱菜金；省上再给你们分配一点炸药和钢钎子。

区、社干部说：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为交粮荒了田。

耀邦在商量后回答：按你们的意见办。今后，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至8月完成；秋征推迟到11月下旬到12月完成。

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耀邦回答：一种苕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

两年全省建立几个总共年产7.5万吨化肥的化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区、社干部说：化肥调拨迟，影响生产。

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干部七嘴八舌闹嚷嚷地进行讨论。最后耀邦回答：按大家意见办。一年拨两次：一次在打春前；一次在6月份。区、社干部提出：汉江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余万亩。

耀邦回答：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后来，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并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期间完工。

耀邦同志这种雷厉风行，明快果断的工作作风，深受陕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赞扬。一些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真正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自古忠良多磨难 常使壮士志难酬

胡耀邦在陕西的100个日日夜夜，他把“知天命”的年华、智慧、精力、才干，全奉献了出来，他将马列主义理论与陕西社会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政策、新办法、新措施，创造性的地贯彻执行着党的方针、政策。

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人应当与他同心同德，共挽狂澜。可惜，他们错误地认为胡耀邦“右倾”了，与“阶级斗争为纲”不对路，发生了立场、观点上的政治问题，于是搜集耀邦100天中的言论，暗中准备批判大会，于1965年3月11日发动进攻了。胡耀邦从此日此时起，实际上被解除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只能天天等待挨批斗，一直到6月19日他离开陕西，刚好又是一个100天。

胡耀邦是具有“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品格的共产党人。他的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不赞成那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格言。因此，既无害人之心，又乏防人之术。当着“机关枪、迫击炮”已经轰鸣起来，他还不信水火如此无情，仍然相信有关领导当面讲过的话。他说：“某某同志肯定了我的五条成绩，只讲了一条缺点，就是办事急了一些，他说话是算数的。”当这个希望破灭之后，他又把希望寄托于毛主席。他说：“主席是了解我的，他不会不管我。”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中央制止对他继续批判以后，有关领导竟然不顾中央指示，坚持残酷斗争。他头一天在受审会上挨批判，被打得毛焦

火辣,回到住所坐立不宁,走来走去,自言自语:“这么整,蛮不讲理下去咋办?我15岁参加革命,家是贫下中农,我长征都没有动摇,居然这几天说我动摇了,立场有问题。”由于思虑过度,3月18日突患大脑蛛网膜炎,医生下令他住院治疗,他在病床上继续写检讨。

在医院治疗两个月后,医生说仍要继续休养,不能多看文件,不能过多地思考问题。但是那些“左”得出奇的人,在西北局某些领导人的指使下,又开起了批判会。

耀邦在挨整的100天中是怎么度过的?他在想什么?此人是学而不厌,手不释卷的。他从受批判之日起,就爱吟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耀邦吟诵这首诗的心情,显而易见,特别是这首诗的后两句,他反复吟诵,这里的长安在他心里指的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北京城。他相信浮云不会遮住太阳,他盼望毛主席党中央会为他主持公道;另一方面,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不仅使他饱受冤屈,更为紧要的是中央方针不得贯彻,“左”家人物一手遮天,使他满怀愤慨。

1965年6月,叶剑英元帅和张爱萍等同志到了西

安,下榻丈八沟招待所。耀邦对自己的遭遇只字未提。张爱萍同志发感慨了:“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噢!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啊!”这位功臣瘦成个什么模样了呢?当时团中央有一位去看望过他的干部对我说:“耀邦坐在沙发上瘦得面目全非了”!

叶帅同耀邦有个简单对话。

叶帅:“我听贺老总说,陕西这个地方在整人。”

耀邦:“这句话我没敢说,我在会上检讨六次都没过关。”

叶帅:“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西北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

耀邦:“我走不了噢,不叫走呵!”

叶帅:“跟我一道走。”

6月20日上午,耀邦上了叶帅的飞机,冉冉升空,向北京飞去。

为什么能够让不正确的人当道!陈毅同志针对耀邦挨整的事情说道:“唉,党内斗争的是非一下搞不清楚,过去饶漱石整我也是一时搞不清嘛,看来是党的体制把人卡死了,一级党委就把你搞得没有办法。”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欢迎订阅 ·

新华月报

XINHUA

MONTHLY

鲜明的时代特色

丰富的信息含量

权威的文献资料

极高的保存价值

《新华月报》是一份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文摘月刊。于1949年11月15日正式创刊发行。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新华月报》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长的历史,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

为了全面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使读者了解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最新动态,《新华月报》在栏目设置上作了调整,以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它在保持自身原有的文献资料性等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精选精编,并提高了检索的方便性;同时又增加了大量反映社会热点、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文章,内文配以丰富的图片,赋予刊物浓厚的时代气息与文化韵味,使之更具可读性与实用性。

《新华月报》为16开本,192页,彩色封面。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2-242

国外代号:M6

每册定价:10.00元

本刊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联系电话:(010)65255571 65250495

率先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事业的爱国者霍英东

●李敏生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博士，是从香港贫困人们的最底层，历经艰辛，拼搏奋斗，获得成功，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企业家。

外国列强霸占香港的历史，给霍英东的生活和心灵留下了无数的创伤和苦难。虽然他个人的事业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这并不是他追求的最终目的。他从青年时代就崇敬为中国独立和强大而奋斗的革命先行者，像孙中山、廖仲恺这样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每时每刻都企盼着祖国的强大和富裕。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久有报国之志的霍英东，也只能在体育等领域尽自己的努力。

他为恢复中国在世界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从70年代起，就奔走呼号，出钱出力。中国恢复足球、羽毛球、篮球、自行车等14个单项组织在世界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霍英东都是出过大力气的。

耕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霍英东时刻关注祖国形势的发展。

1976年10月25日，霍英东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香港同胞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集会，他对中国摆脱动乱造成的灾难充满着希望。

1978年12月7日，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与广东足球协会签订了举办“省

港杯”足球赛制的协议书。他希望从这一香港与内地体育交流的创举开始，拓宽香港与内地的联系。

1978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报道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霍英东对这一消息十分留意和重视，准备参与中山县旅游区的开发。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于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见报。霍英东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一《公报》并没有出现“对外开放”的字样，但改革开放的内容，特别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写得很清楚的。他兴奋地、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中国出现一个新的历史局面的信号。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内地。他仔细地考察了中山县、广州市区和他的家乡番禺。家乡交通的不便，旅游设施的落后及物质的匮乏，更加激发了他参与内地建设的紧迫感。

1979年1月23日，他代表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同广东旅游局签订了投资与兴建白天鹅宾馆的《计划意向书》。

1979年4月，他捐赠家乡的番禺宾馆破土动工。筹建中山温泉宾馆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那时在国内投资建设高档宾馆尚无先例可循，许多问题，霍英东还搞不清楚，但他认为现

在最重要的是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立即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心愿。

霍英东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来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杨尚昆同志题词称赞霍东英先生是“率先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爱国者”，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霍英东就是这样跟随三中全会的脚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敢为天下先

万事开头难，但霍英东认为既然要报效祖国就不能惧怕风险。他投资、捐赠内地的许多项目创造了令人敬佩的许多“第一”，表现了他的忠心、智慧、热情和胆识。

霍英东投资建设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位于原来选定的一片菜地，而是一片淤塞的河滩，这是内地完全不占用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高档宾馆。而且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他在这里提出并实现了“自己建设，自己设计，自己管理”的方针，成为中国旅游事业的创举。

由霍英东投资在孙中山先生故乡罗姑山脚下建设的中山温泉宾馆，同样选址在一片荒芜的乱石窝里。其特点是将高档宾馆的建设和体育设施的建设相结合。在温泉宾馆旁建设了我国第一个高尔夫球运动场，并从农村学生中培育了我国第一批高尔夫球运动员，为我国的高尔夫球运动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开拓者总是与开路有着特殊的缘份。霍英东参与家乡建设首先便是建桥开路。

番禺河网密布，为二十多条河涌所分割，交通十分不便。有一次他从广州去番禺，几十里路，小轿车竟走了四五个小时。他认为只有路通才能财通。他捐款家乡建设了洛溪大桥、沙湾大桥、大石大桥、三善大桥，并投资建设了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广州中山公路三座大桥、番禺大桥、虎门轮渡及中山市的公路扩建，总金额约四亿元。

为了实现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的良性循环，他第一个在内地提出并实行了收“过桥费”以桥养桥的现代化交通经营管理方法，由此带动珠

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全省兴起了建桥的热潮。匆匆十余年，广东建桥四千多座，在广东省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仅以他捐款的洛溪大桥为例，现在日通车量已达六万辆次，创造了惊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此事在当时却不知惹来多少麻烦。有人斥骂此事是收取大逆不道的“买路钱”。

1984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来到广东，视察了深圳、珠海、中山、广州等地。当时从广州到珠海要经过好几个拥挤不堪的渡口。霍英东以捐赠和低息贷款六千多万元港币的办法发动兴建的广东至珠海的四座大桥，当时只有洪奇大桥通车，交通还很很便利。但是，自从1984年3月细滘大桥通车，8月沙口大桥通车，11月25日容奇大桥通车后，使珠江三角洲西部的交通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1985年1月23日，邓小平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会见霍英东时，高兴地说：这次来，广东交通比去年来时方便多了。广珠四座大桥的建设，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创新实干的性格

20年来，霍英东的开拓、探索干得实，干得苦。他虽然子孙满堂，功成名就，但从未想过颐养天年，享享清福。

在他创业的每一个地方，都给那里的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1980年12月，中山温泉宾馆开业前六周，宾馆的10万件物品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如期开幕。霍英东精心组织，日夜督促，分秒必争，加之在他倡议下实行了员工合同制、承包制和奖励制度，广大员工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了开幕仪式如期举行，创造了一家中外合资的高档宾馆一年建成的高速度。

霍英东在白天鹅宾馆建设中，更是付出了最大的气力。开业前最紧张的日子，他有13个日夜盯在现场，晚上睡觉有时累得连鞋都没有脱。人们都说，没见过这样的亿万富翁。

霍英东今年已75岁高龄。20年来，他殚思竭虑，风风火火，四处奔波，不知疲倦地忙于工作。吃饭也经常难得平静，有时在船上，有时在



1997年6月26日，在北京通州区大运河俱乐部为“回归殿”落成剪彩（讲话者为霍英东）

车上。参加宴会经常是忙于和大家交谈，吃不上几口饭。来北京开会，吃早餐，经常是边看文件边吃饭。他吃饭可以匆匆忙忙地塞上几口，但赴会的时间却只能提前。他是个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他从1985年起，先后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香港庆祝回归的几个委员会及负责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建设的筹建委员会等。他为了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心愿，怀着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辞辛劳地上百次地乘飞机穿梭于香港与北京，认认真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完成自己担负的工作。

为教育、体育慷慨解囊

霍英东懂得教育兴国的意义。为了培养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急需的人才，他带头发起了振兴教育的一系列行动。1986年4月他捐赠1亿港元，协助国家教委成立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至今已有一千多位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和一些留学生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奖励或资助，其中就有像陈章良这样有成就的学者。

除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外，内地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北京服装学院、肇庆兆江大学、仲恺农业学校、三水华侨中学、佛山元甲小学、广东沙面小学及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广州教育基金、顺德教育基金等都先后得到过霍英东先生的捐赠或资助。霍英东还亲赴粤北贫困山区，在那里捐资建立了新的马头中学和羌坑小学。

香港皇仁书院敬赠霍英东博士的一首诗云：“英才培育百年功，东向幼苗迎暖风，扩展设施凭君力，学生得益感受同。”的确，对于霍英东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海内外的学子感受是相同的。

对中国体育事业情有独钟的霍英东，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予以全力支持。1984年，他捐资一亿港元成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会。1990年我国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他又捐资一亿港元，在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修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游泳馆，还捐资数千万元修建了中国体育博物馆和中国武术研究院。

霍英东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捐赠不胜枚举。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体育场馆，北京体育大学的田径场、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广州市沙面网球场、广东省军区网球场、番禺市体育场、中山市体育场、佛山市足球场、湖北英东游泳跳水馆、

上海英东网球馆、长白山冰雪训练基地、南京长江路小学红领巾游泳馆、辽宁朝阳学校英东训练馆等,也都有霍英东的捐赠。在祖国广阔的大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可以见到霍英东为祖国体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事迹。

霍英东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基于他对体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体育是强国的标志,彻底洗刷了“东亚病夫”历史耻辱的中国,必须成为体育强国。他认为体育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某些方面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他投身中国体育事业的出发点和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体育的发展带动中华民族的振兴。

霍英东情系中华,报效人民,慷慨解囊的事例不可枚举:他关心医疗卫生事业,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捐资三千多万港币,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捐资两千多万港币。为支持攻克癌症,他捐资一百万美元给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中山医科大学的眼科中心等医疗卫生单位也都得到过霍英东的捐赠。

他关心文化艺术事业,中华文学基金会、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广东作家协会、岭南画派纪念馆都得到过霍英东的赞助。

他捐资 1000 万元给中国残疾人协会,捐资给粤北一些贫困地区。他也多次捐款赈灾,救灾民于水火。

霍英东投资、捐赠,从来不是花钱了事。凡事他都追求高水平和高效率,追求一个富有新意的完美和辉煌。他要通过实践展示中国人的智慧和志气,证明“中国人行”。霍英东这位香港屈指可数的最资深的大房地产商,香港地产商会的创始者,永远名誉会长,在香港近十余年房地产价飙升十倍,可获得巨额利润的罕见时期,他却实行了工作重心和中心的转移,全力以赴参加内地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

据海外新闻媒体报道,过去个人财富排名不及霍英东的企业家,有的如今已列到了霍英东的前面,这些年霍英东个人的财富没有像过去那样大幅度的增加。这也许是事实。因为霍英东投资内地建设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求给予

他本人什么回报。他确定全部投资的收益不拿回一个铜板,而是继续用于内地公益事业和建设。至今 20 年他无怨无悔;只要他投资或捐赠内地的项目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他就是极大的欣慰。

未来的蓝图

早在 1978 年末,霍英东考察番禺时乘小船到了一个叫南沙的地方,这里是一片乱石窝、烂泥滩,河涌阻隔,人烟稀少,贫穷闭塞。

霍英东却敏锐地发现这是一块宝地,它位于穗、港、澳的中心点,是联络穗、港、澳,连接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的好地点。经过数年的深入调查,并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多方考察论证,他逐渐形成了开发南沙的设想。

1985 年 2 月 23 日(大年初四),邓小平在广州白天鹅宾馆接见霍英东时多次提到三个“三角”(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门、漳州、泉州三角)的开放问题,使霍英东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开阔了眼界,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进一步认识到珠江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经济地位。从此,霍英东确定了建设番禺南沙,连接香港,支持珠江三角洲及广东经济发展的宏大计划。

霍英东决定集中个人的精力和财力,把番禺南沙建成一座接近海之长波,连广宇于天际,扼珠江之襟要,南北接驳,东西转运,内外交汇的具有 21 世纪水准和中国特色的海滨新城。

人们至今已难以统计霍英东来南沙究竟有多少次,只知道他已走遍了他投资的这 22 平方公里的每一方土地,在南沙的乱石荒野中留下了他拼搏奋进的足迹。

1991 年 5 月,虎门轮渡码头建成并通车,这是南沙建成的第一个项目,它使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的交往平均缩短了一百多公里。目前,每天有近 2 万辆次的车通过,超过原计划通车量近十倍。全年通过人数约 3000 万人次,货物逾 2000 万吨。

南沙客运港,1992 年 3 月通航,是国家对外开放的一级口岸,每天有多次航班往返香港。近几年,每年出入境的旅客人数已逾 80

万。

南沙八车道的进港大道、十车道的港前大道、十车道的南沙大道与国家投资的虎门大桥和以此为中心的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相结合，使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间形成了便利快捷的交通。霍英东关于南沙成为珠江三角洲交通枢纽的构想已经实现。南沙新城的建成，正如霍英东所设想的那样，产生了“南沙效应”，带动了整个番禺的发展：如过去有名的穷村被称为南沙大门的金洲村，1988年收入只有37万元，而1996年的收入已高达1.3亿元。现在南沙的高尔夫球场和蒲州花园已绿草如茵，花团锦簇，富有南国园林水乡特色的水乡一条街早已建成。199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在妈祖节开光的南沙天后宫，引来四万民众，盛况空前。过去为零的南沙旅游业由此起步。

南沙的住宅、别墅、商业、科技、文化各类建筑正拔地而起，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和现代化设施相结合的美丽城市正在形成。

霍英东高瞻远瞩，为响应和落实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决定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在番禺南沙设立资讯科技园区，把南沙建设成为中国电脑软件的一个开发基地。

国际知名的美国微软公司总裁盖茨为此特地到南沙考察。霍英东集团与国际知名的爱立信、摩托罗拉、惠普、富士、施乐等大公司探讨了与南沙合作发展信息业的问题，并向国内多座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咨询。

霍英东认为中华民族要振兴，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把高科技搞上去。中央政府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向高科技发展方针及整个世界向知识经济和高科技方向发展的迅猛态势，都要求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他正是基于此，要在南沙的建设中为祖国的高科技发展作出贡献。

霍英东常说：“人的一生时间并不长，我们要抓紧时间，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霍英东又在抓紧时间办一件实事，办一件大事，南沙科技园的开发工作日程表，按年、按月、按日已经写满了一大篇。

回顾20年来霍英东经历的艰辛，人们深知等待他的是新的甘苦。然而为了实现他心中的蓝图——振兴中华，他将永远开拓，永不停步！

（责任编辑 洛松）



霍英东在南沙一建筑工地上

第一个擢升世界银行高位的中国人

——访世界银行代行长、常务副行长张晟曼

● 杜明明

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以前所没有的威力吞噬着亚洲人民创造的财富，给亚洲的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并且正在冲击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个世界性金融架构的世界银行正在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当世界银行代行长、常务副行长张晟曼答应了我的采访，我的心情可想而知了。

五月的华盛顿，樱花盛开，市中心，米白色的世界银行大厦俯瞰着不远的白宫。座落在这条 N 大街的世界银行建于 1945 年 12 月，它是由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组成，其宗旨是对用于生产目的投资提供便利，以协助会员国的复兴与开发。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各成员国——发展中国家开展生产，开发资源。这些年来，每年，世界银行都向成员国贷出几百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五十多年来，还从来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坐到过处长的交椅，而两年前，张晟曼却被世界银行行长澳尔芬森看中，鲤鱼跳龙门一般脱颖而出。

1997 年 9 月 22 日，世界银行年会在香港举办的研讨会上，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发表了举世瞩目的精彩演说时，主席台上有两个蜚声海外金融界的人物，一个是世界银行行长澳尔芬森，另一个就是主持研讨会的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的张晟曼。由于张晟曼出色的工作，

短短半年，他又从三个副行长中升为常务副行长、代行长。

在世界银行大厦的大厅，五颜六色的国旗折得平平展展，一幅压一幅地贴在墙上，构成一幅巨大的包罗万象意义深远的画，似乎象征着世界银行的宗旨。入口处，通过严格的保安检察，一个身着西装的接待员恭敬地领我到 12 层楼。

负责他的日程安排的秘书告诉我，“很抱歉，张行长一个会还没有完，请你等一下！”在她桌上的日历似的时间表，密密麻麻的排满了他的日程，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一天也不例外。我看到当天下午，周五五时以后，是一片空白，心想，好在美国有一个长周末，他可以歇息一下。谁知道，另一处写着他将去机场，直飞秘鲁，去和那里的政府会谈，审察一个援助计划，他要在那里忙上整整一个周末，要在下星期二才回来。

“张行长天天象打仗一样紧张，尤其亚洲的金融危机以来，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加上他一向低调，极少接受采访。你很走运呢。”秘书端详着我。

知道张行长是不惑之年，但仍惊讶他的年轻。1957 年生人，穿一身深色的西装，文静的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头发从宽阔的前额梳向后面。方方的脸上没有皱纹。他的办公室，宽敞简

洁,每一样办公用品都井井有条,透出一份上海人的精干。

他告诉我,他很抱歉他来晚了,因为行长去中东出差,他是代行长,从早上八点到这会儿还没有歇过,昨晚,在印尼危机观察组研讨应付的办法,晚上11点,决定要采取措施,疏散世界银行在那里的工作人员100人,今天,已经疏散了。

自去年11月,他当上常务副行长以来,每天工作不止14小时。但是他很愉快,很开心,很满意,很自豪。

“的确是很忙的日程,忙到外人不信,但是,我忙得很开心,很充实,我十分喜欢我的工作,我十分珍惜我能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机会,这是一个崇高的工作,一个可以说是伟大的工作——帮助世界上所有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减少贫困,帮助穷人,是和我过去的理想十分接近的岗位,一个十分难得的岗位,我无法不拼命工作,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世界上穷人穷国的发达作点什么,也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为中国人开了个头

“据我所知,在世界银行有一万工作人员,大约100个中国人,其中只有两个从台湾来的当到过处长,世界银行的工作充满了挑战,竞争性很强,是各国精英角逐的战场。所有担任局长及以上的职位的人能站住脚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你觉得压力大吗?”我问。

张晟曼说,“当然,有压力啦,国际组织也和任何政府机构一样,免不了争争斗斗,风风浪浪。不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一定的位置上,你就很难做你想做的事,从这一点上讲,我很走运,难得行长澳尔芬森如此信任我。我先是代表中国在世界银行工作了两年,他对我的工作很看重,一开始就请我到这里担任副行长兼秘书长。那是1996年1月。中国当然也很高兴,我就来了。在以西方人为主体的国际机构工作,是有个学习适应过程的,有不少人是有怀疑的,但事实证明了我们是完全可以胜任

的。万事开头难吧,我很高兴自己为中国人开了一个头。另外两个副行长一个来自德国,一个来自瑞典,我们合作得都很愉快。”

在他刚出任银行副行长时,许多人是抱怀疑和观望态度,冷眼看他的,他不怪这些人,谁叫咱们中国落后了呢。自世行成立五十多年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当到处级的官呢。在其它世界性的金融银行组织内,也不例外。可想而知,他的肩上负荷着怎样的压力?一年多忙下来,人们服了,人们重新刮目相看这个说话斯文,语调不高的中国年轻人。

在秘书处我拿到了一份世界银行的简报,4月8日,1998,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柔软的铁腕张晟曼在扭转乾坤。文中高度称赞张所提出并在实施的对世界银行的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改革,高度赞扬张的魄力以及他的细致的改革措施。文中盛赞张如何克服来自各方的阻力,如何建立了一个高层的调研组,将所有的副行长团结在一起,又如何请基层的工作人员参加,如何向他们解释他的改革计划,以及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统一了认识。文章作者说,他相信,我们世行十年来第一次抓住了麻烦的实质,关键所在,第一次去发展一种来自不同世界的相互工作的灵活的雇佣工作人员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去共享一种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平等的创造机会。

兴奋中加着一份激动,不知道读过多少赞扬文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金融界的中国人被洋人们这么称颂!

主操“世行”改革的舵

“看到不少报导,世界银行正在进行一场大的人事制度的改革,是由你主持的,这关系到世界银行前途的大事,人们都十分关注,你能谈一下改革的情况吗!”我说。

“目前,我正在抓人事制度的改革。从招聘到退休,晋升,是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改革,四月已经通过,正准备实施。目的是如何从各个国家招聘到最好最优秀的人才,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重新改组人事制度和系统,改掉平均主

义,工作人员要与业务相适应,有能力,多劳多得。因为这些改革都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我开始时是很担忧能否出台的呐,出台以后,能否顺利实施?要用两年半的时间去完成,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采用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且,在改革方案出台前,广泛地征求了所有人的意见,参考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几乎人人都参与了。”

“在你提的这些改革中,我能感觉到,你在中国政府机关所作的管理工作的经验似乎对你的工作很有帮助。”

他点头笑了,很同意。在到世界银行工作前,张晟曼在中国财政部任职。当时中国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及政策的指导下,正在进行经济领域内全方位的改革,当时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中国希望回到世界的经济轨道上来,中国需要象他一样的有西方金融知识有才干的年轻人,于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有了一片新天地,他有了施展他的学识的天地。他把自己整个地浸入工作,投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在处理因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中,他一点点成熟。他从小科员开始,不久就凭实力升为科长,处长。32岁时已经当上了中国财政部国际司的司长。张行长坦言,今天,他能够在国际金融机构有所作为,应当说,是得益于他在中国财政部的那段工作的,实际上,过去的不少工作和他今天作的世界银行的改革工作的性质是相同的。

他说,我的人生哲学是,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这是最幸福的事。所以我很满意自己的工作,我愿意做得好上加好。其次,是与人为善,待人以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管用的。在世界组织工作,大家的传统、文化、习惯、背景不同,但是,人的基本特点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大概正是孔夫子思想的影响,我比较顾及他人。正在进行的改革,涉及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有不少矛盾,却没有人恨我,我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我有三个秘书,一个管日程,一个管文件,一个管内部后勤事物,还有两个助理,一个管合作的,

一个负责兼作秘书长的事务。我们六个人象一个船队一样合作,工作得十分愉快,他们帮了我的大忙。他们来自加拿大、美国、瑞士等不同国家。

机遇与准备

“你能如此成功,成为中国人在世界金融界的冠军,真是令人振奋。你能谈谈其中的原因吗?”

他说,1978年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专业是英国文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奇怪的专业是当年的特产,一个畸形儿。学员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主要是工农兵学员,不过,无论如何,他利用了这个宝贵的时间,学好了一门外语,他还博览群书。为今后的人生积聚力量。果然,不久,命运的女神又来向这个有所准备的青年招手了。他毕业的1978年,正好是文革结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中国决定派出留学生洋为中用,而真正通过严格考试进入大学的尖子们还在读一、二年级的大学课程,张晟曼受到原先的姓陈的女班主任的鼓励,参加了全国统一的考试,成为第一批前往国外学习的二十个幸运儿之一,他被派到加拿大,三年后得了位于蒙特利尔的麦洁尔(MEDILL)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之后,他在1981年回国,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他成了中国银行、中国信托公司、财政部三家大单位争夺的对象。他到了中国财政部,工作几年后,就被派到世界银行工作了。

我恍然大悟,难怪他会这么快适应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这么快就被世界银行的伯乐发现挖走了,小小的年纪,在高层政府机构已经摸爬滚打了十年,加上天资聪慧,品性贤良,不出人头地才是不可能呢。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哲人早就说过。

谈到他的成功和他的成长过程的关键,他沉吟了片刻,说:“我想,有关键的几步,几次(机遇)吧。第一,是中学毕业时,我的外语老师施莉莉十分鼓励我去上大学,中学保送我上了大学。从小学起,中学到大学,我都担任班干部,当

过红小兵团长,学校的共青团团委书记等。小孩子当干部,有一些责任感是很好的,可以从小就懂得自我约束,为别人着想,同时,也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我想,自己今天的一些成功,也是得益于小时候的,得益于我小时候老师的教育和关心,现在我还保持和他们的联系,不久前,还见过我中学的施老师。”他说。

成功源于中国的强盛

张晟曼代行长坦言,他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中国的强盛。

他说:“我个人的努力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中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发达了总要给些机会,如果一点机会也没有,也说不过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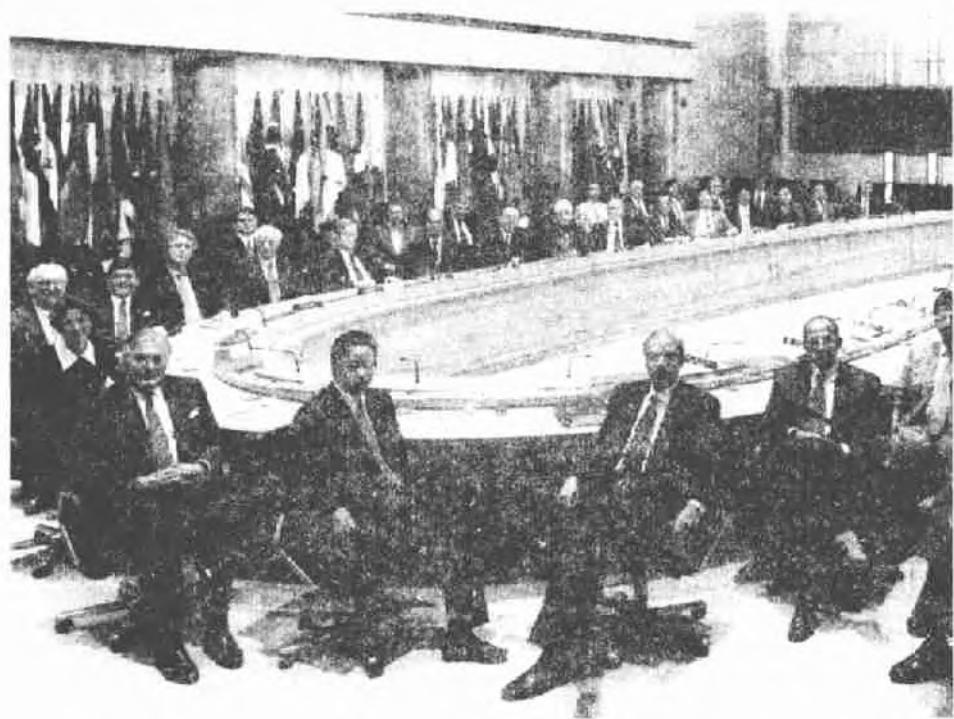
他说,不久前我们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的年会给香港争了光,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政要、金融界的名人全都请来了,来自全球两万多人,规模之大,在世界也罕见,会议圆满结束,海内外

一致叫好。作为大会的主要负责人的他松了一口气,不仅仅是通过了又一次关键的考试,向世界金融界的大亨们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胜任任何事。而且,百闻不如一见。因为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对香港的回归开始是抱着很大的偏见的。这次让他们来看一看,对消除他们的部分偏见可能会事半功倍的。

问到他自己将来的设想时,他笑了,说:“尽一切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帮助世界银行的发展,帮助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这关系到中国人的威信,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会全力以赴的。”

问到 he 最喜欢读的书是什么,他说,《资治通鉴》。他喜爱中国古典文学,象《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可惜,我现在没有时间读书,每天晚上9点到家,第一件事是打开E-MAIL,每天都有150-200个LETTERS。我要读完它,不过我总是打开音乐,同时享受一下,放松一下。

他夫人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后在澳洲国立大学读国际关系,现在也在世界银行工作。他们有一个儿子,9岁了,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谈到孩子,他觉得给孩子的时间太少了,不免有些内疚。他的父母都来过美国他的家,但他们不习惯,他们看不懂电视,不会开车,不会说英语,他们也就不爱上街,闷得慌,每次住不了几天就要回去,没办法,他很无奈,“如果我不那么忙,也许我可以多花一些时间陪他们,他们可能会在



1996年11月张晟曼(前排左二)出席国际会议

这儿多呆一段,大概正好应了一句中国话,忠孝不能两全吧。”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个为他管理日程的老秘书来自中美洲,她很有阅历并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3年,她明知我这个小小记者迈出了世界银行的大门就不会再来,当我问她对这位来自中国的行长的印象时,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路。她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行长,她见他的第一面,是一年半前的一次聚会,他亲自给每个人切蛋糕,盛在盘子里,

端给每一个。从来没有一个行长这样的没有架子,这样地平易近人。一年多来,她更了解他了,他充满了热情,对工作的热情,对世行的热情,对下属的热情,对同事的热情。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行长连续几年在整个世界银行的工作评议每年都是最高的。

“如果没有他顽强的努力,世行的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完全不可能。”这位秘书还加重语气说。

(责任编辑 徐 孔)

关于开展“故国情缘” 征文启事

一、征文宗旨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冉冉升起,标志着中国人民告别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祖国的独立与强盛,时刻牵动着游历于海外的炎黄子孙的心怀,他们当中有的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祖国建设;有的在海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力所能及的贡献。近50年来,中华民族经过艰难创业,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世界为之侧目,也令世界上所有关注祖国的炎黄子孙为之振奋。为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春秋杂志社特发起以“故国情缘”为主题的纪念征文活动。

二、征文要求:

1. 对象:主要为归国学子、归国华侨,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曾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各国友好人士。

2. 内容:(1)对50年来祖国与海外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的回忆。(2)结合自己在海内外的经历,抒发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3. 要求:应征稿件以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要求真实、具体、生动,以5000字左右为宜。

4. 起止时间:1999年1月1日到1999年10月1日。来稿请寄北京市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07

5. 征文发表:征文稿件将根据题材和内容,择优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征文结束后,评出不同奖项,颁发奖品和证书。

本刊编辑部

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

●吕 鸿



作者摄于60年代

临阵点兵,要我们立即为接待大串连红卫兵做准备

1966年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示鼓励和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起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批接见了天津来京的红卫兵,更激发了全国各地红卫兵争相来京学习、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显然周总理早已对这一形势有所估计,他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徐明(女),8月19日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点名要我立即为接待各地来京大串连的师生作好准备工作。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旧市委”被砸烂,组建“新市委”时,由国防口调到北京市来任副秘书长的。

我当晚召集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开会,布置接待任务,又恐不能满足接待需要,决定在天坛空场上搭建临时席棚。万里同志可能考虑到我对市里工作情况不熟悉,便主动帮助我召集市府各有关部门开会,下达限期完成搭建席棚的紧急任务,包括席棚区的供水、供电以及公厕等等。

周总理原来确定所有来京大串连的师生其膳食费用(含粮票)都必须由各该省市负责偿付。后来,毛主席说:来北京串连闹革命,吃饭还

要钱吗?这才来了个:各地革命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一律免费。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提议,要我担任国务院接待总站站长兼“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大串连接待委员会”主任。我一再推卸不成,在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的支持下,“接待”机构很快建立起来了。接待机构下辖:接待组、政工组、生活组、交通组、医疗组、财务组、供应组和军管、军训组等等。

接待任务始终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指导下进行的。记得周总理召开第一次关于接待红卫兵工作会议时,他让我们对接待任务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估计,我们接待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根据当时大中学校师生人数,预估来北京串联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四百至五百万。我说,这一浪潮来势很猛,来京串连人次很难控制,将可能远远突破五百万这个数字。周总理指示:应充分估计,预作准备,周全部署,留有余地。

我们不断充实接待力量,在接待总站下设立了几十个分站,分管四千多个接待点(不含郊区),构成了完整的接待工作网络。市内交通、饮食业、医疗卫生和供销社等部门全力以赴在总站统一领导下,协助各站、点实现“五包”(吃、住、交通、医疗和思想政治工作)。从全国十三个省市调来公共汽车一千五百余辆和司机六千八百余名,补充北京市公共交通力量的不足。此

外,其他省市支援北京各种主副食品达一亿五千多万斤。

国务院财办姚依林同志,遵照周总理指示,提供大量财物总值不下上亿元,其中包括棉衣、棉被、手套、鞋袜、衣帽……草垫、草席等等。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同志亲自担任铁路指挥领导小组组长,我为副组长,统一局、分局和站的铁路运输指挥调度工作。为完成好红卫兵进出北京的输送任务,一度将一般客运集中到西直门车站,而腾出北京站和永定门站专门供输送红卫兵使用。平均每天进出各六十余列火车,最高时多达一百余列。

军委、总政也十分关注接待工作,为保首都安全,曾专门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叶帅亲任组长,下辖若干小组。专门选派解放军官兵上万人,参加对红卫兵的军管、军训工作。他们将红卫兵按班、排、连、营编组,并和红卫兵小将同住同吃同军训。

头等任务,组织一次一次的 天安门“大接见”

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除了在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外,更重要的是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大接见”,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因此,他们往往力争在京多逗留些时日,有的参加一次“大接见”还不满足,要继续等到下一次的“大接见”。以致来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而离京的红卫兵则越来越少。据我的回忆,一天之内在京的外地红卫兵最多时曾达300万人。从1966年8月起至1967年2月(包括中央决定停止大串联和徒步大串联)为止,总共接待来京串连红卫兵达1100万人次。

每次“大接见”之前,周总理至少要召开三次会议进行研究布置。第一次会议,是让我们提出若干具体“接见”方案;第二次会议,是经请示毛主席(当时还有林彪)后,通知我们按哪个方案去作准备;第三次会议,是确定“接见”的具体时间(×月×日),而且最多提前20个小时,让我们按此做周密的布置。每次会议都在深夜一、两点钟之后,在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举行。会议

时间都不长,最多一小时,很有效率。会后都安排夜宵,并一律免费。只有周总理每次都让随从按价付钱并交粮票。

每次“大接见”中,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这是我们无可推卸的神圣职责。每次对于被挑选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小将,我们都要进行极其慎重而严密的审查。但由于这种挑选主要依据各省市领导机关介绍的情况,而各地红卫兵又大都分为两大派,选这一派多了,便激起了另一派的不满。有一次惹得数百人到接待站来造反,把我弄到院子里围攻、批斗,从早饭后一直到午饭后仍不放我。接待委员会副主任之一王念基同志(全国合作总社副社长)挺身为我解围,他向这些红卫兵讲:“同志们!你们不要老是围攻吕鸿同志了,他是接待站站长,还有不少工作要他去办理,你们要斗就斗我好了,分配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也有我的责任……”但是这些红卫兵那肯轻易放了我,他们七嘴八舌地轰王念基同志走,说:你算老几,你能解决我们上天安门城楼的问题吗?快滚开!……

每次“大接见”尽管我们都为参加接见的外地红卫兵划分了严格的区域,但每每临近接见,红卫兵们总是尽可能地向天安门前紧靠,使我们几乎每次都要重新整顿一下现场秩序。“大接见”的总指挥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我是副总指挥,天安门前的具体指挥任务由我负责。我站在观礼台上的话筒前,高喊着:“亲爱的红卫兵同志们!请肃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到天安门来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呀?”下面万口一声地回答:“高兴!”我又说:“红卫兵小将们,最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吗?”又是万口一声地回应:“是!”我说:“那么大家请听我的口令,好吗?”万口一声回应:“好!”接着我便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向后转!开步走!”待大约半分钟后我又喊“立定!向后转!坐下!”就这样,使天安门前拥挤的情况,得到较好的解决。

临时动议,毛主席为 我们出了大难题

有时倒是毛主席自己的临时“动议”,为我

们出了大难题。例如，有一次毛主席突然从天安门城楼走下来一直到了金水桥头，顿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天动地，大群红卫兵像潮水般地涌向金水桥。我和警卫人员深怕毛主席被人流冲倒，赶忙拼命上前手拉手地阻拦这涌上来的人群。好不容易地把毛主席领上了观礼台，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紧紧关上了观礼台的铁门。这次没有出现闪失，实在万幸。还有一次，毛主席临时修改原定接见方案，要求乘坐吉普车在人群中走一遭。这一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我慌忙地带领警卫部队，硬是在人海中开出一条环形弯道，其宽度必须能通过一辆吉普车。我们在环形弯道两边安排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警卫部队官兵组成；第二道防线由北京市红卫兵组成；第三道防线由我们派出的军训解放军所带领的外地师生红卫兵组成。在迅速完成这一布置后，才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开出来绕行。没有想到，将要接近走完一圈时，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个外地来的带红卫兵袖章的成年人，一下子躺倒在毛主席车前，险些发生意外事故。位于二、三道防线的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抢上前去，一窝蜂式地把这人连拖带拉抓到天安门前的指挥室。红卫兵怒火中烧，抡起带铜扣的皮腰带，没头没脸地向这人身上抽打，边打边嚷，忙乱中有人把热水瓶向他头上砸去，顿时这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谁也不敢出面干预。我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大声呼喊扑上去：“同志们！别打了，别打了！万一打死了，就无法问出口供了！事情不好了结啊！”边喊边上前阻拦，我肩膀上也挨了好几皮带，幸好没有击中头脸，然而鲜血溅了我一身。最后总算制止住了这场残酷的打斗，这人已经趟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立即叫了几名警卫战士把这人带走了。以后，怎么审讯的，我也顾不得去过问了。这次“大接见”后，我不得不回家去换洗衣服，老伴见我满身血迹吓了一大跳，她还误以为我挨打受伤了呢！

令人痛心的是在大串连、大接见中，总是出现一些伤亡事故。特别是在大接见中，由于人们都期望更近一点看到毛主席，而不顾一切地向前拥挤。结果使一些年幼、体弱的学生被挤伤踩伤，甚至个别的死亡。

我曾经多次代表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去看望慰问伤残住院的学生。每每看到那些因伤截肢的少男少女，我的心疼痛得都要碎裂了。然而此时此刻，我不敢在他们面前流露丝毫的苦情。因为，他们不但没有一点怨尤之意，相反地还兴高采烈地大谈参加“文化大革命”受毛主席接见的的光荣。

有一次，离京返程的广西红卫兵，发生了由于争抢车位，二人被推搡挤倒当场死亡的惨剧。这件事，本来直接原因是红卫兵们自己不听站上军警指挥造成的。但是，他们迁怒于接待站，次日一大早给接待站下达“通知”，指名要我去北京车站解决问题。我怕万一再出什么事，便答应了广西红卫兵的要求。我一到车站，便受到了“炮轰”式的批斗。我也只好向他们赔礼道歉，承担起未能组织好这次车站秩序的领导责任。可是，他们并不就此满足，向我提出：一定要追认这两名惨死的红卫兵为“革命烈士”。我很清楚，这一要求决不可答应，便说：别的要求可以商量，追认为烈士我没有批准权力。他们一听，又对我发起了一个围攻高潮。他们愤怒地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承认不承认毛主席号召领导的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我只能回答说“是！”；他们又质问：“国务院通知红卫兵到北京大串连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也只能答说“是！当然是！”；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地质问：“那么为大串连革命行动而牺牲的红卫兵是不是为革命而牺牲？”我也只能回答说“是！是为革命而牺牲啊！”他们乘机归结到本题来质问：“那么，你为什么说不能追认他们为烈士？”这一连串的追问，实在咄咄逼人，令人一下子很难据理讲清楚。但我不能不反复向他们讲两点：第一，在天安门“大接见”中曾有由于拥挤被踩倒致伤致残甚至当场死亡的，也有南方来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来时衣着单薄途中冻伤冻死的，就我们所知没有给予他们革命烈士称号的先例；第二，我们接待总站本身没有批准谁为革命烈士的职权。这时，他们又要我答应代他们向上提出申诉和申请批准革命烈士的要求。我婉言地表示：“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是受国务院周总理直接领导的，不要说

我们不应当把矛盾向上推给我们大家都敬爱的周总理，即使我们把你们的申请上报到周总理，那不是给他老人家出难题吗？假如周总理批了你们这两个为烈士，那么其他类似死了的红卫兵怎么办？我们能这样忍心给敬爱的周总理添麻烦吗？……”

长时间的艰难的谈判，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在车站食堂免费招待他们吃了午餐又吃了晚餐，是时间钝化了矛盾，渐渐双方气氛缓和下来。最后他们又提出要求把这两位死亡的红卫兵用棺木存殓，车运广西南宁。我慎重考虑后，答复满足他们这一要求。次日天刚亮，我便陪同他们一道到同仁医院停尸间，最后看了这两位年轻的死者。

处心积虑，在红卫兵 两派纠纷中周旋

在接待站工作的日子，最劳心的是处理红卫兵两派的关系，即考虑如何在两派之间周旋。

我们接待总站所在地的先农坛就存在着两派。一派是以运动员为主体组成的；一派是以工作人员为主体组成的。两派都要求我支持。我思前想后，把两派的头头请到一起，我说：你们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们的革命行动，我都要同样支持。但我是奉周总理之命搞大串连接待的，而不是来搞运动的。我要完成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得到你们两派的共同支持。打开天窗说亮话，假如我只站在工作人员一边，你们运动员非把我打出先农坛去不可；假如我只站在运动员一边，工作人员一旦对我停水、停电、停伙……我也就寸步难行了。所以，请你们双方都要谅解我的苦衷，共同支持我去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接待任务！

我来上任，先贴了这样的“安民告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又一直遵循不介入两派运动中的事、慎之又慎地处理两派纠纷的原则，把总接待站大本营的形势稳定住。

对外地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底细，我们强调不管是什么派，什么观点，都一视同仁，热忱接待，妥善安排。但是，既然有派，有派性纠纷，那你也是无法躲过的。

开始我们总是把同一地区来的红卫兵安排在同一个人接待点。谁料两派在一起，就免不了发生纠纷；纠纷一旦发生，就打电话给接待站，点名要我去。甚至说：“限你马上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否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一切后果由你负责！”这样的“勒令”式的语言，那时我都听惯了。

有一次，河南的两派都安排在农机学院，两派在该院发生争执，农机学院掌权的一派又参与进去，支持了其中的一派。另一派感到受压抑，参加过“大接见”后想早些返回河南，农机学院偏偏有意识地把他们的车次拖后安排。总站按照要求早离京的优先安排的原则，应这一派的要求，发给了他们最快、最好的车票。然而，就因这点事，闹了一场乱子。河南对立的一派和农机学院造反派认为接待总站有偏有向“支保不支革”，给总站下达“哀地美教书”点名要我到农机学院作交代。



1966年9月，睡在楼内地板上的红卫兵

我一去就被带到农机学院造反派早已安排好的会场里,对我进行批斗。

因我早有思想准备,策略是先让他们出气,任凭他们批斗够了,再耐心做解释工作。我先说接待站办事欠周全,没有事先与农机学院接待站通气。接待总站有责任、有错误,我作为负责人应负领导责任。又说我们接待站都是“派盲”,对于所有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分不出哪个“保”哪个“革”。最后,我加重语气特别强调说:“周总理也是这么交代、指示我们的,对所有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要一律好好接待。”这时全场才慢慢肃静下来。

这时,我又再一次检查主观上的原因,承认工作粗糙了,诚恳地向他们赔礼道歉,请他们谅解。大会结束后,我又与农机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一起吃饭,饭后参观了他们的接待站,同他们交谈接待工作体会,直至深夜,双方都异常兴奋。大概是彼此增进了理解的缘故,次日清晨他们为我送别时笑着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明天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要到先农坛夺你们接待总站的权。”我很清楚,这是他们给我善意地打招呼,我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并匆匆离去。果然,

就在这第二天,造反派真的去夺权了,但我注意到,参加夺权的北京高校的造反派中唯独没有农机学院的人。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权,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2月下旬,北京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夺权,新市委以刘建勋为首的全班人马基本上处于“靠边”地位。三月初我们接待委员会也被北京各大专院造反派联合夺权。他们白天开会对我进行批斗,晚上仍然要我主持接待工作。

先农坛南边的大墙上,用红漆涂写了近四平方米一个大字的大标语:“火烧吕鸿!”“油炸周荣鑫!”我的最大的罪名,就是在“大接见”中发生过伤亡事故,他们把责任一古脑推给我,在批斗我时朝我喊“向吕鸿讨还血债”的口号。

不久,中央明令停止全国大串连。接待总站的任务才算告了终结。并在我要求下离开了北京市委,调回了我原来的单位国防科委。

(文中插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洛松)

勤勤恳恳勇当党的喉舌 一如既往继续奉献读者

欢迎订阅
1999年度

中国老年报

周二刊
三、五出版

全国邮局开始收订 请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

《中国老年报》是邓小平同志题写报名的全国性老年报纸,深得广大老同志、离退休工作部门和其他涉老部门的关心厚爱,连续4年发行量在40万份左右。

《中国老年报》1999年继续出版发行,报价不变,每份定价0.54元,每月4.60元,每季13.80元,半年27.60元,全年55.20元。邮发代号:1—133 国外代号D1059

如当地邮局订不到,竭诚欢迎涉老部门和新、老读者直接汇款到本报办理订阅手续。集体订阅,尤为欢迎。

汇款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编:1000832 电话:(010)68524081

为深圳第一声喝彩的来之不易

●林 里

一

60岁生日那天,我辞去了《市场》报的领导职务,回到人民日报记者部作记者。

1982年2月10日我踏上了赴深圳的征途。

深圳,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勇敢尝试和伟大创举。

但是,成功和失败,还没有分晓。一切都还在试验之中。

我是怀着看一看的心情到深圳去的。就是说,能报就报;不能报就算。

按照历史习惯,试验中的典型,中央党报一般不做报道。我们所报道的典型,几乎都是成功了的,中央领导人肯定了的,绝对有把握的。就是说,我们的传统习惯,是只报结果,不报过程。报过程多是事后回叙,又叫倒叙。

那时,特区是否继续,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对深圳,不光议论多,而且争论多;说好话的人少,说坏话的人多。总之,是个“有争议”的地方。要是在过去,碰到这种情况,就要绕道走,躲过去,因此,当我准备去深圳的时候,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要去冒险。说经济特

区的政策性强,难度大,是非多。弄不好,栽个跟斗。

我承认,深圳经济特区确有政策性强,难度大的特点,但是,我认为,最本质的特点,是新事多,新闻多,是个出新闻的地方。我坚定不移地去了深圳。

二

深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60年代前后,我国人民处在暂时性的经济困难时期,我曾多次去过深圳,还一次又一次去过那个神秘的沙头角。……我第一次去沙头角,看见的是穷乡僻壤。商店里的货架子上,空空如也。商店对面,由港英管辖,比我们这边也好不到哪儿

去,那些本来也是商店、茶室、杂货铺的小屋,多变成了赌场,挤满了喝五吆六的赌徒。此情此景,当然触动了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感情,他立即下令:要商业部门调拨物资,迅速把商店里的货架子摆满商品,还要宝安县逐步把沙头角办成社会主义橱窗。目的是感化对面的赌徒,促使他们改邪归正。

可是,过了一年,再到沙头角,我看见了甚么呢?

原是空空荡荡的货架子上,确实摆满了东西。我欣喜若狂,大步跑上前去——

“哎呀!怎么全是空瓶子?”我大失所望。

“唉!……”陪我前往的宝



深圳特区城市规划局长胡梅英(左)接受采访

安县的县委书记李富林同志，对我的质疑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深怕我的问话被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听到。他皱起眉头，急忙把我拉到一旁，悄声低语地说：“没东西呀！……省里的商业厅长来了，供销社主任来了，地区的财贸负责人也来了，然而，来了又有什么用？——社会主义橱窗，谁不愿意马上装点起来？可是……”他把两手一摊，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这天晚上，我们要在深圳住宿。还要召开会议。然而，深圳——宝安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却找不到合适的住所。我们是在罗湖车站的火车上，听取地委、县委的汇报，又在火车上过夜的……

80年代的第三个春天，我再次去深圳。我看到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是热气蒸腾的建设场面。深圳，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了往年的过客，我满怀激情，跑来跑去，走上走下，无论如何奔波、寻觅，都找不到记忆中的深圳了。我震惊，我激动，我不知道如何倾诉我的感情。

沙头角的穷乡僻壤，砖土矮房，一下子变成幢幢别墅。街道上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台球，在内地被当作高雅、尊贵的游戏，过去为专家、学者、外宾所享受。真想不到，沙头角的俱乐部，不但有高级台球，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机器。全是供渔民、农民、市民玩耍的。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虽然生活在京都，离开广东才三年多一点，但是，深圳的变化，着实令人吃惊，着实使人有种相隔数十载的感慨。

三

在广州，碰到几位外出回国人员。说起深圳，他们同样感慨万千。他们把深圳的巨大变化，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西柏林，说深圳人就像当年的德意志人，拼命工作，忘我劳动，不知疲倦地建设祖国，建设家园。

省里的负责干部告诉我，深圳特区虽然开办只有两年，但是，深圳已经引进外资77亿元港币。我问他，77亿元港币是个什么概念。对方回答说，相当于全国解放以来，国家对广东全省各项建设事业投资的总和。

负责干部的回答，使我一下想起了茂名。那是70年代初期，我到那个新兴的南国油城采访。茂名的建设者告诉我，油城是国家投资三亿元人民币建设起来的。他们对于三亿元投资倍加称赞，看成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是啊！三亿元人民币建起一座新城，那么，这77亿元港币，少说也合20亿人民币，相当于六七个茂名！

何况77亿元港币，仅仅是深圳引进的外资，要是算上全国各地和省市投资，那又该是多少钱呢？又该建设多少高楼大厦，多少个茂名呢？

深圳，的确是建设起来

的；深圳，决不是“吹”起来的。

有了这个结论，我决定写文章，我认为这是个大主题，应该写大文章。

于是，我再次向市委负责人请教，向建设深圳的人民群众请教，目的是培养感情，酝酿主题，润色表现主题的语言、措词。

我记不清是什么场合，无意中发现市、局一级的负责干部，几乎全都没有带来家属。便问：“不带家属意味着什么？”

“你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呀！看问题怎么老是那么天真？”当年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边开玩笑，一边振振有词地回答。听到这个回答，我越发感到事出有因，便请他继续阐述他的观点，说得更明白点具体点。

这位老相识，终于同我敞开心扉，诉说了建设者们“不太高兴的一面”“忧虑的一面”。1981年底，中央下发打击经济犯罪的文件，全国各地立即展开了清查经济犯罪的斗争。我丝毫不怀疑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我知道，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在深圳，却是教训多于经验。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

深圳的朋友告诉我：“办案人员一到深圳，就说深圳百

分之八十的干部烂掉了。又说,在这烂掉了的百分之八十的干部中,百分之八十经济收入是非法所得。

“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深圳没有经济罪犯。但是,三个百分之八十,肯定没有。再说,经济罪犯,也并不是经济特区的特产。50年代初期,我们的国家没有经济特区不也曾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

“就眼前事实来说吧!大案、要案,都不在深圳。——电子公司属下的那个深圳分部,确实揪出两个人。可是,他们并不属深圳所有,是四机部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我们是走资派。我们不服。后来,说我们不是走资派,‘解放了’,还要我们感谢这,感谢那,还要我们正确对待,要是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或者小革命,我们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不就是首当其冲的被斗户?”

“我们的忧虑,并非多余,更不是痴人说梦,经济学界的某些同志,早在1981年夏天,就给我们准备了帽子,就给经济特区下了断语。说经济特区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特区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在经济特区工作的负责人,还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岂止是走资派?还有人试图扣我们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呢?有个研究室发了个文件,把经济特区比做旧中国的殖民地。还在文件开头加了按语,要我们警惕。警惕什么呢?”

反正是上边一阵风,下边一阵雨。——有人把我们的房地产业,说成是出卖国土。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语言,都用上了呀!”

一面是壮严的斗争,一面是无穷的忧虑。不排除掉这些流言蜚语,建设经济特区的人怎能轻装前进?——建设者们要我说话,要我仗义执言,申张正义。要求舆论支持,要求报纸如实反映深圳的现实。做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我怎能袖手旁观?又怎能置之不理?

我要按照我的理解,说我想说的话。

我深深懂得“帽子”的份量,也饱尝过“棍子”的味道。我不知道我“罪该万死”了多少次?我只知道,我活了过来,而且还活得不错。

怕死,就不能当记者;怕死,就不配当记者。

四

摆在面前的,是一场硬仗。

想起这些,我又一次“过滤”了我的材料。我虽然掌握了足够的素材,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我还是把我准备写的地方再“走”一遍;把我准备要用的材料,再核实一番;数字,人物,事实,核对再核对,力争无懈可击。

通过这些劳动,确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确有一种“非写不可”的“冲动”,我恨不得一口气把稿子写好,立刻发回编辑部。到了这种时候,连表现形式、写作方法,也都逐

渐有了眉目。我决定用新闻形式,发简报,发快报,暂时不写大文章。目的是想早日刊登。蛇口人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简直就是我的行动纲领。我想在深圳写稿,电传发稿。

一打听,新华社的电讯稿,在深圳发要排队,而且一等就是四天。还只能发到广州,然后转发北京。

人民日报的稿子又要排几天队?没人回答。于是,我决定赶回北京。时间是1982年3月1日。

我原本是准备到下面生活几个月的,我的突然回来,不免引起记者部同志的惊讶。

但我不管这些,想的是立刻动手,写报道,用我的劳动成果,说明匆匆返回北京是多么必要和正确。

说老实话,去深圳以前,我确实有所追求,有所探索。我对我们的报纸并不完全满意,特别是新闻,呆板,沉闷,可读性越来越差,更谈不到生动活泼和喜闻乐见。我想改革,想通过自己的实践,闯出一条新路。然而,这时,我却顾不得这些,反而一再告诫自己:现在的头等大事,是宣传深圳,报道深圳,通过深圳的宣传报道,使人相信经济特区应该办,能办好。我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宣传深圳,就是维护对外开放,就是维护三中全会精神。如果说,党报记者的职责是为党的路线服务,为国家的政策服务,那么,宣传深

圳就是一个侧面。

于是,我再次修订我的计划,再次确定深圳报道的基调。由此出发,我甩开创新之想,决定用常规的、标准的新闻模式。要多写眼见的,少用耳闻的。材料要丁是丁,卯是卯。不夸张,不渲染。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我认为,眼前的“读者”,是一些不容易说服的人,要这些人相信经济特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确实要付出双倍的劳动。因此,我进一步明确:多摆材料,少发议论。让读者自己做结论。我又把这些归结为一句话:纯客观的反映,或者纯客观的显现。

此外,我还吸收了“正面宣传”的优点,使用了大家所熟悉的语言,大家所公认的形式,以避免节外生枝,贻误大事。

写成,我又摆脱掉“记者的我”,回到“编辑的我”,再把稿子重新审查,重新修改,重新推敲,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了,这才送到记者部。

我写了“外引”,写了“内联”,主题只有一句话:

深圳各项建设 都在正常进行

我的意思是说:别再疑神疑鬼了,天塌不下的;还是放开手脚,让人家深圳干吧;即使出点毛病,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五

就在送走这条消息的第二天一早,我还在似睡非睡的迷梦中,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了《人民日报》的一版头条新闻:

中国电子公司深圳分部走私逃税牟取暴利,当事人被停职检查

我立刻一惊,赶忙扭动收音机,放大音量,听了一遍又一遍。当我断定广播的确实是人民日报的一版头条新闻的时候,我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我首先想到的是深圳的命运,也想到我的那条消息,我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完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出条新闻,这一下,肯定给枪毙了!”

枪毙一条新闻事小,深圳

经济特区如何办事大。再说,对外开放政策如何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如何体现?

在我的经历中,我们的报纸,从来都是“一边倒”。好的典型,不报则已,要报就是“一连串”。在这期间,不管有多少不同意见,也都一概不理。至于坏的典型,当然,要报也是“一连串”。在这“一阵风”没有过去以前,好便绝对的好;坏便绝对的坏。否则,就是“抹黑”,就是“唱反调”、“对着干”等等。“允许刊登反面意见”的话,确实说过,但是,很少兑现。在同一个时期,报好又报坏,或者报坏也报好,不光十年内乱时期绝对不可能,就是50年代,也很少先例。想起这些,我再次断定:报道深圳成就的那条新闻,肯定登不出来了。

然而,我错了吗?没有,我坚信。深圳没有错,深圳是按照



深圳特区最早涌现的三大改革者之一邹洪(左二)传经说道

党的政策办事的,深圳特区是按照国家指令创办的。我的报道也没有错。宣传深圳,报道深圳,支持深圳,都没有错。问题是时机没有选好。根据这些考虑,我想提个意见,建议编辑部把我报道深圳成就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建议还没有书写成文,第六天早晨,1982年3月17日的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再次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好像还是那个播音员,还是那个固定的时间,还是人民日报的一版头条新闻: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加速进行

我忽地坐了起来,披衣静坐,洗耳恭听。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可能的吗?是我写的那条消息吗?”

以至于连续听了三遍,我才正式承认那是“我”写的新闻。

“大转变,大突破,编辑部的一个巨大变化”。我激动异常,就像看见深圳一片兴旺繁荣那样。我暗自祝福我们报纸的历史性进步。

“揭发坏典型,不到一周,就宣传深圳的建设成就,这不是突破了‘一边倒’和‘一阵风’吗?这不是突破了形而上学,增多了辩证法吗?”“报道深圳成就,固然是肯定深圳,称赞深圳。所谓试验中的典型不做报道的框框,不是不摧自毁了吗?不是又一个突破吗?”

我为深圳祝福,为深圳高兴。

很快我又接到深圳一位领导同志的长途电话。说人民日报的新闻,是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有力支持。市委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表示衷心感激。电话上还说,人民日报的头条新闻,英国、法国、美国的电台都广播了。可笑的是,《美国之音》在广播《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加速进行》这条消息的时候,竟把深圳错读成了深川。说明直到1982年春,美国的舆论界,对于中国的经济特区还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要不然怎能把深圳错读成“深川”呢!

反应如此快速,又是大出意料。自然引起我的更多联想,以致于整天不能平静。我想了很多、很多。从记者的良心、记者的责任,想到记者的职业道德,想到党的培养,前人的教导。我把前人的教导,一条条,一句句,拿来同深圳实践对比。把前人的教导,同深圳采访的体会揉合在一起,居然列出十多条。现在重新整理,公布于此。目的是供同行们参考。

为强者唱赞歌,容易;为弱者抱不平,就需要勇气。

当着大家都在齐声欢呼,为强者纵情歌唱的时候,新闻记者应当勇敢地站起来,献上一盒清凉油。

赞歌,听起来舒服。不过,听得多了,也容易神魂颠倒,忘乎所以。

赞歌,能使强者精神焕发;赞歌,又往往使弱者昏迷转向。

记者要有自己的见解,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随声附和,亦步亦趋,不是记者的道路。

当形势已经明朗,结论又为众所周知时,你再去咀嚼别人吃剩下的馍,当然没有味道。碰到这种情况,就应该另辟新路,超过前人,胜过前人。千万不要把残羹剩菜硬塞给读者。

写文章,也像工人开矿、挖金,庄稼人种地那样,你付出多少劳动,就有多少收获。没有窍门,没有捷径。关键是不知疲倦地奔波、跋涉、攀登。

处处有新闻,遍地皆文章。

新闻记者应当是走到那里,写到哪里;

见到什么,写什么,不存在能写、或者不能写的问题。

先进的,写经验;落后的,写教训。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

批评和表扬,只有一个标准:有益于人民。歌颂和暴露,也只有一个标准:有益于人民。

不畏强暴,不欺弱小。新闻记者应当是一切民族美德的忠实继承人。

(责任编辑 洛松)

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

● 高 梁

编者按：今年12月16日，是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的20周年。在两国建交前的1971年4月，毛主席、周总理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大大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国际局势的新发展。高粱同志的这篇回忆文章，已选入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驻外记者丛书》，经征得该丛书主编及作者同意，本刊本期先予发表（略有删节），为此特致谢意。

1971年3月至5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随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采访了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随后，1972年4月，在中美关系断绝达22年之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这时我也陪同访问。我有幸经历了由毛主席、周总理发动的世界著名的“乒乓外交”全过程，亲身体会到由“小球推动大球”带来的国际格局的重大转变。

赴日采访前，世界格局已开始发生变化

记得是那年春寒料峭的2月，我接社通知，派我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采访。我为能领受这项光荣任务而高兴，但更多的是感到突然和不安。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五年之后第一次正式出来工作，对业务已感生疏；日本又是我第一次去访问的国家（过去我长期

在印度、非洲国家工作），情况很不熟悉。特别是，我向来没有随同体育代表团出访的经验。

这次31届世界锦标赛，是我国乒乓球队，也是我国体育界在事隔多年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比赛。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第29、30届世乒赛。如今，有了再次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运动员们一个个犹如生龙活虎，斗志昂扬，每天都在汗流浹背、废寝忘食地勤学苦练着，立志夺取好的成绩，为祖国争光。

当时，国际形势已在起着重大变化，世界舆论普遍议论着所谓的“大三角”关系，认为世界上已出现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新格局。原来反对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已多次发表讲话，承认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表示愿与中国接触和对话；后来，他还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内部渠道，向我国传递了他愿派人或亲自访问中国的信息。

在中国，自1969年中苏边境发

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紧张以来，毛主席、周总理一直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注意观察着尼克松的每次讲话和行动。当时，毛主席还特意指定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没有恢复工作的老帅定期研究国际局势，四位老帅向他和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打开中美关系僵局，保持中、美、苏战略格局平衡的建议。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同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着重谈到：“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周总理也通过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递口信，表示原则上同意尼克松总统来访。

对于以上未公开的中美高层接触，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知道。但尼克松的屡次讲话都已公开发表，毛主席同斯诺的讲话也在一定范围内传达。然而，我心中却忽略了这个世界大局，只想怎样把比赛报道好，却没能把这次出访任务同这样的世界大局相联系。

周总理邀请后藤 钾二来华商谈,并对 参加会谈的中方同志 说:“你们不要那么 ‘左’”

事实上,在我们集中报到前的一个月,周总理已经有了派乒乓球队参加31届世乒赛的打算。他要中国对外友协和乒乓球协会打电报,给主办31届世乒赛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邀请他来北京商谈我队去日本参赛之事。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事业的创始人,对中国一向友好:他应邀于1月25日来到北京,同中国对外友协和中国乒协的负责人商谈中国参加31届世乒赛问题,双方决定发表一个会谈纪要。事前他主动表示,愿在纪要中的第二条标明日方愿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的承诺。没有料到,会谈中,中方负责人坚持要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写进纪要中,并要求他把“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这段文字突出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这使后藤感到十分为难,他再三提出不同意这样写,中方同志坚持己见。于是,几天的会谈进入了僵局。

当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在1月29日的午夜,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和对外友协的有关同志开会,说:像后藤这样的友好人士,我们要设身处地替他着想。周总理指出:“凡事要看实质,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既然后藤主动提出把“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写入纪要,就表明他认为台湾是中国

的。关于‘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那句话,何必坚持要他再写入纪要呢?!我们要从具体对象出发嘛!”最后他指出:“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份了。你们不要那么‘左’!”。

第二天,周总理接见了后藤等日本友人,表示中国队决定赴日本参赛,并坚决支持他把31届世乒赛办好。同一天,中方同志不再坚持原议,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会谈纪要。

周总理对中日会谈纪要的发表很高兴。当时,“文革”动乱已经持续五年了,不仅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外交方面的自我封锁状态仍在继续,急需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加世乒赛不仅是他所设想的打开局面的第一步,而且他看得更高更远,已在认真考虑着接踵而来的第二步呢!

后来,事隔很久,我们才知道,在中日会谈纪要签署后一个多月,周总理曾同外交部、国家体委有关人员,意味深长地这样谈过:“这次我国乒乓球队参加31届世界锦标赛,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他要求在座的同志“动动脑筋,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然而,对周总理这个高瞻远瞩的想法,在座的同志们都琢磨不透,因此也没有重视和向下传达。

事实上,周总理当时已预计到美国队可能提供一个适当的形式和契机,可以用它做敲门砖,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中国运动员在比赛 和友谊方面双丰收;但 周总理要总社打电传 批评我,“为什么只报 赢,不报输”

3月18日,由60多人组成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北京赴日本。德高望重的郭沫若副委员长到机场送行。

3月21日晚,东京机场两千多名日本各界朋友前来热烈欢迎代表团。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第一个访问日本的大规模代表团。许多友人高举欢迎的横幅标语,手执中日两国国旗和鲜花前来欢迎,机场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3月28日下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在名古屋“爱知县体育馆”隆重举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列队入场。

从3月28日起至4月7日,在为期11天的锦标争夺赛里,几百名来自各国的乒乓将星参赛,气势壮观。中国运动员个个龙腾虎跃,擦拳磨掌,猛打猛攻。其中老将,如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林慧卿、郑敏之等,他们久经战阵,宝刀未老,斗志丝毫不减,反而更加旺盛;年轻新秀,如李景光、郗恩庭、林美群、郑怀颖等,更是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各有绝招。特别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赛的20岁小将梁戈亮,活象“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包袱,主动扣杀,往往险中出奇制胜。他们不知经过多少险仗、硬仗,一局一盘地战胜了掌握“弧圈球”强大攻势的欧洲国家的选手,最后与日本男女队在团体赛决赛中相遇。决赛中,中、日运动员

更是勇猛抽杀,反复较量,人人挥汗如雨,球球扣人心弦。结果,中国男队取得团体赛冠军;日本女队取得团体赛冠军。在男女单打中,中国女队员和瑞典男队员分别取得冠军;女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均由中国队员取得冠军。

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取得优异成绩,而且也打出了风格。他们广交朋友,传播友谊,同各国运动员共同练习,交谈经验,虚心向对方的长处学习。中国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成了31届世乒赛中最响亮的语言。

在锦标赛开始前,国际乒联举行会议,中国、朝鲜、罗马尼亚和阿联四国代表联合提出紧急提案,强烈要求把朗诺集团和西贡傀儡集团的所谓“代表”驱逐出国际乒联。提案虽未被通过,但这一正义立场却得到广大舆论界的重视。

中国男子第一号选手庄则栋和女子横板新秀林美群,按抽签结果,在单打比赛中分别与朗诺集团、南越西贡集团的选手对阵。为支持柬埔寨王国和越南南方临时共和,他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弃权。他们的行动博得了舆论界的赞扬,普遍认为中国运动员是有原则性的。

我们记者看到比赛中这种热烈紧张的气氛和中国运动员们这样出色的成绩,也都随之激动不已,写了充分的报道和特写发回国内。一天,新华社突然发来电传,指出我们漏报了我国运动员曾有一场被打输了的,提醒我们今后注意不要只报赢,不报输。这时大家才冷静下来,经过检查,发现由于我们头脑发热,的确有一场输球的消息漏发了,我们立即如实地补报回总社。后来,待我们回国后,才知道这是周总理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收到庄则栋的礼品非常高兴

提出的意见。据当时总社值班的丁翔起同志告诉我:周总理每天都在看我们发回的消息,他叫秘书打电话,指名要我把那场输球的消息发回,批评我:“为什么只报赢,不报输。”听到后,我十分感动,这是我记者生涯中永远难忘的一次教训啊!

中、美运动员友好接触;美国队员和记者希望访华;中国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消息震动世界

在名古屋,正如周总理预料的那样,中美两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中美运动员之间开始有了友好接触。

最早主动来接触的是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他也是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年近60岁。虽然中国代表宋中在国际乒联会议上指责朗诺集团是由“美帝支持的傀儡”,但斯廷霍文在会后仍主动找他寒暄,盛赞中国队员的高超球艺,强调中

美两国人民应友好相处。

中美运动员之间也有了接触。有些美国运动员常爱在体育馆观看中国运动员练球,很想同中国运动员交流球艺。有一次,一个叫雷塞克的美国队员找到马文豹、张燮林,向他们请教球技。当时因语言不通,我正好在场,为他们做了翻译。

我同前来采访的美联社东京分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也有多次接触。抗战时期他就在中国做记者,1946年曾为采访国共两党谈判,到过延安,同周恩来会见过。另外一名是美国体育记者理查德·迈尔斯,40多岁,他年轻时曾获美国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眼下是美国《体育画刊》的撰稿人。他几乎每天每场都来观看中国队的比赛,一边看一边评论着。他们两人都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来采访,罗德立克还要求会见我国代表团负责人。我把他们两人的心情和要求向代表团做了反映。

一天,我们正在办公室发稿,忽听外面一片喧哗,说是庄则栋正在同美国一位名叫科恩的“嬉皮士”运

动员交谈并交换纪念品，他们被日本记者团团围住，抢着给他们拍照。

原来，两天前庄则栋同我球队正乘坐大巴到体育馆参加比赛，突然一个留着披肩长发的美国小伙子跳上来搭车，当时，庄则栋想，代表团出发前虽然有不主动同美国人接触的规定，但周总理一再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毛主席也说过，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想到这些，他随手从提包里拿出一块杭州织锦，送给了这位美国小伙子留作纪念。小伙子喜出望外，自我介绍说，他叫科恩。两天后，他专门来到体育馆找庄则栋，把一件别着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作为纪念品，回赠给庄则栋。

这两次会见和交换纪念品，都被日本记者发现。于是，连日来，日本各大报登载了中美运动员交换纪念品的大幅照片、文章和评论，致使此事轰动了名古屋，也轰动了全日本，成为运动场上“中美接近”的佳话。

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宣布取消美国公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限制。这更激起了远在日本名古屋的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愿望。

一天，中国代表团领导成员开会，我也代表记者组参加。宋中同志从外面匆匆回来，汇报了下面这件事：在当天国际乒联举行会议之后，斯廷霍文来找宋中，庄重地说：“中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来。”

大家对此情况以及近来接触到的各种迹象进行了认真分析，得出一致的结论是：“美国乒乓球队表示

友好，他们想去中国访问。”大家当即决定，通过电话向国内报告，希望得到国内的指示。

不久，美国代表团一位副团长再次向我们提出访华要求。我代表团又打电话回国，说：“美国队想访问中国，美国记者想采访我代表团成员。在名古屋，美国队首席代表、代表和记者六次同我接触，表示友好……”

然而，好几天了，国内对这些电话一直没有回音。

其实，据后来了解，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早已收到从名古屋不断发来的电话请示，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在密切关注和研究着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要求访华的问题。多数同志认为，毛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因此，他们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提出美国队目前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由于事关重大，周总理将此报告送毛主席审批。

毛主席看到这个报告已有几天了，他一直在思考着：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相反，这将会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于是，他在4月7日做了批复，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嘱外交部立即电话通知在名古屋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

在比赛就要结束的当天，中国代表团接到了国内这一重要指示，立即告诉了斯廷霍文。美国队得悉后个个感到惊奇和无比兴奋，双方决定联合对外宣布这一重大消息。

我国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消息公布后，许多国家受到震动。在美国，尼克松总统立即表示批准美国乒乓

球队接受邀请，并在白宫召开会议，研究美国应该进一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久，他宣布了包括放松对华禁运在内的五点对华政策新步骤。

在北京，国家体委于4月8日拟定了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周总理把此报告送毛主席审阅。周总理兴奋地在报告上写道：“（邀请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了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他在接见全国旅游工作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发表了激励人心的讲话，指出“从1971年开始，我国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而这一攻势首先是从乒乓球队开始的。”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成功，周总理说：“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了”；他要我国代表团回国后不开“庆功会”而代之以总结会；他在考虑派队回访美国

1971年4—5月，日本各地樱花盛开。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在31届世乒赛结束后，继续到日本六个大城市访问，并举行友谊比赛。

当我们正在日本各地访问时，在祖国北京，人们正在热情友好地接待着从太平洋彼岸第一次来访的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另外还有包括罗德里克在内的四位美国记者。

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比赛、参观、游览和生活，周总理专门从外交部调派黄华、章文晋两位同志负责筹划接待工作。对他们讲：美国队这

次来访,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个非常好的时机,要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据章文晋后来回忆说:周总理的讲话表明,在他的心中,一个把握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计划已经完整地形成。

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31届世乒赛后应邀访美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在同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及全体成员谈话时,周总理引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他们表示欢迎,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周总理还在美国代表团中认出了20多年前见过的罗德里克,向他热情问候。罗德里克表示他非常关心中美关系,周总理应声说道:“现在,门打开了!”

会见中,科恩询问周恩来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周总理回答说:现在世界上青年对现状不满,想寻求真理,“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但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周总理的谦逊、友好和睿智的风度,给第一次来访的美国队员们以深刻的印象。两天后,科恩的母亲通过国际鲜花组织从万里外的美国送来一束红玫瑰花给周恩来,感谢中国总理对他的儿子讲了一席语重心长的话。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成功,使22年来冰封着的中美关系解冻,也加速了实现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1971年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他这时相信,乒乓球队已起了探路的作用,下一步当他或他的特使去北京时,将无疑会受到热忱的欢迎。基辛格后来也在他的回忆中这样评论说:“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他认为,中国邀请美国运动员访华有许多层意义,它“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他还指出“这种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它不仅使美国舆论界能够接受,而且“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5月中旬,我乒乓球代表团回到北京,才知道,周总理在阅批国家体委《关于欢迎我乒乓球代表团回国的请示》件时,将其中“召开一次庆功大会”改为“召开一次总结经验大会”,并作了旁批:“不要庆功,徒增骄傲。应适时总结,力求前进。”在请示中关于“建议新华社在代表团回国后发一组文章和一组照片”处,周总理又批示:“不要自吹自擂,要多宣传人民之间的友谊,互相学习,互相增进。”

大家这时才恍然大悟,决定安下心来,按照总理的指示,对这次比赛和出访好好进行了回顾和检查,做了认真的总结。讨论期间,周总理又要秘书来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运动员和记者,每个人都要写几条经验和心得送去给他看。

6月11日晚,周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说他看了每个人写的总结,并表扬有些总结写得很好。他要求运动员们继续加强训练,同时学习英语和国际知识。显然,他已在思考如何派乒

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的问题了。

1971—72年,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受到尼克松总统接见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这被世人普遍称为“乒乓外交”。受到它的连锁反应,世界上接连又发生一系列令人震动的大事,使1971—72年成为当代历史中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辉煌年代。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接着,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这些一个个震动世界、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不断地推动着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新格局的发展。

1972年4月,正当春暖花开时节,以庄则栋为团长、李梦华等为副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访问加拿大后,应美国乒乓球协会的邀请赴美国访问。运动员基本上是参加31届世乒赛的原班人马。

我这时已在纽约。在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新华社总社本来派我随同我国代表团前来采访26届联大,后因工作需要,经周总理批准,我改为我国代表团先遣人员,先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然后留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当时我国仍未与美国建交,我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为黄华同志，他派我专门联系和安排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的事宜。美国方面则主要由美乒协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接待我代表团。我按国内指示，就代表团来美访问的日程、地点、比赛和安全等问题同美方商谈，然后我飞往加拿大渥太华，向代表团汇报，并迎接他们到美国来。

4月12日，由20多人组成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乘专机到达美国著名汽车城底特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从此开始了它对美国八大城市的为期18天的友好访问。

4月18日，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白宫玫瑰园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他在讲话中赞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率先沟通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各地访问和比赛过程中，“最大的胜利者将会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访问中，中国代表团还受到了各大城市的市长、友好人士、华人华侨代表的热忱欢迎。他们还访问了一些著名的大学、中学、工厂，为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举行了友谊表演比赛。我国运动员个个朝气蓬勃，彬彬有礼，热情亲切，落落大方，给第一次看到这些新中国来客的各界美国人士以极深刻的印象。他们像从太平洋彼岸带来了一阵阵暖风，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

在这次访问中，“友谊”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言语和基本点。但由于两国长达20多年的隔绝以及在社会制度、对外政策、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访问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曲折，甚至误解。

在尼克松总统约定接见我国乒

乓球代表团的前两天，即4月16日，他下令美国空军大肆轰炸越南的海防、河内，扩大了侵越战争，遭到美国人民和反战运动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是否接受总统原来预定的接见，就成了问题。黄华同志就此问题向国内请示。据后来了解，周总理在北京时间18日凌晨召集了外交部领导成员开会，紧急磋商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美国这时这样做，使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在18日会见美国总统很为难，商定以口信通知美方，拒绝美国总统的接见。当周总理把这个意见写信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天上午约见周总理，指出：我乒乓球队访美系民间来往，去年美国队访华我政府领导人接见，如我队去美拒绝美国总统接见，会给美国人民以失礼印象，故我乒乓球代表团在美访问的活动仍按原计划进行。根据毛主席的以上意见，周总理修改了外交部致黄华并转美方的口信内容。黄华是在美国时间17日当晚接到国内指示的，他要我马上转告在华盛顿的我乒乓球代表团，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72年2月关于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虽然《中美联合公报》已写明，美国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不提异议，但由于政府多年来实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影响，许多美国官方或非官方人士仍认识不清，他们在欢迎我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讲话中，或在欢迎标语中，往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错误地说成“中华民国”，这使我国代表团感到为难。有些反华分子却借此破坏捣乱。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向对方表态，说明我立场，或不出席他们举行的活动。

对于我国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安全，也是双方十分关切的问题，美国警方派了大批保卫人员负责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但自从我代表团到达美国的第一天起，一个名叫麦金泰尔的牧师纠集一小撮人，举着反华标语，在运动场门前和我们的住所前“示威”。在底特律市的首场表演赛中，一帮歹徒把吊着死老鼠的小降落伞射向运动场顶空，发出强烈的爆炸声，以破坏场上热烈友好的气氛。对于这些反华活动，我们向美方严正提出，要求他们制止。但美方却一再表示，他们只能防止那些伤害人身安全的行径，却不能禁止任何反华“示威”的活动。幸亏我国运动员对这场破坏活动事先已有警惕，在混乱中保持沉着，井井有序，屹然不动，克服了这些人为了的干扰。

以上情况，说明由于国情不同和各方面的差异，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还极需要加深相互的了解和沟通。我国代表团在访问中维护祖国荣誉，坚持基本原则，扩大友谊共同面，同时努力了解这些不同点，按照周总理一向提倡的“求同存异”方针，尽量缩小误解和分歧。结果，产生了很好的积极影响。临别时，双方人员都非常感动，依依不舍。

毛主席的决策和周恩来非凡的外交才能，使得“小球推动大球”，为我国对外关系开创了新局面，也促进了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乒乓外交”不仅为中美关系传递信息，打开大门，铺了路，而

且这一突破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推动了世界上更多国家都愿意跟我国来往了。

从1971年5月到这年底,已有10个国家宣布同我国建交;接着,仅在1972年一年内,就有18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如英国、联邦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还包括亚洲的重要国家日本。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由“乒乓外交”开始启动的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仅为我国对外关系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而且对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也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对此,周总理在1971年5月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颇具预见性地谈到:“4月7日(指毛主席批准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一天),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弹过去,就转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地球,震动世界嘛!”于是,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又出现了“小球推动大球”的名言。

应当指出,当年“小小银球”所以能起到“推动大球”的作用,主要是由于中美双方的相互需要和积极努力,是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准确发动和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的合拍呼应;是两国领导人明察形势的变化,掌握恰当的时机,以巨大无比的魄力,推动了事态的发展,其成果实在来之不易。其中,毛主席的决策却起着关键作用。在1972年至1974年间,周总理在接见许多来自美国的客人时,曾多次谈到“乒乓外交”,说:“打开中美关系,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

的。”他还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引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件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验出来。”

还应指出的是,这一切又是在“文革”时期的动乱中实现的。为了打开对外新局面,周总理不仅殚精竭虑,精心安排,而且以巨大的毅力排除了一切“左”的干扰。为此,他终于积劳成疾,在1972年5月,已确诊患了膀胱癌。他是忍受着疾病的严重折磨而完成了“乒乓外交”这项伟大的创举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心头就涌起对他的不尽思念和缅怀。

(根据往年的报道、采访日记和有关同志的回忆,参照《周恩来年谱》和钱江《乒乓外交始末》写于1988年4月)

(责任编辑 吴 恩)



1971年4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从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古史辨》学派主帅顾颉刚的为人

● 以舟

30年代,在北大群星灿烂的教授中,有一位被人称为《古史辨》学派主帅的顾颉刚先生,他中等身材,戴眼镜,穿宽大袍子,恰是一个传统中国学者的形象。

“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

顾颉刚 1893 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己讲:“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祖父是一位秀才,喜好书法,精通《说文》,著有《说文通俗》十四卷等。一生以幕僚为业,曾游幕湖北、江西、贵州、山东等地,年逾六十才返回家乡。是个学有根底而又眼界开阔的人。祖母则是一位徽商的后代,据称是“极能干而有决断”的。由于双亲早逝,顾颉刚受祖父母影响甚大,回忆起童年时的情景,顾颉刚曾说:“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小桥流水,青山白云,一老一幼携手走在姑苏古城的街道上。爷爷在缓缓地讲述着,孙儿在睁着明亮的眼睛倾听着。历史和现实的界限在慢慢地消失,爷孙间的亲情在浓浓地交流。这真是一幅令人赞叹的图画,又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意境。

尚在怀抱之中的顾颉刚就开始识字,四岁学对对子。祖父,成为他最早的历史和语文老师。

祖母对顾颉刚的影响绝不亚于祖父。顾颉刚自三岁起直至结婚,一直和祖母住在一起。顾颉刚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祖母文化不高,主要侧重于从人品方面进行“塑铸”。顾颉刚六岁时,有一次见天下大雨,想借故不去上学,祖母指着天斩钉截铁地说:“就是落铁,也得去!”祖母,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导师。

家庭对顾颉刚的影响,除了“人”以外,还有“物”。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



1970年,
顾颉刚(前左)
与叶圣陶(后
左),俞平伯(后
右)等合影

书了。顾颉刚说：“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室内多古文字学书，父亲喜治文学，尤擅律赋，室内多文学书，叔父喜近代史，室内多史学书”。顾颉刚放学回到家，便钻进书房任意翻看。按他自己的话说：“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真的是开卷有益，不知不觉就长进不少。自小有神童之称的顾颉刚，八岁看《四书》时，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在书上大加批点。

进入了“不守一家之说”的北大

1916年，顾颉刚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曹聚仁先生讲：“这个‘门’，即是后来的系，是清末京师大学堂经科的化身，所以经学的空气仍极浓厚。”名为大学，但那时讲的还是古书古史，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北大，已算是不守一家之说了。教师中，既有包容今文经、古文经的陈汉章先生，又有只讲今文经，不信古文经的俞樾先生。所谓今文经、古文经，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公案，这里且不去说它。在这里要说的是，顾颉刚原本信从的是古文经，他自己讲过：“不想作今文家。”听了这些老先生的课，顾颉刚总算是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有了一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不至于像一些死守一家之说的诸公，连今文经派的经典《春秋公羊传》都不知道，说“《公羊》就是雄性的羊”。

尽管顾颉刚此时继承了一些传统学术的余绪，但他并不满意，感到学术空气沉闷，课堂教学陈旧。‘一心想打破它’。渴望着有所改变和突破。

拜在胡适、钱玄同门下

真是十分幸运，盼着改变，变动就来了。1917年，即顾颉刚入学的第二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上任后锐意图新，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聘请胡适等为文科教授，学校风气为之一新。在新任教授中，顾颉刚受胡适先生和钱玄同先生影响最大。

胡适是留美学生，既了解西方科学方法，又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讲中国哲学史，大胆的改革，令众人耳目一新，顾先生回忆说：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

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此后顾颉刚与胡适交往甚密，胡适在治学的路子上以至经济上，都给了顾颉刚不少帮助，后来顾先生在给胡适信中，曾充满感激地写道：“我自小就欢喜研究，但没有办法，也没有目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

除了在学术上的具体帮助外，胡适在个性风格方面，似乎也对顾颉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知道胡适是个十分幽默诙谐的人。他说他也讲“三从四得”。“三从”即：“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出外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得”即：“太太买东西要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发威要忍得，太太出门要等得。”胡适还跟别人说他一生最热衷于收集“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并说他发现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而意大利倒是有很多怕老婆的故事的，因而他早就料到意大利与德、日搞不到一块，迟早会脱离轴心国。最后的结论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试想，顾先生跟随这样一位老师学习，他的思想怎么会僵化呢？后来有人把顾颉刚与王国维先生相比，说顾颉刚因胡适的关系间接地受英美一派的影响，为人为学才比较自由随意。而王国维先生受德日一派的影响，则比较严肃保守。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钱玄同先生是留日学生，又曾受业于古文经大师章太炎和今文经大师崔述，因而他学贯中西，兼通今古文。“一肚子的学问不为人家所知道。”人们都知道钱先生是主张废除文言文的，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因而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位十分激进的人，岂不知他也有公允平和的一面。他曾不止一次地与顾颉刚讲：“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说得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说得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

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顾颉刚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十分痛快,说“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了一座门”,看出学术的门径在那儿了。可以想见,顾颉刚跟随这样的老师学习,头脑是不会狭窄偏激的。

顾颉刚极其勤奋好学,除了哲学、史学外,对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颇有研究,可称文史哲全通的人材。不过,如果没有像胡适这样的师长教导他应怎样入手,怎样去做,如果没有象钱玄同先生这样的学者启示他应跳出传统的路数,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去整理国故,会有日后《古史辩》学派吗?恐怕也是未必吧?无怪顾颉刚念念不忘老师的提携与教导,后来常与人说起,是从胡适那里学到了整理旧学的方法,从钱玄同那里找到了研究的目标。

顾颉刚最大的苦恼是“终年没有空闲”、“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做学问;最大的财富是多年节衣缩食购置的六万多册图书;最大的快乐是不断地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禹贡》杂志与《八路军大战平型关》

顾颉刚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位爱国的学者。早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顾颉刚就为《京报》撰写了《上海的乱子是怎样闹起来的?》和《伤心歌》等文,揭示事件的真相,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1934年,顾颉刚又牵头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他提倡研究历史地理学的目的,在《禹贡》《发刊词》中写得最明显不过了:“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顾颉刚感到仅仅从事一些与现实关系较密的学术研究已不够

了,而应走出书斋,直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他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意思是学术研究可以移晚一点去做,而唤醒民众的事情却一天也耽搁不得了。“七七”事变前,顾先生即组织人借鉴北方民间流行的大鼓书的形式,写了诸如《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稿子,印成小册子。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很受群众欢迎,二十九军的官兵见了纷纷来买,各地的书铺看到销路好也纷纷翻印。顾颉刚索性取古人“三户亡秦”之意,成立“三户书社”,铺开摊子大干起来,编发了不少这类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册子,启发民众的抗日意识。日本人对此恨之入骨,几次“抗议”。也难怪“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开出的黑名单上,第二名便是顾颉刚。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离开北平,在西北、西南等地迁移不定,但即便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编印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书刊。据日后统计,那几年,如《八路军大战平型关》一类的爱国书刊共出了六百多种。

顾颉刚同时为报刊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他曾在为《中学生》杂志写的文章中,“激励青年,在国难日急,似乎是走投无路的时刻,要下定决心去开辟自己前进的路。这条道路就是‘到民间去’,就是‘怎样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以挽救危亡。”现已成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的侯仁之先生回忆说,这篇文章“特别触动了”,“从这时起,我就从消极苦闷中解脱出来,主动积极地去寻找自己前进的道路。”

从研究“老子是生于孔子前还是孔子生于老子前”这一类纯学术问题,转到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学,再转而走出书斋,印发爱国书刊,这便是顾先生作为一位爱国学者所做出的抉择。

“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

顾颉刚所以令人怀念,还因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顾颉刚成名很早,33岁任教授,34岁任史学系主任。但他并不象一些少年高位的人那么傲气,更不像一些位居要职的人那么摆谱。而总是那样和蔼可亲,热情助人。顾颉刚

的朋友郭绍虞曾讲过：“他对朋友的热诚一贯如此，这就不是我个人的私言，凡认识顾刚的人差不多都有这感受。”郭先生还说：“他是我佩服最钦佩的人。”

顾刚对学生则是极其提携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对谭其骧。顾刚曾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评价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的谭其骧。“谭君实在是将来极其希望的人，他对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问他有几县，县名是什么，位置怎样，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他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今年我所以敢办《禹贡》半月刊，就因为有了他，否则我一个人是吃不住的。”

顾刚为什么对当年还只是一个研究生的谭其骧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又是怎样认识谭其骧的呢？请看谭其骧的一段回忆：“1930年秋，我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我选读了顾刚先生所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有一天下课时，我对顾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先生当即要我把看法写成文字。我本来只想口头说说算了。由于他提出这一要求，迫使我不得不又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的有关篇章，结果益发增强了对自己看法的信心，就把这些看法写成一封信交给了顾先生。想不到他在第二天就回了我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结论是赞成我的看法三点，不赞成的也是三点。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之后，我又就他所不赞成的三点再次申述了我的论据，给他写了第二封信。隔了十多天他又给我一封信，对我第二封信的论点又同意了一点，反对二点。不久，他把四封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加上一个‘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的名目，作为这一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了全班同学。”顾刚在这里表现了如此“真挚动人的气度”，如此“宽宏博大的胸襟”（谭其骧语），能不令后辈敬慕不已，感叹不已吗？

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尼泊尔、越南、希腊等国大使的杨公素先生，当年也曾得到顾刚不遗余力的帮助。为了使当时作燕京大学研究生的杨公素，从事他所感兴趣的“土司制度”研究，

顾刚通过他与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关系，由该院出具证件，委杨公素为考选委员会研究员，并以此名义写信给西康建省委员会的刘文辉及云南省政府予以协助，使杨公素才得以“审阅了几乎全部西康省土司档案”，“查看了云南省土司的材料与档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并以此获得了硕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在顾刚与杨公素失去联系，甚至以为他业已“牺牲”的情况下，顾刚又亲自安排将《中国土司制度》一书出版。杨公素对此一无所知，直至“文革”时期才从造反派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杨公素说这真“令我既感激又激动。我感激先生对我的关怀，更为先生重视学术著作，扶植后进而激动不已”。

受过顾刚恩惠的学生绝不只谭、杨二位，据说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童书业、王玉哲、张紫晨、吴晗、李民等等，当年都曾得到过顾刚的不少帮助。

顾刚对于同辈同事也是心诚情笃。钱穆先生讲，他曾写过文章，不同意顾刚的观点，结果顾刚不但不介意，还特别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教。如此胸怀，怎能不使钱穆赞赏和感叹！

由于顾刚一贯待人忠厚，宾客纷至，以至钱穆在一篇文章中说“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

说到顾先生的为人，还有一件事似乎应该提一提：1938年，毛泽东主席曾寄赠一册《论持久战》给顾刚。这册珍贵的赠书后由顾刚加上题跋，转赠给合众图书馆，我们今天无缘见到。但由此事，也可以想见，当年毛泽东主席对顾先生的学识人品及爱国精神等，也一定是相当钦佩的。联想到“文革”后期毛泽东在众多“反动学术权威”中独独选定顾刚来主持标点廿四史工作，怕也不是偶然的吧。

一位学者，一位爱国学者，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这便是顾刚先生内在的品格。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8岁，遗体遵嘱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供医学研究之用。1981年秋，顾刚生前藏书六万余册，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洛松）

学习张闻天的“担肩胛”精神

● 陈 沂

我和张闻天同志曾经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东北，一次就是1954年，我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联、东欧。我今天不想讲很多，只想讲一点，就是李大钊同志有副对联叫“铁肩担道义”，这一副对联放在闻天同志身上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上海人常常讲有没有肩胛？敢不敢担肩胛？这个问题对共产党员来说非常重要，在今天来说仍十分重要。看到好的事情敢担，不好的事情、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就不敢担。我从闻天同志的一生体会到这个问题，而且体会得很深。遵义会议上那种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为此他同王明路线彻底决裂，而且面对面地同博古错误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肩胛是不行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再有就是关于“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这件事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那时候对于“六十一个叛徒”，谁要说句话还得了啊！但是闻天同志对这件事，始终是坚持真理，敢于承担责任。他说，是经我同意的，是刘少奇向中央报告，是我同意的。他就是始终不渝。所以我老是讲，那些同志平反以后应该深深地感谢他。在我们党的历史中间，一谈到叛

徒，不仅是不敢与他们说话，连边都不敢沾，但是闻天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如一，一直到最后还是坚持，“这事我知道的，是经过我同意的”。我们讲要学习闻天同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工作如此繁忙，责任如此重大，假如我们都有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如果不是这样，稍微遇到一点不顺，我们就滑了下来，这就不好。闻天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有很多的贡献，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拿他在东北的情况来说，当年我也在东北。那时究竟是“战”还是“和”？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苏军？是依靠农村，还是依靠大城市？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东北的干部中争论很大，而那个时候，闻天同志还是在北满工作，他就能同陈云同志等一起，对东北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见。他起草的文件今天已收在张闻天同志的文集里面。我说的这个“担肩胛”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对党负不负责任，敢不敢负责任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对党敢于负责，什么问题都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我那时算是张闻天同志的一

个下级吧，在东北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这一点。

1954年在苏联，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个人崇拜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去了苏联，就碰上唱不唱《斯大林颂》，唱不唱《东方红》的问题。那时苏联反对个人崇拜还刚刚开始，也不怎么明显。是苏联同志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请示闻天同志。后来闻天同志说：“苏联有这个情况，他们反对个人崇拜。可是在我们中国今天还不能说有这个问题，但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后来这个问题就不说了。可以说在这个时候，闻天同志头脑是较清醒的，同时他也是从组织上来考虑。他那时是驻苏大使，我们这个团是代表中国去的。我们这个歌子唱不唱，是经过周总理批的，所以最后觉得《东方红》还得唱。从以上我接触的问题来看，他老人家是很思考问题、对问题考虑得也是很周到的。这也体现了他的党性很强。他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他敢于“担肩胛”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假如我们都有这种精神，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责任编辑 杜 方）

从李大钊改杨继盛对联说起

——读李庄《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他》

一文有感

● 叶 笃 庄

我在协和医院病榻上读了李庄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有所感。李文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对敌狠，对己和”的问题，第二是腐败问题。第一个问题实质是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性，第二个问题实质是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反而有所发展，并指出腐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肿瘤。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从李大钊借用明朝忠烈之士杨继盛的一副对联，但改了一个字说起。杨继盛（1516—1555），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即兵部的第三把手。他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在兵部员外郎任上，揭发检举掌握兵权的仇鸾与侵边的鞑靼首领俺答交兵，不战自溃，诬败冒功，又与权奸严嵩勾结，与俺答开马市于大同，尽撤边卒，敌患益深。在严嵩的包庇下，仇鸾反而被提升，加太子少保，总督京营戎政。对这样一个红得发紫的祸国殃民的坏人，杨继盛深感自己肩膀上所担负的“道义”，乃上疏论开马市“十不可，五谬”，又弹劾仇鸾“仇耻未雪，议和示弱，有辱国体”。仇鸾是一个袭祖父侯爵的“高干子弟”，有显赫的出身和“关系网”，得罪了他，还有好果子吃吗？！继盛的这一弹劾，换来的是下锦衣狱，贬为典史，典史乃知县的属吏，是未入流的芝麻官。这次他只摸了一下老虎屁股，就落得个降级使用。

后来仇鸾败露，杨继盛得到了平反，迁官至兵部武选员外郎。但他没有畏于前次摸老虎屁股的惨痛教训，眼看奸相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

蕃揽权擅政，重用亲信，排斥异己，贿赂公行，贪污腐化，在满朝群臣畏其权势，结舌不敢以一言劾嵩的情况下，冒死上疏，揭发严嵩“十大罪，五奸”，因此再一次下狱，在狱三年，送刑部论死。

杨继盛很清楚地看到，他同奸相严嵩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他上疏时，他的儿子劝他：“此举犹以卵击石也，惟大人察之。”继盛怒曰，“为臣尽忠，只知兴利除弊，至于死生祸福，非所计也！”看来解决敌我矛盾，不用“辣手”，不把“死生祸福”置于度外，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对敌狠”。

再说“对己和”，这里就要讲李大钊改杨继盛的那副对联的故事：“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曾在北京主编《晨钟报》，他用这个文化武器，对帝国主义和丧权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们进行猛烈抨击，社会影响很大。后来，他接受章士钊的邀请，办《甲寅日报》，继续坚持向反动势力作斗争，深受章士钊和章的妻子吴弱男的尊重。当章士钊一度倒向北洋军阀政府时，李大钊感到非常遗憾，希望吴弱男劝说她的丈夫不要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当吴弱男拿出一张宣纸，请李大钊写一副对联留作纪念时，李大钊想起了杨继盛的那副对联，但他把下联改动了一个字，即把“辣手”改为“妙手”。李借用这副对联，不外表达对吴弱男的期望和鼓励，同时也剖白了自己的志向。他所期望于吴弱男者，是让她劝说她的丈夫章大钊回归正道，当然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婉言相劝，讲究分寸，而且吴弱男处在为妻的地位也不得不如此。况且“妙手”一词也

很现成,病人为了感谢医生治好他的病,往往给医生挂一块匾:“妙手回春”。再说,“妙手著文章”也有出处,陆游剑南诗稿中的“文章”为题的一首诗就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李大钊这一字之改,正说明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但他已经看到了区分这两类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文提到,“‘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黑白颠倒,林彪、江青之类竟也被视为‘己’,倚为股肱者有之;而把大量好干部误为‘敌’,肆意摧残者有之。‘文革’十年,被硬刀子和软刀子杀伤者数字惊人”。其实这就是认敌为己,认己为敌,干出了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的千古恶事。这并不奇怪,只要看一看中国的封建历史,就可以明白了。从汉高祖刘邦起,乃至唐宗宋祖,还有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哪一个开国之君,在创业时期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讲究并实行“对己和”的政策呢?及至大敌被打倒之后,大业告成,一统江山在握,哪一个开国之君,又不杀戮功臣呢?我以为“文化大革命”那种“窝里斗”,并不空前,不过以前的做法不像这次残酷,没有这次彻底而已。窃以为,“文化大革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这渊源就是封建。要想杜绝这一封建渊源,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得取消人治,真正地、不折不扣地实行法治。倘不如此,还是把某个人捧上至高无上的有如神灵的宝座,处处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不实行民主,不许人民讲话,束缚人民的自由思想,则科学技术不但不能革新,而且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候,也要受到阻碍。今后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重演,真是不好说了!

李文还谈到腐败问题,他说“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日趋改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广大群众对此极为满意,‘说好是真好’;另一方面,各种腐败现象严重存在,又使群众痛心疾首,说‘坏是真坏’”。那么,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他说“现在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中的肿瘤”。肿瘤就是癌,如果不趁其尚未扩散之际,把它割去,割去之后还要辅以化疗和放疗等措施,否则它将会置人于死

地。和腐败现象作斗争,必须痛下决心,治“盛世”也要用“重典”。尤其对高官,更要如此,因为他们为害至大。古有明训,“擒贼先擒王”是也。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势必不能遏止这股祸国、祸党、殃民的歪风。远的且不说,只看看国民党为什么会那样迅速垮台,岂非国民党中那些吸取民脂民膏的“高官”所促成的吗?腐败现象有两种,一种是“腐而败”,即这些人腐化之后,败露了,并被绳之以法。他们的腐败行为就无法继续为害了。还有一种是“腐而不败”,这些人都有靠山,有保护伞,有关系网,抱成团,正如李文所说,“有的人犯了错误或犯了法却易地作官甚至升官”,这些人之所以能如此,是和他们的上级——保护伞有关的。这是一个腐败团伙,为了保护这个团伙的利益,其上级要保护同伙中的下级;有时其下级不惜一死也要保护上级,走舍车马、保将帅这一着棋。陈希同这个腐败团伙中的大将王宝森的自杀,不就是如此吗?对于这些腐败团伙,无论是头头,还是喽啰,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从快从重,“一个也不饶恕”,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责任编辑 方 伟)

补 正

我刊今年第10期刊登的《回忆采访开国盛典引发的感慨》一文,由于我刊编辑和校对的疏忽,在第52页左栏漏掉了刘少奇的一段话:“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它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它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共同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问题。”此文刊出时我们编、校还有若干不细密处。谨此向作者、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海外华人百年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

●赵志峰

今年五月印尼骚乱中,华人妇女遭强暴、商店被焚烧的事实真相为舆论界陆续曝光后,海外华人易受歧视、迫害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近百年来,海外华人拥有过事业成功的喜悦与欢乐,同时也承受着一波波排华浊浪的冲击,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回溯华人移民海外的百年历程,撩开历史神秘面纱,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浸满着海外华人辛酸血泪的生存发展史。

美、澳新大陆的开发凝聚着华人的血泪汗水

19世纪,美国西海岸一片荒凉,横贯整个东西大陆的铁路还没有修建完工,加利福尼亚一带又发现了许多可采金矿,企业主们急需大量工勤价廉的华工。殖民公司的代表们纷纷来到中国的广州、厦门、香港、澳门等沿海城市,利用“中间人”,采取利诱、拐骗甚至绑架的手段收集“猪仔”,集中关押在闷热的船仓里,然后偷偷地贩运到美国劳务市场。

19世纪东西方差距逐渐拉大,西方殖民主义猖獗一时,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在“弱肉强食”和白人种族优越心理的支配下,黄皮肤,黑眼睛,头上顶着一个小辫子的中国华工从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来自白人种族歧视的目光。华工们基本上都是农村文盲出身,主要从事金矿、铁路、农场、洗衣、家庭佣人等行业的劳动。他们日夜劳作,工作勤奋,即使在白人开采过的废金矿里也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修建铁路时,白人的一天工资是2元,而华工的工资一天1.5元,结果工作却比白人做得更快更好。

华工大都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家乡山多田少,为了生计才到异国他乡寻找出路。中

国人有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华工们勤奋地工作,拼命地挣钱,目的是要有一天可以回到“唐山”孝敬父母,与家人团聚。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有缠小脚的习俗,不可能随同丈夫一起出来打工,同时昂贵的旅费他们也付不起,因此华工们基本上都是独自一人在外打工,把挣来的金钱汇往中国。华工的这些做法让白人很不满意,影响了当地社会财政金融的稳定;华工们的不可思议的常年“禁欲主义者”的生活,则让他们感觉到白人妇女受到威胁。于是白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华工们不仅不值得归化,也不可能得到归化。这些都为以后在美洲掀起的排华浊浪埋下了伏笔。

19世纪70年代,横贯大陆的铁路修建完成,南北战争也已结束,大量的黑人从南方解放出来,许多白人从东部乘火车来到西部,都投进了廉价的劳务市场。金矿业逐渐变得萧条,劳工市场也由短缺转为过剩。在大陆开发的过程中,美国的工会也开始组织起来,那些工勤价廉、易受驱使的华人引起他们的不满,排华的浪潮正在酝酿。1862年美国众院议员奥特提出禁止在美国船上做中国“苦力”买卖的法案。国会1876—1877调查华人问题的报告中称:中国人不求进步,习惯恶浊,道德水平比白人低下。1880年加利福尼亚华人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4,因此在一份政府的调查报告中认为加州有被华人压倒的危险。于是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美国社会反华排华的声势越来越大,手段也纷呈百出。

1882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统治地区受美的影响,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排挤、迫害、歧视华人的法案。美国对华人课以各种名目的重税,如人头税、警察税、捕鱼税、扁担税等,试图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华人自动离开美国。在排

华法案中规定,美国自 1882 年始停止华工入境 10 年,对非经正当途径来美的立即驱逐出境,以后各州法院永不得准许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美澳大陆的排华暴力事件不断出现,华人生活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历史上最黑暗最污浊的排华运动终于发生了。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一家华人经营的水果店雇佣了两个白人,引起了当地白人的嫉妒和仇视,三间水果铺被 500 人团团围住,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一空。事件发生后,当地的一家白人报纸都看不过去,评论说“500 人攻击一个华人,有失英国人的传统精神”。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的一次排华事件中,两、三千华人同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被白人(包括他们的妇女和小孩)抢劫一空,致使华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黄祸”言论甚嚣尘上的时代,报纸一般都不会对排华事件予以正面的报道,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以文学的方式对此进行过描述。他在一篇文章中记载着刚从教堂里出来的衣冠楚楚的少年遇到“唐人”就掷以石块的事情。文章中说到:“啊,这里来了一位唐人,如果我不拾石块投掷他,上帝是不会爱我的。”马氏还有类似的报道华人受袭击的情形,如“唐人”过街,两旁屠夫便逐狗咬他,并用砖片打掉他的门牙。

对于美国的排华法案,清政府也曾提出过抗议,奈何国势衰微,人家连礼貌上的答复都没有给与。即使中国的外交官到了美国海关,也被以检疫为名关进木笼,百般戏弄羞辱,连最基本的人格权利都无法保障。190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称过去所有的排华法永远生效。这一决议激起了海外华人和全体中国人的无比愤怒,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抵制外货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终于打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的排华僵局。1943 年中国以战时四强之一的地位向美国及时提出了废除自 1882 年以来的“排华法案”的正当要求。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鼎力支持下,经过整整一年的国会辩论,废止排华法案于 1943 年 11 月终于获得通过。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美国深感在研究科学、改进技术、扩充

民用和国防工业、与苏联争先登月等许多方面人才的不足。经过努力,1965 年 10 月终于通过了摒弃种族歧视的传统的移民法案。据调查,现在华人占全美人口的不到 1%,但贡献却数十倍于此。美国 12—13 万第一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华人即占了 3 万;阿波罗登月工程中担任高级工程师的华人占 1/4;美国最大的电子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工程师里华人又占 1/3;1986 年里根总统褒奖的 12 位为美国作出突出贡献的移民中三位是华人。历史已经证明,在美澳大陆的排华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华人方面,对他们自己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昙花一现的南非华工移民史

1886 年在南非的德兰士瓦发现了金矿,美澳大陆消退的淘金热很快又吹到了南非各地。经过三年战争,英国击败了布尔人,1902 年南非又成了大英帝国版图上的一个殖民地。当时南非还是一块未曾开发的处女地,生活在那里的白人很少,每日的工资却非常高,金矿业主们要求英国的殖民部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为此,英国殖民部部长张伯伦破例亲自从伦敦到南非进行考察。回到伦敦后,鉴于美澳大陆排华的经验教训,张伯伦经过和手下谋臣的策划,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契约华工”的计划。规定凡来南非的华工限制其迁移和职业,期限三年,约满即行遣返。张伯伦的移民建议在英国和南非引起了一场争论,南非的一些地方在英政府还没有公布决议前,就开始了反华的舆论宣传,法院还通过了“排华法案”,预防华工的到来。主张引用华工的舆论则把华人描写得出奇好:“华人头脑发达,拥有美国北方人的冲劲和机智,犹太人的理财和经商的能力,苏格兰人的冷静和获得欲,土耳其人的忍耐和中庸性”,可谓集大成于一身。1904 年 5 月中英两国进行了第一次有关华工进口南非的政府间谈判,并达成了协议。1904 年 5 月 25 日,第一船满载 1052 名华工的船只从香港出发,经过长途海上旅行,抵达南非后被分送到各个矿场。

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对华工到来层层设防,

但金矿企业主们却不这样考虑。他们故意先压低当地人的工作薪水,延长工作时间,搞坏居住条件,减少医疗照顾,迫使白人自动离开,然后要求政府输入华工。事实证明,华工在南非的工作表现非常好,让金矿业主们感到很满意。在中英协议的条款中,还规定每个华工可以携带家眷到南非,旅费由矿主承担。但中国人都愿意家属留在家乡,第一年随同丈夫出国的只有两个妻子和 26 个孩子,华工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壮汉,这种做法引起了西方人的种种误解和猜测。闲暇时间里,华工有钱喜欢买手表和时钟,把花种在睡房门口,把鸟养的听人指挥,在可以容一千多人的大厅里,过节时布置得井井有条、香气四溢,这些都使洋人们赞叹不止。契约到期后,大多数华工都愿意再留在南非。英国和南非当局经过反复讨论,决定 1906 年 12 月以后不得再发许可证,也不准将契约延长。1910 年 2 月最后一批契约期满的华工撤离了南非。在南非历史上,“契约华工”的出现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排华政策的产物。

留在南非的少数华工多经营粮食杂货业,极少数经营洗衣业或作菜农,根据“契约华工”的规定,在南非当产业工人或矿工的根本没有。南非华工一旦领有经营执照,就不可以转换别业,即使开设分店,也不允许。因此很多华人不是破产转移他地,就是固定经营某一行业,父子相传。1902 年南非政府给华人颁发了特别身份证,象通行证一样,每一天都要挂在脖子上,形同狗牌,这一规定引起了华侨的强烈反对,华人称之为“狗纸”。南非的种族歧视无所不包,特别划定区域给华人居住;不准华人进入白人的戏院、酒吧、餐厅等公共场合;连公共汽车、火车、电车以及公共厕所都有严格的区分,可谓苛律如毛。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瑞典、丹麦的船只停泊在南非港口时,因海上常有德日法西斯的潜艇袭击,都需要结队等待武装舰队的护航才能出发。船上的中国海员到岸上华侨会馆中座谈,得知平日华人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情况后非常愤慨,做下计划,约定轮船启锚前一天,分批到平时不准华人人内的戏院、酒吧、餐厅等处去看戏或吃喝,如遭拒绝,则按计划行

事。一切如想象的那样,中国海员遭到拒绝后怒火中烧,便从门口直打到里面,玻璃柜台等设备立刻粉碎,种族歧视者一时不知所措,心惊肉跳、纷纷藏匿。等警察赶到后,海员不加抵抗,任由拘去。不久舰长得知消息,因开航在即,任务紧张,不可延滞,警方不得不放人了事。此法奏效后,中国海员连续多次在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戏院等地方暴打一顿,伸张了南非华人平时所受到的怨气。种族歧视者一时无法可想,见了中国人来了都害怕,从此任由中国人自由出入,不加限制。这是南非的华人在得不到祖国有效保护情况下,为惩处种族歧视主义者而想出的聪明办法。

东南亚的华人问题日益引人注目

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居住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历史、地理以及姻缘关系,自二战以来东南亚华人问题表现得错综复杂,不少国家里都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

在历史上社会动乱的时代,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无力执行,造成了中国移民史上几次较大的百姓迁移东南亚的浪潮。第一次发生在宋末元初,不少的宋朝遗老纷纷南下,其中包括丞相陈宜冲和郑思肖逃到爪哇;明末清初及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也有不少的士大夫和破产的农民逃难南下。华人为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开发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华人利用自己的勤劳和聪明才智也在事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 18 世纪广东梅县的移民罗芳伯经过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时间长达 109 年之久,1886 年才被荷兰倾覆。到了 19 世纪西方殖民扩张的劲风席卷东南亚时,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及清王朝海禁日疏的现实条件,广东和福建沿海的居民又开始大量移民东南亚地区。在英荷等西方殖民统治时期,为方便掠夺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和倾销本国的廉价商品,极力培植华人的中介商的经济地位,并采取华人与原住民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华人多开店经商,做矿业、农业、交通工人等职业,主要活动范围在市镇。当地的一些原住民则多居住在偏僻的乡村地带,很少和华人接触,因此在感情上存在着一

些隔阂。西方殖民统治者对华人虽有想利用的一面,但又将他们看作是对殖民统治的一种威胁,采取了歧视、迫害甚至屠杀的政策。1740年,荷兰殖民统治者为了镇压华人的反抗,连续进行了十多天的大屠杀,当时血流成河,死伤万余人,史称“红河事件”。当荷兰殖民者进行屠杀时,还惧怕清政府的干预。乾隆皇帝接到报告后,却无动衷地表示:“天朝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了抗日高潮,东南亚华人的爱国之心也被熊熊之火点燃,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援华运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非常松散,常以职业、家乡、语言以及血缘关系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封建帮派组织。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华人社会空前团结起来,涌现出象陈嘉庚这样的华人领袖,建立了“筹赈会”、“救总会”、“抗委会”等统一的华人组织。英国殖民统治者却因惧怕触怒日本,更加恐惧华人力量的过度强大而危及自己的殖民统治,因此疯狂地镇压华人的抗日援华运动。华人领袖陈嘉庚的庄园被焚烧,企业被殖民统治者无赖无理霸占,短短几年,由一个华商巨富弄到了破产的地步。陈嘉庚就是殖民统治时期在排华中受害的一个典型例子。

二战以后,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西方殖民统治受到了空前的冲击。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遏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为由,对新中国实施了包围封锁的政策。冷战的加剧,美苏在东南亚地区激烈的霸权争夺,更使这里的华人问题变得错综复杂。分而治之,历来是殖民统治者的常用手法,为了抵制瓦解东南亚各民族的解放运动,西方殖民统治者在交出政权时故意撇开华人,要求所在国的保守派以反共反华作为权力交换的法码。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编造出“华人控制东南亚经济”等似是而非的谰言,制造排华舆论,刺激当地居民对华人的嫉妒和仇视。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更是无中生有地指责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是新中国的“第五纵队”,专门在所在国搞颠覆破坏活动。当时还有一些人,利用我们“文革”中一些极左的错误,故意宣传“中国输出革命”,引起东南亚国家的猜忌和

不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了排华运动。菲律宾二战后积极追随西方政府,在排华的浪潮中充当了“马前卒”。菲全国推行“非化政策”,肆无忌惮的对在菲的华人进行迫害。在泰国流传着一个名为《东方犹太人》的小册子,将华人描写成“不可同化,自私自利”的人。在那个年代,华人的职业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华人的华文学校被关闭,很多的华人被无理驱逐出境。当时新加坡2/3的居民是华人,周围处于一片排华反华的浪潮中,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也曾走过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政策极端。60年代印尼的“九川事变”和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变”中,华人财产被掠、房屋被焚烧,死伤无数,很多人流离失所,被迫离境。70年代越南大规模的排华行动,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船民事件”。对于这些排华惨祸,一贯标榜人道至上的西方却漠然处之,没有任何的抗议表示。历史发展证明,东南亚地区排华政策是错误的,很多国家已经品尝了自己酿成的排华苦果。菲律宾排华后,虽满足了一时的自大心理,但经济上的难题也随之而来,米粮短缺,物价飞涨,失业人数激增。后来不得不改弦易辙,采取笼络华人的政策。马来西亚“五·一三事变”后,大量的华人资金和人才外流,损人不利己,给马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现了80年代的低增长现象。自90年以后,经过历史的反思,不得不开始重新用“非政治化”、“非意识化”的态度对待华人问题,从而赢得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时代。1989年后,东南亚各国一反追随西方的常态,主动打破西方对中国外交封锁,表示要积极地建立与中国亲密友好关系,这也是对历史上反华错误正确反思的一种表示。

历史长河缓缓流淌,现在居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海外华人达三千万左右,他们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千年前中国的哲人就表达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意思指各民族要相互亲近、和睦发展。在今天世界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让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抛弃一切狭隘和偏见,和平共处,共谋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警惕历史排华悲剧的重演。

(责任编辑 吴 思)

张大千何以去国

●包立民

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张大千携妻徐雯波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北。自此一别，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台北，再也没有回过内地。离开成都后，他先后旅居过台北、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定居台北。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刘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所以既不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亲近。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等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离蓉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因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刘力上亲耳听大千先生说过，并反问力上知不知道润之先生是谁？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和反感，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我问刘力上，既然张大千对国共两党既无恩仇，也无亲疏，为什么又要离乡去台？刘力上答道，说大千先生一点也不怕共产党，不信共产党共妻的传言，这也不符合实际。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所闻，并存戒备之心的，这是一；二来，他考虑到共产党新政府搞供给制，以后卖画给谁呢？如果不能卖画的话，今后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办？谈到这里，刘力上插了一段徐悲鸿托人捎信，邀请大千先生北上，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的故事。大千先生亲口对他谈起此事，他听后高兴地说：“好啊，老师，咱们一起去吧！”大千先生踌躇片刻说：“你老师一走，师母、师弟、师妹们郎格办？王灵官会放过他们吗？”表面上看，张大千是怕成都的国

民党特务王陵基的捣乱迫害，实际上心里是在盘算三千斤小米够什么用？

刘力上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分析了张大千离乡赴台的原因，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剖析，张大千先生的老友叶浅予，看得更为透辟：“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退居西南一角，作为自由主义的艺术家的，又依恋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对中国即将来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会有反感。原因很简单，他怕在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他所依附的‘达官贵人’最后怎么也要把大师从成都带走。”张大千是在成都解放前夕，搭乘张群亲自签署批准的军用飞机飞往台北的。

张大千为何不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告诉我说，五十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二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除此以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在台北谢家孝的《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就先后记载了两次，一次是在法国的巴黎，中国商业代表团访问巴黎时，适逢张大千画展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举行，代表团全体去看画展，并且设宴为张大千画展祝贺；另一次是在瑞士苏黎世，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获悉张大千到瑞士消息，

由参赞出面到张大千下榻的旅社,邀请张氏夫妇出席大使馆为他举行的接风宴席。

张大千的态度是,对于亲友的劝说信件,或婉言谢绝,或不予回复。对于中共官方的宣传工作,能回避则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总之一句话,他不愿意回归大陆。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冀朝鼎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道近况如何?

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这段对话,写得绘声绘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北京画家张仃回忆,行前他们受到了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委托,作些海外艺术家回归祖国的工作,包括张大千在内。他是以装帧设计家身份,随贸易促进会代表团参加法国博览会的,博览会结束后,又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再参加文化代表团,团长侯德榜,副团长冀朝鼎,团员有作家李霁野、何家槐,画家王雪涛和他,音乐家郎毓秀。届时赶上张大千画展在巴黎举办,代表团去看了他的画展。关于与张大千会面,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赵无极家里,由张仃出面邀请了两位旅法画家,一位叫常玉,一位是张玉良。还有一位是张大千。这是一次小规模聚会,彼此介绍一下海内外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次摸底会,摸底的结果是常玉想回国,但怕回国后没有合适的工作;张玉良也想回来,又怕过不惯紧张的生活;张大千根本没有回来的意思。第二次是由副团长冀朝鼎主持,在一家华人餐馆开了一个小型艺术家的宴会,张大千也出席了这次宴会。冀朝鼎介绍了一下新中国的建设情况,当然也欢迎海外的艺术家回国,

参加文化建设工作。由于事先已摸清了张大千的态度,所以也没有深谈。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他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张大千三四十年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使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新中国成立初期,闭关锁国,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四万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绝大部份人员(从国家主席到小公务员、小职员)都实行供给制(先是定量供给制,后是低薪制),除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没有多少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画家如齐白石等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齐白石、徐悲鸿的一幅画,只有几十元。齐白石、徐悲鸿的画价如此,一般画家的画价更可想而知了,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条件,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张大千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大太太曾正蓉,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不完全的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十元),四十元人民币在五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一房如此,其他二房也不会少。如果张大千回国,



国画大师张大千

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最近,笔者从张大千的侄孙(三哥张丽诚的孙子)张之先处,读到了十多封张大千致张丽诚的家书,这批家书是六七十年代写的,信中所叙的多属家庭生活及手足之情,其中有一封写于1961年5月29日(阴历)的信,这封信颇能说明问题,现摘抄如下:

三哥赐鉴,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月初经过香港,曾托一门生兑上美金五十元(合人民币122元),度此信到时,此款亦当收到。另寄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红枣一公斤、肉松二公斤、云腿四罐。据云,须一月半或两月方可寄到……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弟之近况尚可慰,弟于万里之外,每年卖画可得美金万余(合人民币三万上下),只是人口稍多,只够家用,无多积蓄而已(保罗夫妇及子女五人,澄澄、满满、牛牛、阿乌、尢女、满女、丑

女共七人,弟同弟媳二人一家共有十四口人,果园有柿子一千五百棵,每年可收四五十美金)。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享有天府之国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难逃,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人祸”也很惨重,传到迁居巴西的张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学生,寄了一批食品给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欲。信中开列了洋洋一大篇食品清单,这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封信中,张大千破天荒地开列一张他在巴西的家庭收支的清单。清单中的收入部份是卖画所得万余美金,加上儿子保罗经营的果园收入四五千美金(约合一万元人民币),支出是一大家十四口的生活费用。且不说张大千的卖画所得是否打下埋伏(据悉,张氏精品按当时的拍卖价,至少达数千美金),即使按卖画年收入万余美金来计算,当时在国内是决不可能有此收入的。至于张大千在信中所说“只是人口稍多,只够家用,无多积蓄”云云,则有点“叹苦经”了,叹“大有大的难处”的苦经了,怕老家亲友认为他在海外发了大财,谁都要狮子开口,开口要钱要物。闲话少说,一篇食品清单,一篇收支清单,两相对照,很能说明他不能回祖国的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看,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四清”、“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反感。更有甚者,有关他的传闻,也通过香港友人之口传到了他的耳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解放之初期,共产党有些人一直是大骂张大千的,“骂我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骂我生活腐化,骂我盗窃了敦煌艺术品……”(见《张大千的世界》)说张大千一点也不想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也许有点不近情理,但是他心里确实是害怕,怕扣住他不放,怕扣住他算账。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张大千五十年代果真回国了,他能平安无事地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吗?即使“反右”这一关“保护”过去了,

“文革”这一关是怎么也过不去的。这也许是张大千迟迟不归的根本原因。

怀乡与爱国

张大千的怀乡感情,最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诗词中。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词?很难有精确的统计了。因为他的即兴题画,应酬诗词很多,随手题写,随手赠送。从先后出版的《张大千诗文集》中,接近八百首诗词。

通读张大千的八百首诗词,我认为他的诗词写得最好的是旅居印度大吉岭,其次是迁居巴西八德园时期。而在这两段时期写得最好的诗词,一是怀乡,一是怀友。

张大千在印度大吉岭前后住了不到一年。这一年对他来说,是经济上最拮据的时期,原因是他的画尚没有打开销路,坐在山里吃老本,倒是应了一句老话叫“坐吃山空”。但是这段时期,又正值盛年,他五十刚过,无论从精力上,还是视力上都是最佳时期,住在山里又极少应酬,因此这段时期,正是他的绘画诗词创作最勤奋、最工细的时期。从现存的《大吉岭诗稿》手抄影印件中可以看出,他写了改,改了圈,圈了再改,数易其稿,可谓极尽推敲的吟哦,诗稿中有一首《题得句图》,可以窥见他苦吟诗句的一斑:“穷年兀兀有霜髭,癖画淫书老更痴。一事自嗤还自笑,断炊未废苦吟诗。”饭可以不吃,但诗却不能不吟。

张大千旅居大吉岭是五十年代初春,是他离乡去国的第一站。因此心里最惦记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境况,因此诗稿中有好些诗是读了家书后作的,有时他就以诗代替家书,寄了回去。“万里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读了家信后的焦虑心情。据笔者所知,张大千留在成都的家属子女众多,家累较重,写信叹苦经在所难免,读了这些叹苦经的家信,自然要引起“万里隔”的张大千的不安。

张大千的不安,除了来自家人,更多的怕还是对故乡的政治形势变化。在《梦回枕上作》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家书压枕啼号满,”“多难故山怨猿鹤,”“浮天又见横流脉,认作承平为一

嘘。”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件事是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据悉张大千在成都的亲族中也有人被镇压,此事传到他耳中,自然要引起他的猜疑了。“浮天又见横流脉”,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抒情,抒怀念故乡“不承平”之情。

大吉岭的山川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作为一个身居异域的游子来说,仍免不了产生“山川信美客思家”(佚题),“理萝深惭负首丘”的心情,负首丘——也就是对故土有负疚感。难怪又会产生“故乡无数佳山水,写与阿谁着意看?”在异国夷市又有谁来“着意”观赏中国的佳山水?

苦恋故乡,苦恋故国,在张大千的几十首大吉岭诗稿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然毋庸讳言,在这些诗稿中,也流露了他对共产党政府进行“土改”、“肃反”运动的不理解,乃至不满和怨恨情绪,这对一个远居国外又休戚相关的张大千来说,是不能也毋须苛求的。

较之印度大吉岭来说,张大千迁巴西数年后,由于他的画打进了巴黎,打进了世界艺术拍卖市场,经济收入起了较大的变化,心情也随之一变。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郊外发现了一块风景酷似成都平原的摩诃山城(他取唐朝诗人王维〈号摩诃〉的摩诃之名,定为摩诃山城),于是买下了有两百多亩土地的农场,耗资200多万美元,积数年之功,完全按照中国园林的特点来营造了一座中国花园“八德园”。为何叫八德园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因为我那个园子,原是别人种柿子的农场,有一千多枝柿子,我是以柿子来命名的,我们古称‘柿有七德’,就是说柿有七种好处,后来我又知道柿树的叶子泡水,吃了可以治胃病,再加一德,故称八德园。”在八德园中,他开辟了人工湖,绕湖盖了五座亭子,又称“五亭湖”,园中有笔冢、竹林、梅林、松林、荷塘、映鱼石、下棋石……纯粹是中国格式的一座园林。他天天住在八德园中,喝着中国茶,吃着中国饭菜,按照中国的传统过年过节,与全家人说着四川话。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张大千,是否乐不思蜀,可以不思故乡,忘了故乡呢?没有。请看他的《怀乡》:

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
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

巴西摩诃山城酷似成都平原,但山城四周见不到一个说巴山乡音的巴人,怎不教我这个老蜀客思念巴山蜀水?请看诗跋:“投荒南美八年矣,日归未归,眷念故山,真如梦寐中事……”这位巴蜀老人也只有在梦中才能满意地诉说乡关了。说是满意,也是无奈自嘲的反语,聊堪自慰而已。在《青城老人村》诗中,更进一层写出了他频频入梦思念故乡的苦楚:

万里故乡频入梦,挂帆何年是归梦。
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

故乡频频入梦,可望而不可即,一梦醒来,只能在诗中“含毫和泪纪乡关”。

怀乡,思念故国故乡,是客居异国异域的游子爱国主义情怀的具体表现。何谓爱国主义?用列宁的话来说,爱国就是“千百年来筑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的感情。”张大千浪迹海外三十多年,时时处处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时时处处保持着中国人的尊严和国格,坚持穿中国衣,吃中国菜,说中国话,读中国书,画中国画,无论身居何地,不入外国籍,保留中国国籍,离乡去国越久,思乡念国越烈,最后叶落归根,归到了祖国宝岛台北。试问这样一个艺术家,难道还不能算之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艺术家吗?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99年,给您一个惊喜!

作家文摘

创刊六年 京城文摘销量第一

每周出版《作家文摘·青年导刊》,将开辟全新视野;

每周四出版《作家文摘》,内容将更加充实、丰富。

一报在手 全家阅读

- 作家写社会,百姓看社会。
- 纵览时代风云,凸现人生百态。
- 雅俗共赏,切合大众阅读情趣。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22 邮发代号 1-190

欢迎订阅 1999年《作家文摘》,全年共出版 102期,
订阅每份:0.80元

月 价:6.80元 季 价:20.40元

半年价:40.80元 全年价:81.60元

注:零售每份 1.00元,订阅优惠 20%,订阅全年报纸,可节省 20.40元。本报乐于让利给广大读者,请读者到当地邮局订阅。

本报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号中国文联大楼 510室

邮 编:100026

电 话:(010)65921805(传真),65389323

打个电话或写封信 《男性之友》小丛书 《男性之窗》报纸给您

中国中医药学会男科治疗中心最近在郑州市管城中医院男科成立,该科是我国最早开展集治疗、研究、诊断、咨询为一体的专科之一。中心主任常松山是我国著名男科专家、全国百名著名医学专家。他潜心钻研、独出机杼,提出的“滋阴固精法治阳痿;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征服前列腺炎、附睾炎;优化组合治疗男性不育”等鲜明独特的科学理论,使男科病的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常主任情系天下男性病患者,

同时受中国中医药学会的委托,为开展性知识教育;消除性愚昧,特精心编写了《男性之友》小丛书和《东方家庭报》“男性之窗”增刊,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一册一报在手,尽可“人在家中坐,会诊邮局来”。您只要拨通电话或写封信,一套资料免费寄给您。路迢迢情在咫尺,病煎熬愈在今朝。

地址:郑州市城东路 60号郑州管城中
医院男科 常松山

电话:0371-6334610 6336410.

邮编:450004

证明文号豫中医广证学

[1998]第 109号

广告

《炎黄春秋》1998 年 1—12 期总目录

题 目	作 者	期·页	题 目	作 者	期·页
新年寄语	本刊编辑部	1·2	蔡元培与群星灿烂的北大教授	姚同发	4·20
□专 论 特 稿□			“大跃进”广西放了颗大灾星	王 定	4·26
任仲夷：“为民作主”还是“由民作主”	张作斌 向 明	1·3	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许人俊	5·7
项南生前一次心迹的表白	项 南	3·2	蔡元培在北大的辞职风波	萧 实	5·13
当代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	吴敬琏	5·2	回顾总政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	黎 白	5·16
萧克、费孝通、程思远谈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7·2	我在打“AB 团”中的经历	欧阳毅	5·21
一次党内高层真正民主的会议——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	于光远	7·4	中国红军中的美国人马海德	武际良	5·23
文化发展方向上要不要强调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	曾彦修	7·8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上)	杨奎松	6·2
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	王光美	10·2	花园口决堤六十周年祭	马仲廉	6·14
邓小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姜淑萍	2·2	何忍“南昌”舰永沉海底	王 彦	6·20
强调科学思想 充分发扬民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于光远	12·2	启动舆论工具对权力实施制约的	袁 庚	7·11
□春 秋 笔□			毛主席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下)	杨奎松	7·19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裘之倬	1·5	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再认识	余广人	8·2
“九·一三”事件 50 小时内的周恩来	高振普	1·8	“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	杨明伟	8·8
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	史小力	1·12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孟 凡	8·14
与世纪同步的法学家吴凯声	马龄国	1·19	保卫四平之战	陈 沂	8·18
周恩来的军事才能与贡献	力 平	2·8	三次思想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马立诚 凌志军	8·27
难忘的中共八大	于光远	2·15	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	胡绩伟	9·25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秦 川	2·19	张闻天忧国至死不渝	冯雅新	9·34
胡耀邦倡导“四不主义”	朱晓青	3·4	1978 年中国大转折写真	张湛彬 汤应武	10·14
忆周总理	于光远	3·8	谷牧与袁庚：创建蛇口工业区的幕后台前人	鞠天相	10·27
共同战斗中的周恩来与张太雷——纪念两位革命家的百年诞辰	钱听涛	3·13	初访农家 万里惊贫——1977 年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	周曰礼	10·32
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	刘青等	3·18	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	吴 象	11·14
乐氏家族与三百年老店同仁堂	李 仁	3·22	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	曹 英	11·22
“文革”中“帮文风”留给我带血的记忆	李 庄	3·26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一段曲折	温济泽	11·28
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历史学家黎澍	丁守和	4·2	彭德怀在“三线”的苍凉岁月	王春才	11·32
新中国外交是这样开创的——重读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五封信	高 梁	4·14	从新公布的一封信看胡适与虎谋皮	雷 颐	11·36
			苏联出兵东北的中方代价——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内幕	马仲廉	12·16
			□英 杰 谱□		
			彭士禄与中国核潜艇	傅宁军	1·23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	沈建中	1·27
			周恩来爱《兰花花》	刘青霞 白炳书	1·29
			当代一幕政治悲剧：田家英以死净谏	余广人	2·29
			“永不消逝电波”的幕后人涂作潮	王晓蕾	2·35
			项南之父项与年的传奇生涯	许人俊	3·30

题 目	作 者	期·页
访陈独秀江津故居拾闻	欧远方	4·28
省委书记赵健民三写血书	席星嘉	4·32
黄公略的最后岁月	毛祖棠	4·39
萧克与张爱萍在“蟠桃”相会	东方鹤	4·42
阎宝航与他的“阎家老店”	嵇钧生	6·28
有云水襟怀的续范亭	屯 棵	6·33
李立三是安源大罢工的直接领导者	李思慎	8·22
费孝通治学济世皓首不移	张 彦 裴毓荪	8·28
毛泽东要“早鸭子”当海军司令	吴殿卿	8·32

□人 海 浪□

坎坷人生路——陈企霞逝世十周年祭	黎 白	1·47
现代“白毛女”罗昌秀	倪良端	1·51
英雄——阶下囚——座上客——吴鼎臣		
历尽沧桑夕照明	吴执一	2·56
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	申泮文	3·45
我在台北“四·六”蒙难经过	张光直	3·52
蒋百里和他的“五朵金花”	蒋连根	3·61
《红岩》作者罗广斌“文革”中		
死因之争	郑光路	5·53
从对垒到团聚——忆逝于台湾的		
二舅罗文浩	何 标	5·60
我所拍摄的“文革”纪实照片		
主人公任仲夷	李振盛	6·44
蹲过敌我四次监狱的贾植芳	孙觉民	6·49
国民党名市长吴国桢	孙宅巍	8·64
战火中驻使阿富汗	马行汉	8·68
翁文灏从秀才到博士	吴继路	9·55
热心振兴我国围棋的金明	郝克强	9·57
乌干达历险记	徐明远	9·59
我给他带去江主席的题诗——纪念		
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友人李约瑟	高 梁	10·53
“疯子”章太炎	谭特立	10·58
《申报》改革与史量才遇刺	陈顺辉	10·61
澳门赌王何鸿燊	吴跃农	11·63
“父教育母实业”的实践家张謇	邱 建	11·66
革命党谋炸袁世凯	王光远	11·21
《古史辩》学派主帅顾颉刚的为人	以 舟	12·61

□殒 星 篇□

毛泽东的第一个女秘书曾碧漪	王梦岩	1·32
郭沫若在“文革”中著书“反潮流”	冯锡刚	1·35
陈毅与新安旅行团	林铭纲	1·37
项英遇难调查实录	王春江	3·35
成仿吾千里状告张国焘	汤胜利	3·38

题 目	作 者	期·页
项英的辉煌与失落	曹 英	4·44
任弼时来到我们红二、六军团	杨秀山	4·48
张经武将军之死	单 超	4·50
悼念敢于为民请命的胡开明	于光远 曲维镇	5·32
项英像前说项英	欧远方	5·36
我的公公——南开创始人张伯苓		
瞿安贵口述 唐婧整理		5·39
来自教会的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	宋力 姚江	5·43
在鄂西受到错误处置时的陶铸	聂菊荪	6·35
不拘一格的项南	钟沛璋	6·39
陈毅赋诗悼念亡妻肖菊英	陈干群	6·42
周恩来赴沪迎接李宗仁	高建中	7·38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劫难	穆 欣	7·44
彭雪枫与《拂晓报》、拂晓剧团	王申红	7·49
君子章乃器	董秉弟	8·34
乡村建设实验家瞿秋农	谭重威	8·36
巨星在“文革”序幕中殒落	苏双碧 王宏志	9·8
冯玉祥将军遇难前后	李维民	9·16
从井冈山走来的女中英才曾志	陈干群	9·20
彭德怀最后还在战斗	何 定	12·25
胡耀邦在陕西工作一百天,挨批一百天	张黎群	12·28

□求 实 篇□

潘汉年冤案的形成与平反	尹 骐	2·62
从《甲午风云》《北洋水师》谈		
刘步蟾的历史功过	经盛鸿	2·69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王元化	5·26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	杨 雯	5·27
湖南“闯王陵”是昂贵的赝品	王戎笙	6·22
“三反”“五反”激流中的民主人士	庞 松	7·25
我所知道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的创作	张培森	7·31
试析张闻天的纠“左”防“左”思想	宿忠显	10·34
刘少奇的公仆风范	徐庆全	11·2
十五大在理论政策上的新突破	任仲夷	11·9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薛攀皋	12·9

□赤 子 心□

79年前我在法国勤工俭学	郑超麟	1·54
旅美归来话旅美	官伟勋	1·59
江苏人民不忘泽被乡梓的冷遁		
徐培鸿 殷德庆		2·45
桃李满五洲的女教育家廖奉灵	王俊彦	2·49
当代茶圣吴觉农	胡士弘	4·68
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中国情结	耿一民	6·58

题 目	作 者	期·页
安子介与香港《基本法》	吴跃农	8·60
我为李宗仁归来五上北京	程思远	9·2
我和聂力烽火中的童年友谊	周 密	11·44
胡愈之与《南洋商报》	崩贵鸣	11·48
人民币诞生记	邓加荣	11·50
共和国一次超规格的葬礼	窦孝鹏	11·52
率先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爱国者霍英东	李敏生	12·34
第一擢升世界银行高位的中国人 ——访世界银行代行长、常务 副行长张晟曼	杜明明	12·39

□文 荟 园□

敦煌壁画中的百戏图	倪怡中	1·71
完成蔡元培嘱托 高平叔笔耕六十载	姚同发	1·73
臧克家写诗声援台湾“二·二八”起义	何 标	2·72
写过《桃花江》的作曲家黎锦晖	陈浩望	2·73
邹韬奋和几位名人的交往	黄侯兴	3·68
我和艾青的师生谊	丁 帆	3·70
勇敢的义举,勇敢的创作——评戴煌著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张 群	3·73
贺绿汀说周璇	陈浩望	4·77
皇庄考略	张宝年	4·78
黄胄送我三幅画	刘大为	5·72
《水浒》的流传与评说	靳树鹏	5·74
张竞生教授与民国初年的《性史》风波	王心喜	5·76
在武安看雉戏——雉文化的活化石	郝玺修	5·78
近作六首	王福民	6·57
徐庶之泼墨天山写风情	韩文辉	6·66
说“我前世一定是中国人”的泰戈尔	刘作忠	7·52
听吴作人先生谈艺	刘大为	7·58
将军吟——拜读《萧克回忆录》	李沥青	7·60
毛泽东批阅《红楼梦》	申 春	8·43
“梁山伯、祝英台”本事考	浩 望	8·59
姓名、家谱、谱牒文化	欧远方	8·78
杨朔离去留冤魂	韩毓丽	9·62
白石弟子女篆刻家刘淑度	牛欣芳	9·66
挣扎奋斗不倒的白薇	白 岩	9·68
《人民日报》筹办经过和创刊日期	陈春森	11·70
敦煌遗书是怎样流失海外的	倪怡中	11·72
《三笑姻缘》本事考	陈浩望	11·75
张大千何以去国	包立民	12·72

□古 今 谈□

臭老九,拜拜!	靳树鹏	1·76
---------	-----	------

题 目	作 者	期·页
鸦片战争中王鼎尸谏	刘仲兴	1·77
包公的口碑为啥那么好	纪 平	2·77
王炎午撰文祭生者 文天祥答谢励后人	林 峰	2·79
人贵有自知之明——从两副对联想起的	叶笃庄	3·3
琦善所为的另一面	李文林	3·78
真假天堂梦	靳树鹏	4·67
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它	李 庄	6·72
师复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刘中刚	6·64
郭琇:成也“三疏”败也“三疏”	肖 冰	7·71
郑和墓的政治隐秘	倪 泳	8·72
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	李 盾	10·78
学习张闻天的“担肩胛”精神	陈 沂	12·65
从李大钊改杨继盛对联说起 ——李庄先生《我看“对敌狠,对 己和”及其他》一文读后感	叶笃庄	12·66
海外华人百年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	赵志峰	12·68

□古 镜 台□

从晋商徽商看国史脉络	李一鑫	1·65
明末思想家王船山淳教好谏者	刘树鹏	1·72
清初一震惊全国的虚捏垦荒案	谭特立	3·79
明末党社与清朝文字狱	李一鑫	5·63
明初才子解缙无辜被杀	李立泉	5·69
曾国藩教子之道	伍泽华	5·71
戊戌变法的夭折	张健伟	6·73
放眼世界、革故鼎新的洪仁玕	邱远猷	7·75
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	官伟勋	8·74
古人拒贿诗四首	陆茂清	9·77
力主“存要去闲”的隋初名臣杨尚希	谭特立	11·76

□亲 历 记□

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	吕 鸿	12·44
为深圳第一声喝彩的来之不易	林 里	12·49
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	高 梁	12·54

□遗 闻 录 轶 闻 录□

公审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目击记	金光辉	3·41
常荫槐之子谈常荫槐	晓 觉	4·54
四千日本战友在四野	唐义路	4·54
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 俞平伯	舒 云	4·56
肖华为曾思玉作媒	刘永路	4·58
张学良在夏威夷谈往事	张天华	5·46
“两航”产权引发的国际争端	王 德	5·49
张子善被处决前的悔恨	范玉崑	5·52

题 目	作 者	期 · 页
孔宋违法结购外汇案五十年后曝光	郑会欣	7 · 62
张爱萍彭雪枫互让师长	袁兆华	2 · 52
国民党军队对日的无线电侦察战	肖占中	2 · 53
田家英临终袒露心境的见证人	曾 自	6 · 51
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名誉 主席团名单	于光远	6 · 53
购军需巧遇许厚钰	王超北	6 · 55
“五四”学潮中的官场内情	胡小彬	10 · 70
裕仁天皇外甥吉川侦佐毙命记	君山 柯峰峥	10 · 74

□沉 思 录□

从康生制造“谋杀苏枚”冤案引起的 联想与思索	凌 云	9 · 39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季羨林	9 · 46
一代师表季羨林	张 彦	9 · 51
我因质疑“句然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而获罪	冯 征	10 · 38
“文革”历史照片《虔诚者》背后的故事	李振盛	10 · 42
我在“文革”中主持《人民日报》夜班	尚力科	10 · 46
回忆采访开国盛典引发的感慨	李 普	10 · 50
一位铁道专家在“三反”中的困惑	黎 白	11 · 38
把视野放宽些	邝 人	11 · 42

□时 代 风□

世界速滑冠军教练孙显墀	李占恒	1 · 40
走下荧屏的“刘三姐”——访著名 表演艺术家黄婉秋	青 云	1 · 43
自发起草农业法的农民费桂龙	汤家厚	3 · 63
名将之后陈方安生	吴跃农	4 · 60
女科技实业家雷菊芳在西藏	庄志霞	6 · 62
矢志让聋人回到“有声世界”	刘正夫	7 · 66
读书君宜的《思痛录》	曾彦修	8 · 40
一个向蒋介石争来的苗族国大 代表	陈浩望 周世伟	8 · 49
北大的校格与蔡元培的人格	靳树鹏	8 · 52
浙南沿海小平原腾飞见闻余思	李鑫 张绪之	11 · 78

□同 心 结 两 岸 情□

李光耀，一百年前家在中国	吴跃农	1 · 63
--------------	-----	--------

题 目	作 者	期 · 页
斯特朗沉痛反“文革”	武际良	4 · 62
爱国华侨陈志昆传奇	张 彦	4 · 65
阳早、寒春——献身中国农业的美国人	武际良	8 · 56
爱国思乡织锦诗——记“千联斋主人” 谢鸿轩	郭静洲	3 · 76
台静农与启功的笔墨情缘	罗会祥	9 · 71

□法 制 苑 他 山 石□

以权抗法侵犯社团权益		
两级法院判决无奈一位厅长	华 实	2 · 38
陕北出过一个“马青天”	邱远猷	2 · 41
罗素 20 年代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邱健国	3 · 74

□神 州 光 九 州 景□

堪称世界近代地理学先驱的徐霞客	曾俊伟	2 · 74
李铎与《孙子兵法》碑拓	任永忠	4 · 74
折叠伞、三轮车、蜂窝煤的发明者	陈英茨	4 · 76
龙骨坡“母女”出山记	徐自强	9 · 74
漫步日内瓦	杜 莉	11 · 55
外国记者观战汾阳城	屈德鸾	11 · 60

□编 读 窗 信 息 窗□

读吴晗问题定性一文有感	李坛荪	5 · 79
关于《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 名誉主席团》的两封信	王景山 曾彦修	9 · 78
《谢王炎午生祭文》系后人假托 文天祥之作	耿艳鹏	9 · 79
关于“陈毅亡妻肖菊英之死”的 作者答疑	陈干群	9 · 79
《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 一文有不实之外	刘世昌 袁正元等	10 · 64
李汉俊脱党原因之我见	张 同	10 · 69
我们对汪东兴这本书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读后	何 蜀 王年一	8 · 44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 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总 目 录 □□

1998 年目录	编辑部	12 · 77
----------	-----	---------

炎黄春秋



霍英东(左三)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酒会上



张景贵回上海安望中学老师王佩芝(右一)施润和(右二)

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
为深圳第一声喝彩的来之不易
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
《古史辨》学派主帅顾颉刚的为人
海外华人百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